

“叙事学研究”主持人语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学界展现出更加火热的发展势头。学者们不满足于固有叙事学研究方法,通过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不断开拓叙事研究的新视野,如近年来关于叙事作品中“社会心理”(social mind)的研究。与此同时,西方叙事学家们将目光转向被忽略的叙事文类或叙事特征,如近年来关于“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叙事学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批评方法,迄今在中国已有30多年的历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检阅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成就,反思不足、展望未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尚必武的论文《投射“理论旅行”的轨迹——叙事学在中国语境的引入、兴起与繁荣》从历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叙事学在中国接受、发展、变异与创新的三个阶段:①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与起步阶段;②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与发展阶段;③21世纪的繁荣与成熟阶段。藉此,文章考察和评析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之特点与成因,廓清其发展脉络和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国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学界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的论文《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论泰戈尔短篇小说的情感与伦理》考察了叙事作品中的“原故事”。他认为“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引导人们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以及虚构故事产物的解读。通过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细致分析,霍根发掘出其作品中大量的以情感依恋为基础的“原故事”。在他看来,这种情感依恋最初以父母与孩童的关系为特征,而泰戈尔本人对伦理以及政治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依恋规范的指引。霍根强调,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质——情感依恋的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的开放性。

本期专栏刊发的两篇论文,各有侧重,值得一读。

——尚必武

投射“理论旅行”的轨迹

——叙事学在中国语境的引入、兴起与繁荣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叙事学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批评方法,迄今在中国已有30多年的历程。本文从历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叙事学在中国接受、发展、变异与创新的三个阶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必武,男,安徽六安人,美国国家人文中心 Fellow,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叙事学、英美文学研究。

①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与起步阶段;②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与发展阶段;③21世纪的繁荣与成熟阶段。藉此,文章考察和评析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之特点与成因,廓清其发展脉络和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为学界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叙事学;经典;后经典;翻译;研究

The Projection of a “Travelling Theory”: The Introduction, Rise and Boom of Narratology in Chinese Academia

SHANG Biwu

Abstract: As an imported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narratology has been travell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ption, development, and variation of narratology in China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Specifically, it draw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ree phases: the introductory and beginning phase in the 1980s, the rising and developing phase in the 1990s, and flourishing phas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doing so, this paper tries to pin down the salient features and inadequacies of western narratology's Chinese trip. It ends with offering a few tentativ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f narrat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narratology; classical; postclass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叙事学(narratology)又称“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由法国叙事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率先提出。在《〈十日谈〉语法》中,他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张寅德,1989:1-2)修订版的《叙事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2003)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叙事学”:①(受结构主义者启发而发展的)叙事理论。叙事学研究的是叙事本质、形式和功能,并试图描述叙事能力的特征。②作为一种对有时序的情境与事件进行表述的语词模式的叙事研究。③从叙事学模式和类别的角度,对特定(组合)的叙事进行研究。(Prince, 2003: 66)简言之,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叙事学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批评方法,迄今在中国的旅行已有30多年的历程。本文从历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叙事学在中国接受、发展、变异与创新的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和21世纪的成熟与繁荣阶段。文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为学界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

1.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的引入与起步

1966年,法国《交际》杂志第六期刊载了《符号学研究——叙事学作品结构分析》

的专题论文,正式宣告了叙事学作为一门文学理论学科的诞生,同年出版的还有格雷马斯的《结构语文学》。经后数年,叙事学在法国乃至整个欧美学界呈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与此相左,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时期,基本割断了与西方文学界的交往,对这一新兴的文学理论知之甚少,遑论系统的引介与研究,这一局势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才有所改观。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二期发表了题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的论文。在该文中,袁先生在介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学源头(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文类学的基础上,重点评析了普洛普的“功能论”、罗伯特·斯科尔斯的小说模式理论。

1983年,当施劳米什·里蒙-凯南(Shilomith Rimmon-Kenan)在写完《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一书后,她无法确定该书究竟是一门学科的导论还是一门学科的讣告。她说:“这两种反应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又都是不充分的。在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大学里,叙事虚构作品的诗学要么被忽略了,要么就是遭到怀疑。对这些人而言,本书就是一本导论。在其他地方,这门学科被认为已经死了或至少被解构主义给取代了。对他们而言,这本书就是一则讣告。”(Rimmon-Kenan, 1983: 135)诚如里蒙-凯南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批评浪潮的冲击,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叙事学在西方学界受到冷遇。与西方学界的情形恰恰相反,彼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外的新知、新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而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方法,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渐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和推崇。但是由于长期与西方文学批评界隔绝的缘故,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于西方文论基本上是以翻译和评介为主,作为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叙事学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叙事学”则由张隆溪引介至中国。在《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1983)一文中,张隆溪具体评述了普洛普的人物功能理论、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理论、格莱麦(Algirdas Julien Greimas,今译为格雷马斯)的叙述组合以及托多罗夫关于叙事语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颇有见地地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如忽略了决定每部作品艺术价值的具体成分,难以对作品作出审美的价值判断;很少考虑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过于追寻基本故事的努力使结构主义叙事学趋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离文学的具体性越来越远,逐渐脱离文学中丰富的内容(张隆溪, 1983: 116-117)。随后,更多国内学者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做了相关的评介与探讨。胡亚敏在《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1987)一文中,按照时间顺序对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布雷蒙德、热奈特等人的叙事学思想与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梳理与阐释,清晰展呈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概貌,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模式化特征和整体化特征(胡亚敏, 1987: 74-79)。20世纪80年代,张寅德无疑是国内站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最前沿的一位学者,他不仅编译了《叙述学研究》(1989)文集,而且先后撰写多篇论文,阐述西方的叙事理论。

《叙事学概论》(1988)、《略谈叙事学的理论特征》(1988)和《叙事语式》(1988)是关于叙事学研究的三篇重要文章。在这三篇文献中,张寅德对叙事学的语言学基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叙事学与符号学、诗学之间的关系、叙事学的理论特征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为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除上述研究者外,20世纪80年代为向国内引介和推广叙事学做出积极贡献的学者还有赵毅衡(1987)、陈力川(1987)、李贻(1988)和徐贲(1988)等。

尽管在这一时期,国内尚没有关于叙事学研究的专著问世,但却有了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面理论大旗下关于叙事学的系统介绍与研究。在这方面,不得不提张秉真、黄晋凯两人合著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1987)。在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文论研究著作中,张、黄两位学者分三个部分详细论述了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而这些理论基本上就是叙事学的“近亲”或“别名”。特别是在“结构主义概说”这一部分,他们详尽介绍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从而抓住了叙事学的语言学源头。此外,他们对结构主义批评的特征、源起与兴衰、基本原理、分析方法等的归纳与总结都十分中肯,即便是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并置发展的今天,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与对叙事学的评介相比,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做得更多的是对叙事学的翻译。继袁可嘉于1980年在《文艺理论研究》第二期翻译发表了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一文后,国内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方面的译文。《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四期刊发三篇叙事学译文,即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朱毅译)和格雷马斯的《叙述信息》(姜依群译)。次年,该刊又于第五期刊登了热奈特的《叙事的界限》(王文融译)。关于叙事学的其他译文还有:芭柏拉·史密斯的《叙述理论和文学研究的领域》(顾大禧译,《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弗里德曼的《关于小说的视点》(林均译,《语文导报》,1987年第7期,第10期)、沃尔夫冈·凯瑟的《小说中是谁在叙述故事?》(王美华译,《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5期)、达德利·安德鲁的《叙事结构》(马宁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1期)、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单位和层面》(李讯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1期)、沃尔夫冈·凯瑟的《谁是叙事人》(白钢、林青译,《小说评论》,1988年第2期)、F. K. 斯坦塞尔的《叙述情境的构成因素:人称、透视和模式》(牛宏泰译,《小说评论》,1989年第1期),以及托多罗夫的《叙事结构分析》(田佳友、蒋瑞华译,《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

就叙事学在国内的翻译和推广而言,有两部翻译文集功不可没,即王泰来编译的《叙事美学》和张寅德编译的《叙述学研究》。1989年,王泰来编译了《叙事美学》,收录了5篇叙事学的经典论文,分别是托多罗夫的《文学作品分析》、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沃尔夫冈·凯瑟的《谁是小说叙事人?》、瓦纳·C. 布兹的《距离与视角——类别研究》和菲利普·阿蒙的《建立人物的符号学方法》。在“编者前言”中,

王泰来对叙事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尤其是索绪尔、雅各布森、克罗齐等人的理论做了简要介绍。他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叙事学属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范畴(王泰来,1989:2)。就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言,他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王泰来还着重介绍了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托多罗夫等人的理论。必须指出的是,彼时的国内学界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依然保持批判和谨慎的态度。王泰来说:“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就其本质来说属于形式分析范畴。我们应当承认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诸多流派中的一个派别,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涉及文学的部分重要内容,但它还不能解释整个文学现象。”(王泰来,1989:6)同年,国内出版的叙事学译著还有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译)和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叙事虚构作品》是西方叙事学界非常富有影响的一部叙事学入门著作,被普遍选作教材使用,为叙事学在欧美学界的普及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将叙事学分为故事、文本和叙述三个层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事件、人物、时间、人物刻画、叙述层次、叙述声音等多个重要的叙事学概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推动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叙述学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叙事学译作,该书共翻译出版了17篇法国经典叙事学论文。其“综合研究”部分,包括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罗夫的《文学作品分析》;“叙事结构研究”部分包括格雷马斯的《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行动元、角色和形象》、《叙述信息》、布雷蒙德的《叙述可能之逻辑》、托多罗夫的《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叙述话语研究”部分包括热奈特的《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叙事的界限》和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该书还特别收录两篇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范文,即昂特尔·凡尔纳研究小组的《都德作品分析》和雷蒙德·德布雷—热奈特的《论〈三故事〉的叙述语式》。此外,该书还翻译刊载了批评界关于叙事学的三篇评论文章,即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的《法国文学批评之危机》、罗歇·法尧尔的《叙事作品分析》和托多罗夫的《文学批评》。其他可圈可点的译著还有:托多罗夫的《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1988)、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1987)、《结构人类学》(第一卷)(陆小禾、黄锡光译,1989)以及布斯的《小说修辞学》(1987)^①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主的叙事学开始进入西方文论选编中,如在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1987)中收录了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和格雷马斯的《叙述信息》。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1989)中收录了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分布的拓展故事小说的结构》、《情节分布构造程序与一般的风格程序的联系》、托马什夫斯基的《情节和情节分布》、巴特的《结构主义活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诗学》、格雷马斯的《叙述信息》和热奈特的《叙事的界限》等。这些西方文论教材和选编对叙事学内容

的收录,有助于叙事学这门学科以“借船出海”的方式较快地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可喜的是,这一期间国内还出现了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分析的论文。譬如,林青(1989)在《〈变〉的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一文中,通过援引托多罗夫等人的叙事学理论,认为第二人称叙述既有第一人称的逼真性和可感性,又有第三人称相对的客观性,而这种特殊作用在布托尔的《变》中得到全面体现,由此显露了该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真正魅力。姚公涛(1989)试图从叙述时间、叙述语式和叙述的基本意义单位“功能”等层面出发来解读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剖析了该小说所采用的新叙述手法。尽管上述论文在对叙事学理论的运用上还略显稚嫩,存在模仿的印迹,但是充分反映了国内学者将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2. 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在众多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国内对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介绍与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掀起一轮叙事学研究的热潮,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经典叙事学主要理论和基本概念的论文,而且还出版了诸多关于西方叙事学研究的著作。这一期间,为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申丹、罗钢、傅修延、赵毅衡等。

1990年,《外国文学评论》第四期推出“叙述学研究专栏”,发表了由赵毅衡、黄梅、微周、申丹、胡再明等人撰写的5篇论文。赵毅衡在《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一文中,通过对人物视角、转述语、时间链、情节结构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叙述学不再是一种小说技法的研究,它超越了形式文论自身的缺陷。赵毅衡(1990:4)坚定地认为:“对于试图了解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批评家来说,形式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意义。”他的这番论断对于正在接触叙事学的中国学者而言非常重要,肯定了他们从事叙事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也有助于叙事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一文中,申丹(1990:10-18)梳理了从普洛普、什克洛夫斯基、布雷蒙、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托多罗夫、查特曼等人的情节观,并质疑了上述西方叙事学家把情节完全放置于“话语”层面的做法,建议将之放于故事事件这一层次。如果说赵毅衡的文章从宏观层面上凸显叙事学作为形式文论的独特性和价值,那么申丹的论文主要是从具体叙事学概念入手,澄清西方叙事学界在情节研究上的混乱,有助于中国学者正确地认识这一概念,从而使得叙事学能够在中国得到更为良性的发展。实际上,这种思路和方法也贯穿了申丹在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始终。与赵毅衡和申丹相比,微周似乎在更广的层面上论述了西方叙事学。他在《叙述学概述》一文中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法国结构主义者和英美现代小说批评家对叙事学研究的贡献,并着重论述了聚焦这一概念。微周不仅绘制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谱系,而且还指出了其存在的两个明显弱点:①以语言学为模式,把叙述学作为句法的扩展;②过分

注意方法论,甚至认为稗论就是方法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微周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叙事学逐渐超越形式意义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预见西方叙事学由经典到后经典的范式转移。他指出:“越来越多的叙述学研究者认识到他们所处理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形式分析问题。叙述形式中有深刻的文化内容,甚至可以说,叙述形式比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了控制叙述的社会文化形态。因此,叙述学日益朝文学文化方向发展。叙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开始进入成熟期,虽然许多问题至今尚有待研究,许多新的领域正被开发出来。”(微周,1990:31-36)此外,在这组专题论文中,黄梅(1990)论述了自己阅读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和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的体会,而胡再明(1990)从叙事批评实践层面上分析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真品》。同年,《小说评论》还刊发了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一文。在该文中,徐岱(1990)从创作学、艺术发生学等角度阐述了布斯、普林斯、里蒙—凯南等人的叙事学理论。

此后,国内学者纷纷撰文从多个角度对西方叙事学理论加以介绍和梳理,其中既有对叙事理论的宏观介绍和对具体叙事学概念的辨析,也有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叙事批评。

首先,就叙事理论的整体介绍而言,国内学者的重点基本放在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理论。马驰在《普洛普叙事理论》一文中,围绕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从“功能”与故事结构、“角色”与“行动范围”、故事的整体结构等方面系统介绍了其关于叙事结构的研究,认为普罗普“采用的分析故事构成单位及相互关系的方法,对其他叙事体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重大突破在于他确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们的联结关系研究叙事文体的可能性。由此,为叙事体结构和要素分析开辟了一条新路”(马驰,1991:159)。同样介绍俄国学者关于叙事学研究贡献的还有晓河。他在《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叙述理论研究》一文中,从文本问题、作者问题、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论述了巴赫金的叙事理论(晓河,1995)。韦邀宇(1991)在《“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读罗兰·巴特〈叙述分析导论〉》中,对巴特《叙述分析导论》一文做了非常详细的评述,认为与其他叙述学家相比,巴特立意更高,视野更宽。相比马驰、晓河和韦邀宇,林岗从更广的层面对西方叙事学做了介绍。他在《创立小说的形式批评框架——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评述了西方文论界对叙事理论的研究,广泛涉及亚里士多德、热奈特、华莱士·马丁、布斯、亨利·詹姆斯、普罗普、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等人的观点,认为这些研究“可以划分为英美和大陆两种不同的风格。前者较多地继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叙事理论的传统,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古典叙事理论的现代发展;而后者则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属于广义的结构主义思潮下的产物”(林岗,1997:99)。这一论断和划分无疑是十分精当的。其他关于西方叙事学整体研究的还有黄晓敏(1995)对20世纪60年代对法国叙述学

的评述、刘海涛(1994)对西方叙事学源头的探知等。

其次,就叙事学概念的辨析而言,国内学者似乎将目光大多聚焦于“视角”(point of view)。譬如,罗钢(1995)讨论了叙述视角之间相互转换和过渡的三种类型,即作者叙述视角向人物叙述视角的转移和过渡;作者叙述视角向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移和过渡;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向人物叙述视角的转移和过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澄清国外叙事学界关于视角研究的混乱,申丹在区分叙述声音和叙事眼光的基础上,梳理了弗里德曼、热奈特等人的视角理论,她建议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视角或聚焦模式:

一、零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二、内视角(它仍然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但固定式内视角不仅包括像亨利·詹姆斯的《传使》那样的第三人称“固定性人物有限视角”,而且也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三、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四、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申丹,1994:74)

与申丹类似,王阳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入手,试图建构叙事视角的另一种研究模式。他认为第一人称叙事中客体性内容上至少重合着三个视角:“叙述者和两类形式叙述者视角。叙述自我的实体是阅读幻觉,经验自我的实体则是具体存在。当叙事文本中的‘我’多级分化,即重合视角超过三个时,‘两个自我’的区分也不够用了”(王阳,1999:19)。为此,他建议将“虚拟四维时空内的‘现实性’视角一律视为形式叙述者,视角间的关系由‘我’的同一性呈现为时间一维上的单向多级包容。”(王阳,1999:19)国内关于叙事学其他概念的辨析与研究有,金健人(1992a,1992b)对叙述者的叙事功能的阐述、王阳(1996)对叙述者的界说,以及张辉(1996)对法国结构主义者关于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研究的评述等。

此外,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叙事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得出富有新意的研究结论。如赵克忠(1996)分析了约翰·契弗小说的内聚焦手法、人物形象塑造和反讽艺术等;赵炎秋(1995)从人称和视角两个方面分析了狄更斯小说的叙述模式,即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赖辉(1999)从叙述者和受述者层面分析了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在叙事形式上的革新;凌海衡(1997)运用托多罗夫的叙事句法理论、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和巴特的符码分析方法,对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拉比》进行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该小说的梦幻破灭和瘫痪状态的主题以及金衡山(1999)对霍桑短篇小说《布拉斯岱罗曼司》中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分析等。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除了发表大量关于西方叙事学的论文外,还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富有代表性的叙事学论著。在译著方面,如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1990)、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1991)、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1990)、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1995)、罗兰·巴特的《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1995)、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1998)、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谢维扬、白信才译,1999)。在译文方面,如戴维·鲍德怀尔的《叙述与时间》(好东译,《文艺研究》,1991年第3期)、迈克尔·J.图兰的《叙事·叙述者·文本》(南帆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5期)等。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一系列叙事学专著问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成果有: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2)、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1997)、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等。上述著作大部分是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现代英美小说批评理论等做了评介和梳理,徐岱、罗钢、胡亚敏、傅修延等人的论著皆是如此。如罗钢在《叙事学导论》(1994)中,对巴特、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热奈特、查特曼等人的经典叙事学理论做了系统阐述,其中涉及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胡亚敏在《叙事学》(1994)中,分叙述、故事、阅读三个部分对叙事学做了划分。她在“叙述”部分,论述了视角、叙述者、受述者、叙事时间、话语模式、非叙事性话语;在“故事”部分,论述了情节、环境、人物、叙事语法;在“阅读”部分,论述了文本类型、理想读者、叙述阅读、符号阅读、结构阅读等。

1998年是中国叙事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该年度出版的两部叙事学著作作为国内叙事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中,采用比较的视野,以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作品为例,试图阐述一门比较叙事学。该著具体论述了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事方位、叙述语言中的言语行为、情节、叙述形式的意义等,并在附录部分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叙事学术语汉英对照表。这部论著实质上代表了后来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即以中外作品对照比较的叙事学或以中国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同年,从英国爱丁堡学成归来的申丹出版了专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在这本备受好评的著作中,她不仅详细论述了叙述学的情节观、人物观、故事与话语之分等,而且着重探讨了叙述学与文体学在话语、文体、叙述视角、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重合面,进而分析了叙事学与文体学之间的互补性。这部著作避免了与现有叙事学著作在内容上的重复,并对较为容易引发混乱的相关叙事学概念做了澄清与辨析,为推

动叙事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引介和评述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对西方叙事学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张毅在《当代叙事学的得失及其影响》(1991)一文中,阐述了叙事学的俄国形式主义渊源以及叙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热奈特、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指出叙事学理论过于追求所谓的科学性和统一的分析模式,既忽略了作家的个性与文体风格,又无法回答作品的文学性这类深层次问题。究其原因,张毅(1991:26)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过于注重科学实证和技术过程分析,使本来是整体存在的文学作品显得脉络清楚而魅力不足,折损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人文特性;而从研究范围的角度来说,叙事学仅考虑叙事作品普遍共同的内在构成情况,理论的延展幅度过窄过小,为进一步扩大理论的势能带来了局限。”对此,林岗持有相似论点,他指出:“在建立叙事作品形式分析框架的意义上,西方叙事理论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但是,如何将形式分析与审美的批评结合起来,使得形式分析不仅仅是把作品切割开来就算了事的解剖刀,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构作品的审美意义,在这方面叙事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林岗,1997:107)

3.21 世纪:叙事学的繁荣与成熟

进入新世纪之后,叙事学在国内迎来了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仅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叙事学研究的专著,关于叙事学研究的论文更是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新世纪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引入。在这方面,申丹的贡献最为卓著。2002年,申丹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开始出版,其中包括戴维·赫尔曼的《新叙事学》(马海良译)、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苏珊·兰瑟的《虚构的声音》(黄必康译)、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和J. H. 米勒的《解读叙事》(申丹译)。在此期间,翻译出版的其他后经典叙事学著作还有费伦和彼德·J. 拉宾诺维茨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2007)、安德烈·戈德罗的《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刘云舟译,2010)、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王文融译,2012)、玛丽—劳勒·瑞安的《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2014)。

此外,很多期刊也纷纷发表了诸多关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译文。仅以2012年为例,该年发表了数篇西方叙事学的译文,如《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一期刊发了詹姆斯·费伦的《修辞、伦理及叙述交流: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资源与读者》(邓颖玲、刘贞译)、约翰·彼尔的《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若干思考》(龙娟、尚必武译);《求是学刊》第一期刊发的布莱恩·理查森的《开端的叙事学研究》(余杰译);《江西社会科学》第一期刊发了杰拉德·普林斯的《叙事学及其未来》。就后经典叙事学的译文推介方面,不得不提《叙事》(中国版)。自2009年起,该刊已经连续出版5辑,共刊发西方叙事学译文47篇,涉及非自然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

叙事学、数码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等多个后经典叙事学派,有力地推动了后经典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主编一系列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译著的同时,申丹作为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评述论文,如《多维 进程 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等。除发表上述大量论文外,申丹关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部专著中。在与韩加明、王丽亚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2005)中,申丹在该书的“下编”中重点论述了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以及米勒的“反叙事学”等。在与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2010)中,申丹论述了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以及非文字媒介的叙事。

除申丹外,国内其他学者如王丽亚、许德金、唐伟胜、尚必武等也对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做了颇有成效的介绍与研究。在《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2013)一书中,唐伟胜论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语境观及其跨学科与跨媒介特征,并具体论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他还对相关外国文学作品展开了后经典叙事学阐释。尚必武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013)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存在维度,除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之外,还首度论述了语料库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对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叙述聚焦等从后经典视角加以重审。此外,可圈可点的研究有许德金、王莲香(2008)对身体叙事学的探索,王丽亚(2014)对后殖民叙事学的研究。其他关于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张新军的《可能世界叙事学》(2011)、张万敏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以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事学”为例》(2012),以及黄鸣奋(2011)的对西方数码叙事学发展的评述。同样评述西方数码叙事学的国内学者还有卢红芳、高晓玲(2010)。

不过,与西方叙事学界普遍持有的“非此即彼”观点不同,即经典叙事学不是进化为后经典叙事学即是被后经典叙事学所取代,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经典叙事学并没有过时。申丹指出:“经典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经典叙事学若存在问题或发展滞后,难免影响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换个角度说,若经典叙事诗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申丹、韩加明、王丽亚,2005:221-222)与申丹的学术观点类似,谭君强认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继承、互补与共存关系,即后经典叙事学不是要摒弃经典

叙事学,取代经典叙事学,开展一个与经典叙事学理论毫无关系的新方向,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所进行的范式调整与转换。谭君强(2007)指出,这一范式调整是叙事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其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唐伟胜(2008a)从“阐释还是诗学”这一维度出发,揭示了后经典叙事学主要分支与经典叙事学形成的复杂“共存”关系。他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在进行具体作品阐释时,借鉴和使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范畴,但在建构后经典叙事诗学体系时,又实现了对经典叙事学模式的补充和超越。

笔者一直认为与经典叙事学较为单一的结构主义范式相比,后经典叙事学是多种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叙事媒介的混合体,具有复数多元性。有鉴于此,除了探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外,还有必要讨论附属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这点,国内学者也存有相当的理论自觉意识。比如,唐伟胜讨论了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重要分支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修辞叙事理论主要考察叙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多层次交流关系,认知叙事理论则试图揭示读者对叙事的认知理解过程。他指出,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都注重研究叙事的阅读过程,但前者强调读者对叙事的阐释和反应,后者强调读者理解叙事的认知过程,前者主要研究叙事结构产生的具体意义,后者主要研究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生成的认知基础。在唐伟胜看来,尽管这二者在研究模式和研究目的上有很大差异,但在描述叙事阅读过程时有相似之处。同时,作为诗学体系,认知叙事学可以为修辞叙事学在考察叙事中的各种修辞关系时提供有用的范畴(唐伟胜,2008b:35-44)。尚必武在《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与互补性》一文中,认为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既存有排他性,又有互补性;通过对排他性的具体分析,可以增强我们对互补性的认识;而对它们之间互补关系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为宽阔的批评视野,对植根于不同的“方法论基础”、“阅读位置”以及“关注层面”的后经典叙事学兼收并蓄,减少排他性,增强互补性,从而在多元共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尚必武,2008:27-34)。

就当前西方叙事学的发展态势,申丹(2009a)论述了西方叙事学中隐性的跨学科以及应对非理性叙事的挑战,倡导在叙事批评实践中注重加强文内、文外、文间的综合考察。尚必武(2009a)不仅论述了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学的跨国界、跨媒介、跨学科的发展方向与态势,而且还在阐述关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提出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展现的若干重要动向,如叙事学新流派的不断涌现、对叙事学研究跨学科路径的重访与反思、叙事学研究的“历时转向”、叙事学研究的“跨国界转向”、对叙事学家个人学术思想的研究、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交叉整合。(尚必武,2012b)这充分说明了国内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研究基本同步,处于国际叙事学研究的前沿。

与此前关于叙事学研究的纯理论探讨相比较,申丹在《叙事、文体、潜文本——重

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中采用了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并举的方式。在该书“上篇 理论概念和模式”中,申丹不仅梳理了叙事学与文体学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且对相关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如“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就“隐含作者”而言,申丹重点分析了作者的编码与读者的解码两个过程,指出所谓的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处于不同的状态而已,即隐含作者是处于写作状态中的作者,而真实作者则为处于日常生活状态中的作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从经典文学作品中读出新意,挑战学术界现有的研究结论,申丹结合叙事学和文体学两大学科,提出了“整体细读”的批评方法。具体而言,“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在‘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申丹,2009b:12-13)

申丹的研究代表了国内新世纪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转向——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实践并举。在接受采访时,申丹指出:“无论是经典叙事学批评还是后经典叙事学批评,其显著特点都是能够对作品做出新的阐释。”(乔国强,2005:8)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者除了在理论或诗学层面对西方叙事学展开研究之外,还充分利用叙事学这门工具,展开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得出了诸多富有新意的研究结论。在叙事批评实践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论著有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2002)、张薇的《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2005)、吴庆军的《〈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研究》(2006)、梁工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2006)、赖骞宇的《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2009)、王长才的《阿兰·罗布—格里耶小说叙事话语研究》(2009)、张晏的《茨威格中短篇小说叙事研究》(2012)、柳晓的《创伤与叙事》(2013)、王悦的《镣铐中的舞蹈: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2013)等。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国际化的交流,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国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叙事学研究的访谈。2005年,乔国强以《叙事学与文学批评》为题,对国内叙事学研究领军人物、国际叙事学研究知名学者申丹做了访谈。在访谈中,申丹对西方和国内叙事学的发展过程、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的不同层面、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叙事学与文体学的互补性,以及叙事学的未来发展等作了具体阐述,解答了国内学者关于叙事学研究的诸多困惑。2007年,唐伟胜以《伦理转向与修辞性的叙事伦理》为题对后经典修辞叙事学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围绕叙事伦理、叙事进程、叙事判断等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访谈;2009年,尚必武以《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后经典叙事学的倡导者与领军人物戴维·赫尔曼做了访谈。在访谈中,赫尔曼就“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多重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故事世界”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当代叙事理论的特征与走向,以及叙事理论教学等重要论题发表了看法。随后,尚必武(2009b,

2010,2012a,2014)又就当前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分别对修辞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非自然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布莱恩·理查森、后现代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布莱恩·麦克黑尔做了访谈,以及乔国强(2012)对杰拉德·普林斯的访谈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引介和评述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同时,国内学者还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注重西方叙事学的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叙事学研究成果。除上文所论及的申丹的“整体细读法”之外,还有谭君强提出的“比较叙事学”。该理论强调“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所作的比较研究,”“致力于探寻存在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之间的异同,并进而探寻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社会、心理、习俗、文化等原因”(谭君强,2010:38)。在提出比较叙事学构想的同时,谭君强还致力于“审美文学叙事学”的构建与研究。在《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和《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2011)两部著作中,谭君强在论述西方叙事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在后经典语境下建构一门审美文化叙事学。该理论“力图摆脱传统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而力图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与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要素链接起来,”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审美文化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致力于对对象的审美价值判断”;立足“‘叙事学之基点’,以此规范其学科研究方向”;注重“多学科性、跨学科性与学科间性的研究”(谭君强,2011:40-48)。

21世纪之后,空间叙事在国内学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而这方面属龙迪勇的贡献最为卓著。早在2003年,龙迪勇就发表了题为《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的论文。在该文中,他富有创见地发现:小说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所以小说叙事也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很多现代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并且还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数十年来,龙迪勇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入挖掘叙事学研究的资源,分析梳理了大量的中外叙事文本和叙事现象的第一手文献,从批判性的建构主义视角考察空间叙事,为叙事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其新著《空间叙事研究》是近年来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唯一一部叙事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书紧密围绕空间叙事及其运作机制,详细梳理了各类叙事中的空间因素及其作用路径,描述和建构了相对完整的空间叙事学概念与分析框架,对于完善现有的叙事学理论、对相关叙事作品从空间视角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他在书中独创性地提出了主题一并置叙事这一概念。他认为,主题一并置叙事一般有四个特征:①主题是此类叙事作品的灵魂或联系纽带,不少此类叙事作品甚至往往是主题先行。②在文本的形式或结构上,往往是多个故事或多条情节线索的并置。③构成文本的故事或情节线索之间既没有特定的因果关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④构成文本的各条情节线索或各个“子叙事”之间的顺序可以互换,互换后的文本与原文本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龙迪勇,2014:176-

177)通过有效地考察主题与情节之间的配置关系,龙迪勇将主题一并置叙事用来分析叙事作品的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将之与作品的主题结合起来,进而有助于在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叙事格调与思想内涵。除提出主题一并置叙事外,龙迪勇还提出了复杂性、分形叙事、空间表征法等术语概念,丰富了现有的叙事学研究体系。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叙事学的重要人物,赵毅衡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建构“广义叙述学”。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一书的第15章“符号学叙述学,广义叙述学”中,赵毅衡已经开始初步论述了广义叙述学,并提供了“最简叙述”的定义。他认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的符号文本,就是叙述,即“(1)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形成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2)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赵毅衡,2011:327)。在《广义叙述学》(2013)中,赵毅衡更为全面地提出了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架构,即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间与情节、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等。至于建构广义叙述学原因,赵毅衡(2013:6)解释道:“由于叙述是所有符号文本中最复杂的,叙述学早就是、今后必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符号学门类分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一旦决心从符号学角度来研究叙述,覆盖叙述的全域,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赵毅衡的努力,广义叙述学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渐大。针对“广义叙述学”,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还于2014年联合主办了“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广义叙事学论坛”(肖惠荣、曾斌,2015:67-72),对叙事学基本理论、听觉叙事、空间叙事、图像叙事、新媒体叙事等问题做了广泛探讨。

此外,在叙事学领域其他开拓性研究还有王阳(2002)从符号逻辑角度对叙事学展开的探索、许德金(2004)提出的传记叙事学、胡亚敏(2014)提出的意识形态叙事学、龙迪勇(2008,2010)、程锡麟(2014)等人的图像叙事研究、伍茂国(2013)对叙事伦理理论的建构与批评,以及邹涛(2014)对叙事认知与记忆之间关系的探讨等。

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类似,国内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也大致存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引入新方法、开辟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条则是重新审视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关于前者,如上文所述的申丹、谭君强、龙迪勇、赵毅衡等人的研究。就后者而言,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是建构叙事学这座批评大厦的基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叙事学基本概念的探讨都是新世纪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和潮流。放眼国内学术界,这些基本概念探讨主要集中在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聚焦等。这在申丹《叙事、文体、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一书中得到了鲜明体现。申丹从后经典视角重新阐释了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等叙事学基本概念,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廓清,理清了很多混乱。除申丹外,关于隐含作者研究的其他国内学者还有李孝弟、云燕、尚必武、赵毅衡、谭君强、乔国强;关于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国内其他学者有尚必武、陈俊松、刘江;关于聚焦研究的国内学者有尚必武、江守义、陈文丽、侯素琴等。当然,期间还有其他重申叙事学概念的研究成果,如王丽亚(2008)对“元叙

述”与“元小说”这对非常复杂而又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了详细的辨析;余杰(2015)对“叙事开端”的研究等。

在大力引进与梳理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同时,国内学者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兴趣丝毫没有减弱。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经典叙事学作品的翻译在国内似乎形成了一个小高潮。诸多西方经典叙事学的论著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欢迎。譬如,热奈特的《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2001)、尤瑟夫·库爾泰的《叙述与话语符号学》(怀宇译,2001)、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2002)、保罗·利科的《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王文融译,2003)、格雷马斯的《论意义》(吴泓缈、冯学俊译,2005)、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2011)、雅克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徐强译,2011)、西摩·查特曼的《故事和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2013)、普林斯的《叙事学:形式与功能》(徐强译,2013)、《故事的语法》(徐强译,2015)、热奈特的《转喻:从修辞到虚构》(吴康茹译,2013)、盖勒特·斯图尔特的《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陈晞译,2013),以及罗伯特·斯科尔斯等的《叙事的本质》(于雷译,2015)。此外,国内还翻译出版了两部西方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即杰拉德·普林斯的《叙事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2011)和戴维·赫尔曼的《剑桥叙事指南》(尚必武译,2015)。与之对应,国内学者对经典叙事学的热情不减当初,推出了相关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董小英的《叙述学》(2001)、耿占春的《叙事美学》(2002)、王阳的《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2002)、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2002)、祖国颂的《叙事的诗学》(2003)、伏飞雄的《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利科对世间问题的“叙述阐释”》(2011),以及陈良梅的《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2007)等。必须指出的是,《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是国内较为系统地研究德语叙事理论的首部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关于德语叙事理论研究的阙如。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叙事学在国内越来越变得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重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叙事学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叙事学研究学会的相继成立,以及全国性叙事学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纷纷成立了叙事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叙事学研究所等。2004年12月,在福建漳州师范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吸引了近百位学者参加。与会者围绕叙事理论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文学叙事与文化诗学视角、叙事学的中国化及其实践、后现代叙事与经典叙事比较、文学叙事的文本实践等展开研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叙事学在中国之路》(2006)。2005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就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建设与发展、叙事理论的重新审视、跨学科叙事学研究、中外叙事作品分析、非文字媒介的叙

事研究等诸多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后出版论文集《叙事学研究》(2006)。就学术会议而言,2007年10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召开的叙事学学术会议具有了国际交流的性质,来自美国的知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彼得·J.拉宾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桑吉塔·雷(Sangeta Ray)等出席本次会议并做重要发言。这些经常见于西方叙事学报刊和图书的西方叙事学名家与中国叙事学研究者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而中国学者对叙事学研究的热情也给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国内又数次召开国际性的叙事学研讨会,分别是“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重庆,2009年)”、“第三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长沙,2011年)”、“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广州,2013年)”以及即将在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2015年)”,前来参加上述国际会议的西方知名学者有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苏珊·兰瑟(Susan Lanser)、戴维·里克特(David Richter)、雅克布·洛特(Jakob Lothe)、沃尔夫·施密特(Wolf Schmid)、梅尔巴—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约翰·彼尔(John Pier)、露丝·佩奇(Ruth Page)、梅尔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以及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等。这些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与新意。

第二,学术刊物“叙事学专栏”的开设,以及叙事学专业期刊(集刊)的创办。进入21世纪之后,很多期刊都纷纷开辟叙事学专栏,如《江西社会科学》的“叙事学专栏”、《外国文学研究》的“后经典叙事学:西方视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的“叙事学研究:海外学者论坛”,以及《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文》、《中国比较文学》、《求是学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设的叙事学专栏等。除此之外,在国内学者的努力下,还出版了诸多叙事学研究的集刊,如傅修延主编的《叙事丛刊》、唐伟胜主编的《叙事》(中国版)、尚必武主编的《叙事研究前沿》等。这些叙事学专业集刊的创办,为推进叙事学研究国内学者交流叙事学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园地。

第三,叙事学教材的出版、叙事学课程的开设,以及叙事学方向学位论文的撰写等。一段时间以来,叙事学始终作为国内高校西方文论课程的一部分。西方文论教材将之与新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等相并置,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批评学科。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叙事学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众多高校都纷纷开设了叙事学研究方面的课程,而且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叙事学课程教材,如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2008)、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2010)。与之相应,很多硕士、

博士生都以叙事学为研究方法撰写学位论文。根据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2月26日,以“叙事理论”为题的硕博论文有462篇,以“叙事学”为题的硕博论文有1870篇,而以“叙事”为题的硕博论文则高达11859篇。

第四、叙事学研究方面的研究项目在国家级重要课题层面上的批准立项。仅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21世纪以来就有数十项课题获得立项,如“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唐伟胜,2003)、“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谭君强,2003)、“普洛普故事学研究”(贾放,2004)、“叙事、文体、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申丹,2006)、“叙事的空间维度研究”(龙迪勇,2007)。尤其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不仅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而且呈逐增多的趋势,诸如“西方叙事学人物理论研究”(卢普玲,2010)、“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尚必武,2010)、“叙事逻辑理论创新研究:从文艺叙事到文化叙事”(刘阳,2011)、“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研究”(谢龙新,2011)、“一般叙述的符号学研究”(赵毅衡,2011)、“图像叙事研究——以美国现代文学为例”(王安,2012)、“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比较研究”(龙迪勇,2013)、“听觉叙事研究”(傅修延,2013)、“美国奴隶叙事研究”(王欣,2013)、“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叙事学研究”(董晓烨,2013)、“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艺术与伦理思想研究”(尚必武,2014)、“叙述行为和‘不可靠’叙事理论研究”(申洁玲,2014)、“米克·巴尔叙事诗学研究”(王进,2014)、“诗歌叙事学研究”(谭君强,2014)、“西方叙事学的本土化研究”(王瑛,2014)、“短篇小说双重叙事运动研究”(申丹,2015)、“19-20世纪俄苏文学的叙事空间转向与俄国现代性研究”(孔朝晖,2015)、“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王茹,2015)、“19世纪英国战争叙事与帝国构建研究”(张金凤,2015)、“圈地运动与英国文学的乡村叙事研究”(吾文泉,2015)、“当代爱尔兰诗歌中的身体叙事研究”(侯林梅,2015)、“诗性思维视野下史诗的‘前叙事’及其现代影响研究”(余杰,2015)、“英国摄政时期历史小说叙事伦理研究”(陈礼珍,2015)等。上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一方面说明叙事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

4. 未来的叙事学研究:任务与方向

在《关于叙事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09)一文的结尾处,申丹(2009a:64)指出:“叙事学研究方兴未艾。有很多学科为叙事学的进一步跨学科发展提供了余地,而叙事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叙事学新发展中的隐性跨学科现象指向了这种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叙事学研究的另一拓展方向是研究新的对象。”具体到中国叙事学研究界,她认为:“当今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闭关自守或盲目跟从无疑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保持开放的视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选择、有目的地吸纳西方的研究成果,并争取多向国际学界介绍中国的成果,以求更好地形成中西研究相互

借鉴、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申丹,2009b:64)当前,中国叙事学迎来了其发展的最好时期。无论是在叙事诗学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上皆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就中国未来的叙事学研究而言,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与思考。

(1)持续翻译和引进西方叙事学研究的成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迄今为止,叙事学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叙事诗学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西方学者均走在我们的前面,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使我国的学者更为全面了解西方叙事学研究的传统和前沿研究,对西方叙事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依然迫切。当前,西方叙事学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势头更是猛进,涌现出很多不同分支与派别,如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新叙事理论”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有余,当前国内的后经典叙事学译著颇有更新的必要。

(2)反思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局限与缺失。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及其问题》(2014)一文中,张江(2014:4)指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如下局限:“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作为当代西方文论一个重要分支,叙事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局限。比如,经典叙事学过于依赖语言学批评模式,一味寻求批评的科学性,失却了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关注,脱离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等;而后经典叙事学固然存在“语境主义转向”,但是过于迫切地迎合“叙事转向”的潮流,急于将其向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张。在高唱“叙事无处不在”的泛叙事观的同时,也冲淡了叙事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色彩。

(3)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与本土构建。傅修延(2014:1)指出:“叙事学并非独属于西方的学问,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关注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努力使其接上东方的‘地气’,这样它才可能发展成一门具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诚然,鉴于西方叙事传统、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叙事学的理论模式和批评概念在中国批评语境中势必会存在转换与适用的问题,甚至于narratology这个学科术语本身都存在“叙事学”与“叙述学”,而narrative也有叙述和叙事两种翻译,引发一定程度的混乱。^②叙事学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批评理论,在传播到中国之后,如何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学术语境,即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化或叙事学理论的本土构建无疑是摆在所有中国叙事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4)避免生搬硬套的叙事批评实践。叙事学作为一门适用性较强的批评理论,赢得了很多国内学者的青睐,被越来越多运用于具体叙事作品的分析实践中。但是,一方面鉴于包括叙事学在内的“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张江,2014:

4)。另一方面,部分批评者缺乏对叙事学理论及其核心概念的理解与把握,食洋不化,由此导致在运用叙事学批评理论时,生搬硬套,得出了诸多牵强附会、甚至荒诞不经的研究结论,丧失了叙事批评的魅力。上述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在运用叙事学批评理论时,既要认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扬长避短,同时也要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注释:

- ①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在1987年出现了两个译本,即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华明、胡晓苏、周宪翻译的《小说修辞学》,以及广西人民出版社的付礼军翻译的《小说修辞学》。
- ②关于“叙事”与“叙述”之争,详见赵毅衡的《“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第228-232页;申丹:《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219-229页。

参考文献:

- [1] 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Z].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 [2]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M]. London: Methuen, 1983.
- [3] 陈力川. 西方小说的视角——结构叙述学比较研究 [J]. 文学评论, 1987(2): 86-95.
- [4] 程锡麟. 图像叙事与《人间天堂》 [M]//尚必武. 叙事研究前沿.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1).
- [5] 傅修延. 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4): 1-24.
- [6] 胡亚敏. 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 [J]. 外国文学研究, 1987(1): 74-79.
- [7] 胡亚敏. 论叙事形态叙事的理论特质 [M]//尚必武. 叙事研究前沿.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1).
- [8] 胡再明. 《真品》的叙述艺术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4): 19-24.
- [9] 黄梅. 关于叙述模式及其他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4): 25-30.
- [10] 黄鸣奋. 当代西方数码叙事学的发展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5): 22-27.
- [11] 黄晓敏. 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 [J]. 外国文学, 1995(3): 80-83.
- [12] 金衡山. 《布拉斯岱罗曼司》中的叙事者和隐含作者 [J]. 国外文学, 1999(4): 85-91.
- [13] 金健人. 叙述者的叙事功能 [J]. 文艺评论, 1992a(1): 13-20.
- [14] 金健人. 叙述者的叙事功能(下) [J]. 文艺评论, 1992b(2): 24-31.
- [15] 赖辉. 论《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 [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2): 54-59.
- [16] 李贻. 小说叙述视点研究 [J]. 文艺研究, 1988(1): 113-125.
- [17] 凌海衡. 《阿拉比》——一种叙事学的阐释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3): 96-101.
- [18] 林岗. 建立小说的形式批评框架——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J]. 文学评论, 1997(3): 145-154.
- [19] 林青. 《变》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 [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2): 81-87.
- [20] 刘海涛. 西方叙述学探源——论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意识 [J]. 文艺理论研究, 1994(4): 40-45.
- [21] 龙迪勇.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3): 28-43.

- [22]龙迪勇.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11):24-34.
- [23]龙迪勇. 空间叙事研究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24]卢红芳,高晓玲. 故事世界:跨越与互动——跨媒介视域下的数码叙事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0(6):176-179.
- [25]罗钢. 叙述视角的转换及其语言信号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27-35.
- [26]马驰. 普洛普叙事理论 [J]. 文艺研究, 1991(1):157-159.
- [27]乔国强. 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申丹教授访谈录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3):5-10.
- [28]乔国强. 作为一门学科的叙述学:杰拉德·普林斯教授访谈录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2(3):110-114.
- [29]尚必武. 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与互补性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2):27-34.
- [30]尚必武. 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J]. 外国文学, 2009a(1):111-118.
- [31]尚必武. 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 [J]. 外国文学, 2009b(5):97-105.
- [32]尚必武. 修辞诗学及当代叙事理论——詹姆斯·费伦教授访谈录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0(2):153-159.
- [33]尚必武. 非自然叙事学及当代叙事诗学:布莱恩·理查森教授访谈录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2a(5):100-114.
- [34]尚必武. 后经典叙事学第二阶段:命题与动向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b(2):33-42.
- [35]尚必武.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 [36]尚必武. 跨越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叙事学的边界:布莱恩·麦克黑尔教授访谈录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4(4):166-171.
- [37]申丹. 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4):10-18.
- [38]申丹. 对叙事视角分类的再认识 [J]. 国外文学, 1994(2):65-74.
- [39]申丹. 关于叙事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J]. 中国外语, 2009a(5):60-64.
- [40]申丹. 叙事、文体、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J].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b.
- [41]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2]唐伟胜. 阐释还是诗学,借鉴还是超越——再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共存关系 [J]. 外国语, 2008a(6):74-81.
- [43]唐伟胜. 阅读效果还是心理表征?——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之间的分歧与联系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b(4):35-44.
- [44]唐伟胜. 伦理转向与修辞性的叙事伦理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3):9-18.
- [45]谭君强. 发展与共存: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2):27-33.
- [46]谭君强. 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一途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3):35-40.
- [47]谭君强. 审美文学叙事学:理论与实践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48]王丽亚. “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2):35-44.
- [49]王丽亚. 后殖民叙事学:从叙事学角度观察后殖民小说研究 [J]. 外国文学, 2014(4):96-105.
- [50]王泰来. 叙事美学 [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 [51]王阳. “叙述者”界说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6(3):127-131.
- [52]王阳. 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关系 [J]. 国外文学, 1999(1):15-21.
- [53]王阳. 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 [54] 微周. 叙述学概论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4):31-36.
- [55] 韦邀宇.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读罗兰·巴特《叙述分析导论》[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1):32-39.
- [56] 伍茂国. 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 [57] 肖惠荣, 曾斌. 叙事的无所不在与叙事学的与时俱进——“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广义叙事学论坛”综述 [J]. 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67-72.
- [58] 晓河. 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叙述理论研究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5(2):108-114.
- [59] 徐贲. 小说叙述学研究概观 [J]. 文艺研究, 1988(4):81-88.
- [60] 徐岱. 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J]. 小说评论, 1990(2):59-64.
- [61] 许德金. 自传叙事学 [J]. 外国文学, 2004(3):44-51.
- [62] 许德金, 王莲香.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4):28-34.
- [63] 姚公涛. 试论《窥探者》的叙事艺术 [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2):88-93.
- [64] 余杰. 开端叙事学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65] 张辉.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J].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2):54-74.
- [66] 张江.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4):4-37.
- [67] 张隆溪. 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 [J]. 读书, 1983(11):107-118.
- [68] 张毅. 当代叙事学的得失及其影响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1(2):23-27.
- [69] 张寅德. 叙事学略论 [J]. 山东外语教学, 1988 a(3-4):21-25.
- [70] 张寅德. 略谈叙事学的理论特征 [J]. 外国文学评论, 1988 b(3):32-37.
- [71] 张寅德. 叙事语式 [J]. 修辞学习, 1988c(3):32-34.
- [72] 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73] 赵克忠. 论约翰·契弗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2):6-69.
- [74] 赵炎秋. 狄更斯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成就 [J]. 东方论坛, 1995(4):75-79.
- [75] 赵毅衡. 小说叙述中的转述语 [J]. 文艺研究, 1987(5):78-87.
- [76] 赵毅衡. 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4):3-9.
- [77]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78]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79] 邹涛. 叙事记忆与自我 [M].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郭建辉

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①

——论泰戈尔短篇故事的情感与伦理

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 著 汤轶丽 译

(1. 康涅狄格大学 英语系, 美国 康涅狄格州 203860;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对于多数人而言,作者以个人习语的叙事方式编织故事。个人习语的叙事是一系列原则,它们使可能有因果联系事件的模仿得以实现为故事的产物,其中囊括原型,即定义故事种类的结构。这些原型,或曰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引导人们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以及虚构故事产物的解读。相差无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拥有一系列的原故事,其中占据重要特殊地位的类型便是基于情感依恋的原故事,这种情感依恋最初以父母与孩童的关系为特征。此类型的原故事着眼于情感依恋关系的搭建与伦理和政治维度的违反。具体言之,泰戈尔对于伦理以及政治的想象很大程度受稳固发展的依恋规范指引,并迸发出对原则的偏离,在故事的叙述中得以详细说明。这些偏离缘于情感依恋的威胁与缺失。要而论之,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质——情感依恋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反之,它也承担着为社会产物——羞耻所影响的风险,且这种羞耻感常与性别意识相关。

关键词:情感依恋开放性;情感依恋敏感性;作者想象;文学创作;个人习语叙事;原故事;羞耻;模仿;泰戈尔

How an Author's Mind Makes Stories: Emotion and Ethics in Tagore's Short Fiction

Patrick Colm HOGAN trans. by TANG Yili

Abstract: Authors may be understood as producing stories from their *narrative idiolects*. Narrative idiolects are sets of principles that enable the simulation of possible sequences of causally connected events. Such idiolects include prototypes that define classes of stories. These prototypes or *proto-stories* are complexe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tructures that guide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world events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fictions. Like everyone, Rabindranath Tagore had a range of proto-stories. But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认知批评、后殖民理论研究。

汤轶丽,女,浙江海宁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叙事学、英美文学研究。

one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im. This was a proto-story based on attachment, the sort of bonding that first of all characterizes the relations of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is proto-story centers on the formation and violation of attachment relations, with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at surround such violation. Specifically, Tagore's ethical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 largely guided by the norm of securely developing attachment. It was elaborated into stories by reference to deviations from that norm. Those deviations are caused by attachment threat 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points, Tagore's attachment proto-story suggests two key ethical virtues—attachment sensitivity and attachment openness. These, in turn, may be disturbed by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hame, often in relation to gender ideology.

Key words: attachment openness; attachment sensitivity; authorial imagination; literary creation; narrative idiolect; proto-story; shame; simulation; Rabindranath Tagore

说话者不免都是以个人习语的语言系统遣字造句,这一套复杂的规则定义了我们个人内在的语法体系。正如笔者在《作者的大脑如何建构故事》(2013)一书中所述,故事讲述者以个人习语的叙事方式讲述故事,这套复杂的原则使我们的讲述得以实现。个人习语的叙事包括定义了故事种类的原型——即“原故事”(参见 Hogan 2011c)。原故事是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复杂融合,指导着我们对于过去与现在事件的解读、对于未来事件的期待、对于假设或反事实事件的模仿以及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的情感反应。原故事使一些更基础的认知结构,如插画式记忆、语义原型和情感倾向等,与范围更广的叙事复合物融合。他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诠释、现状的分析以及憧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道德评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似乎经常受这些一定数量的原故事引导,他们在不同情境下活动或与不同的希望与紧张之感“藕断丝连”。这些原故事通常都会与跨文化的叙事结构如爱的浪漫情节并驾齐驱,与社会、爱人的分离等戈矛相见。然而除去这些共通的特征,原故事也会被贴上异质的认识标签。

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原故事不仅仅指引我们理解自身与父母和同事的关系,或是对在日常口语式的故事讲述中,政治家道德或非道德行为的衡量,除这些日常普通的应用外,原故事也是文学叙事作品的指引师。事实上,翻阅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原故事具有与作品高度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诚然,如果作者是成功的“能工巧匠”,那么这两种性质必将在作品中得以部分体现。如果作者不是一直重复自我的话,作品中的一致性须要有足够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性,我们或许能将其视为可变因子或是参数的复杂作用。作者故事中的这些原则多为大同小异,然而,每一则故事对于参数的设置都将有不同程度的差异。^②论及原故事的特殊性,可以确信的是主宰原故事的原则复合物不具有异质性。定义作者原故事认知和情感维度下的网络对于读者来说也必须具有可达性,唯有如此读者方能跟随他们自身独有的故事情节,体验适当的情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推断相关主题的含义。

与他人一样,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有一系列原故事,并指引着他对自己以及自

身故事叙述的理解。然而其中一则原故事或是一种原故事类型,对他而言,举足轻重,至少在他的短篇小说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一原故事类型基于情感依恋,着眼于情感关系的搭建与伦理和政治维度的背叛。情感依恋的温情纽带最常见于父母与孩童之间,梵文学者将其称之为 *vātsalya*。这种情感似乎也成为泰戈尔的主旋律。换言之,在他的作品中,这种情感依恋担当着最基本的阐释性角色,不仅在叙事方面,在审美、伦理甚至是政治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嫁妆制度)。

具体来讲,在之前的作品中,笔者曾指出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展现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性——情感依恋敏感性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Hogan, 2011c, 2011b)。情感依恋敏感性是对于情感依恋纽带的认同与尊重,包括其背叛之痛和对于人类福祉本质重要性的接受。情感依恋开放性则是对于他者独立于他们社会类别或地位的情感角色认同。社会分类通常包括将一些人置于圈外(通过种姓、种族、宗教、国籍或者其他身份类别),以此将其从可能的情感联系中驱逐。这种驱逐通常包括将圈外成员厌恶化,而这种厌恶则是情感依恋的对立面。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笔者将从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全景描绘以及其伦理和政治结果入手。对于泰戈尔作品的聚焦出于三个重要理由:其一,泰戈尔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主题紧密相关联的作品,恰到好处并不冗长,避免了诸如抒情诗(因为其故事结构而不能得到完全发展)或小说(有长度的极端化以及数量少的倾向)的弊端。第二,泰戈尔的故事在笔者看来,是现代文学中的巨著,值得不断重复和深入地研究。卸下诺贝尔奖的光环,泰戈尔作品在孟加拉文学圈外并未得到充分的赏识和正确的评价。最后,基于笔者自身对于泰戈尔作品的情感和伦理性研究,泰戈尔对于情感依恋敏感性和开放性的强调,对于身份类别对峙的相似态度,在当下似乎大可借鉴。

1. 威压与意识形态: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基本参数

与所有的原故事一样,泰戈尔的情感依恋原故事折射了一个理想化的喜剧轨迹,简言之便是事物在无阻碍前提下的运作。为了定义其结构,我们需要从变化及其意义排异的轨迹范式入手。这种喜剧式的叙事以父母/孩子的稳定依恋或是 *vātsalya* 为起点,并逐渐自然地发展为夫妻之爱。传承此脉络,人物富有伦理上的积极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有自然倾向性。通常来说,这一基本的叙事序列并不会塑造故事。其自然属性的预设使其不具可述性,它更多意义上是可述性的背景,因为一系列事件或许能充分调动听者与读者的兴趣。而当这一理想化的轨迹遭遇分裂瓦解,可述性应运而生。在泰戈尔的例子中,可述性出现在情感依恋的持续和发展受到威胁之时(如对于父母/孩子关系的维护产生危机或是以夫妻之爱代替父母之爱)。这一类的威胁有很多潜在的源头,这些源头为泰戈尔故事的变化线索提供了参数。对于泰戈尔而言,在众多因子中我们应首先聚焦于社会地位和

规范的功能,具体而言即威压和意识形态。

威压,并不仅仅指涉武力和字面意义的监管,也包含物质和重要的经济因素。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会破坏父母/孩子的情感依恋(如因贫穷而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者是减少婚姻的成功率(如当女孩没有嫁妆)。进一步而言,经济的制约会加剧情感依恋的脆弱度。泰戈尔原故事的一大特点便是没有对贪婪的房东或者剥削的资本主义者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反之,泰戈尔更倾向于将强弱两级的角色配对。另一方面,泰戈尔的原故事强调了情感依恋的非敏感性,驱逐了弱者的角色以及他们紧随的理性解释。这一点在短篇故事《邮政局长》中得以体现。故事中的邮政局长对于年轻助理勒袒,一位人不敷出的孤儿产生了依恋的情感。在离别之际,他尝到了隐约的苦涩,当片刻的罪恶感战胜了离别的苦涩,他思索到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的哲思,并以此缓解了自己的内疚^③。

进一步分析,当较为弱勢的角色表现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维系这种依恋并没有实际的可能性。就如在《邮政局长》中,结局或许就是社会的谴责,而不是理性的解释。在《妻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妻子姆里纳尔发现并接受了年轻孤女宾杜对她的依恋。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情感的牵连并没有将宾杜从一段糟糕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在宾杜悲剧性地自杀后,对于引发这场悲剧的社会规范,姆里纳尔并没有继续支持,她主张将自身的自由作为反抗这些社会规范的最初动机。

第二种威胁的类型来自个人内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性别意识。在此,我们邂逅了社会渊源的情感依恋非敏感性和撤移(这样引起了情感依恋开放性的缺失)。这种非敏感性和撤移并不是天然赋予的,而是呈现了被依恋关怀敌对阵营的社会行动者所规训的倾向。当我们再次走进泰戈尔原故事的世界,我们找到了那些通过对他者的羞辱践行性别认同原则的角色,并以此否定了情感依恋稳定的自然发展。《家庭主妇》便是显著的例子。故事中小男孩阿苏与妹妹一起玩洋娃娃,这种磨灭男性特征的行为遭到了老师斯巴司的羞辱,而这种羞耻感也是阿苏男性意识启蒙的一部分。

故事《笔记本》对于情感依恋的意识形态部分亦有深刻描绘,与前者不同的是受辱的性别由男孩换至女孩。故事呈现了女孩欲将其情感依恋关系转至书写的普通愿望。自然而然,这种书写在她的笔记本中存在,也传递给了她的依恋对象,以此成为情感分享重要过程的一部分(Rimé, 2005)。此外,她关于依恋对象的书写包括他们的非敏感性和情感迁移。然而她的丈夫拿走了她的笔记本,并羞辱她让其放弃这种想象性的表达。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泰戈尔原故事的价值。社会的描绘大抵是一边倒向于男孩和男人的依恋画面(就如阿苏的例子),对于女性和女生却采用看待弱者的姿态,然而泰戈尔的原故事更为复杂,社会意识在其看来扭曲了对于男女性别依恋那阳光普照般的自然发展,如在《妻子的信》中,姆里纳尔被阻断了依恋稳定关系中的情感分享,甚至对于这种情感分享的想象创作也难逃厄运。事实上,这种认识对于她最终的解放至关重要。

2. 控制者、中间者与受控者角色

在威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政治性分类,包括社会等级制度的区分,特别是性别等级,在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类型的分析中举足轻重。然而对于分类的发展存在很多参数,如之前提及的强势和弱势角色的影响,其中一个参数便是关于控制者和受控者阵营的划分(如男女之分)。另一参数涉及道德行为者角色,即道德决策制定者,与前者控制者/受控者的参数互相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被赋予首要道德行为者的角色通常占据控制者的地位,他/她展现情感依恋的非敏感性,如《邮政局长》一文中,邮政局长在性别、阶级和年龄中位处控制者的位置,同时也是道德决策的行动者,因为在他们关系中,勒坦有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局长所表现的依恋非敏感性清晰可见,特别是当勒坦无意识的羞耻感出现时这种非敏感性愈加突显。例如当勒坦欲与局长一同回家之时,他为之一笑,而这笑声一直萦绕在勒坦的耳边(p. 45)。

同样在《笔记本》中,我们在乌玛和她哥哥的关系中亦能窥见控制性的道德行为者。当乌玛被硬生生困在姻亲家中时,故事感人的泪点也达至高峰。她在笔记本中写下:(哥哥),我祈求你,就这一次,把我带回家吧——我并非惹怒你而是向你祈求(p. 143)。当然,戈宾德拉尔是无法看到妹妹在笔记本中的文字的,然而对于妹妹文字诉求上的不闻不见是因为戈宾德拉尔无法听见她的需求,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征兆。

另一方面,所有控制者的角色都逃脱不了依恋非敏感性的命运,这种说辞未免有失偏颇。一些控制者角色的经历受自身依恋经历的影响并随之改变。就如在《编者》的故事中,一位鳏夫卖文为生,为其女儿的嫁妆做一部分储备。从这层面上看,嫁妆体系扎根于他们的离别。然而,他很快沉迷于讽刺创作的成功之中,这一份迷恋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忽略甚至虐待女儿——帕拉巴哈,从而导致她变得害怕父亲(p. 123)。依恋关系的瓦解如此显而易见也如此的深刻,最终他的女儿遭受病痛的折磨。在泰戈尔的故事中,读者对于弃妇(弃女)的死亡并不陌生,并为这最坏的情形所堪忧。然而这里并没有社会约束,没有控制者第三方要求的牺牲,也没有给女儿的选择,这里存在的仅仅是依恋关系的两者。当帕拉巴哈向父亲恳求时,他潜藏的依恋之感再度觉醒:我现在意识到女孩被病痛折磨,渴望她父亲满心的关怀和情感(p. 124)。

在此,父亲面临了道德选择的境遇: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为女儿奉献自身,他可以在自私自利的道路渐行渐远,也可以做出牺牲,最终他决定选择牺牲并金盆洗手(p. 124)。然而,这种牺牲与许多女性的牺牲并不相同,不带悲剧色彩,事实上,牺牲带给他难以想象的快乐(p. 124)。

这也为我们的目录添加了另一参数,在依恋关系中,控制者角色不仅需要非敏感性和合理的解释,当外界不存在严重的限制和压迫时,控制者角色也会被唤醒情感依

恋的敏感性,进而受到依恋关系的影响。反之,这也会带来两方的喜剧式牺牲。

此类型的另一则故事便是《喀布尔的水果商》。事实上这则故事异常重要,因为其彰显和体现的依恋敏感性并不存在于家庭之中,而跨越了国籍和宗教。故事的情节复杂,围绕于一位贫穷的阿富汗男性哈玛和上层中产阶级孟加拉作家的家庭。哈玛为了赚钱养家而来到加尔各答,种族、贫穷和教育缺失的背景使他身处孟加拉家庭的下层,事实上也使其成为了“圈外人”。尽管如此,他与家中的小女孩米妮成为好朋友。他们渐渐建立起依恋关系的纽带,而这颇为反常。哈玛因为报酬与一位客户争执不下并刺伤了客户,从而锒铛入狱。若干年后哈玛出狱,他来到那家人希望能见米妮“片刻”(p. 118),他的到来正值米妮的婚礼,孟加拉作家解释到在这重要的一天哈玛应该离开,换言之,他暗示道哈玛就像遗孀一般不祥。当哈玛将一小份水果递呈给作家,拜托他将其转交给米妮时,作家试着向他支付水果钱。到此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泰戈尔标准的原故事再现,依恋关系也得以呈现,第三方人物为了减少依恋关系的代价而将依恋关系中的双方分离。回到这个标准版本的故事,哈玛拒绝了这笔钱。

然而,故事却在此转折。哈玛和米妮之间依恋关系从未完全清晰地浮出水面。如今哈玛解释到在阿富汗他有一个女儿,与米妮的相见使他陷入对女儿的回忆。他从衬衣中拿出了陪伴多年的陈旧的纸——他女儿的手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最基本的情感依恋关系是哈玛和其女儿,因为贫穷而导致了这场重要的离别,也因为养家糊口他才来到了加尔各答。至此,存在于孟加拉作家和哈玛之间的圈内圈外之分也得以消解。思忆起自己和女儿的情感依恋,作家讲述到:“我忘记了他是阿富汗的葡萄商贩,我是孟加拉先生,我也在那时懂得他是一位父亲正如我一样(p. 119)。他称哈玛的女儿为帕尔瓦蒂,一如之前他称自己女儿为杜尔伽(p. 118)。这是同一位女神的两个名字,而这个女神在许多孟加拉歌曲中都品尝了亲人离别的滋味(MeDermott, 2001:123-151)。

另一个转折也再次降临,控制者角色在自身情感依恋感受的影响下做出了抉择,首先他遗忘了之前对于哈玛不详现身的担心,呼唤着他的女儿。在她走之后,他也决定做出牺牲,赠予哈玛回家路费。他尝试修复情感依恋的关系,而不是将人类的关系金钱化,将情感依恋纳入价格的范畴。正如之前编者发现自己的牺牲比写作更为愉悦,作家也感受到了,较之驱赶拒绝这位原以为不吉祥的伙计,为其牺牲获得的精神福祉远远大得多。因为哈玛的经济救济,他不得不在婚礼盛宴中缩减开支。然而,他向哈玛解释道:你和女儿神圣的团聚也会庇佑米妮(p. 120)。

相比于更为直接明了的控制者和受控者角色,文本世界也存在中间者角色,例如,上层阶级的女性与较低阶级的女性相比在社会地位上更为优越,但俯首于上层阶级男性。当她们处于依恋关系之外时,愈显恶意指和敌对,更像控制者角色,就如乌玛的姻亲姐姐们,在《笔记本》中嘲笑讽刺她,又如《得与失》中尼鲁帕玛残忍的婆母(下文将分析此故事)。与此相反,当中间者角色身处依恋关系中,他或她或许没有控制

者那般非敏感。

让我们再一次分析《妻子的信》中的姆里纳尔。她比婚姻中的宾杜更显社会等级的优越性，然而她和宾杜作为男权结构中的女性共享受控者的地位。毋庸多言，这并不保证情感依恋的敏感性，就像宾杜的姐姐，与姆里纳尔同享已婚身份却低处姆里纳尔和宾杜女性身份之下，对待宾杜态度恶劣。姆里纳尔或许未必像宾杜对待困境一样这般敏感，她或许能够做一些事阻止宾杜糟糕的婚姻。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取而代之的只是为自己在这场悲剧事件所处的位置而寻找理由（正如邮政局长所为）。当然在事件发生时她做出了道德选择进而追寻自身的解放，或许反之能鼓励他者，从而避免宾杜式的悲剧再次发生。这种选择也许是由她作为中间者境遇的部分职责所致，不论是控制者抑或是受控者。

控制者和中间者角色体现的主体能动性并不能说明受控者的无能为力。在一些例子中，他们成为故事道德行动者的中心。这一例证也将马上得以陈述，甚至在勒坦这一例子中，我们可见她们并不是被完全限制，她们能够并且也做出了道德选择，只是这些选择非常有限。她们经常与两项选择相关：①与依恋纽带破坏制度的同谋；②自我牺牲。在泰戈尔许多故事中，有时候情感依恋的受控者角色会有做出真正道德或政治性选择的可能性，这一刻或带有戏剧色彩。对于勒坦，当邮政局长给她钱时，她面临着道德选择——她应该同意他们的关系是未付报酬的劳动，简化为金钱交易？还是应该牺牲她迫切需要的金钱保障？最终她选择了牺牲，这种牺牲保护了她的尊严却丢失了物质的富足。

在《邮政局长》一文中，泰戈尔意欲暗指嫁妆是压迫女性的实践表现（勒坦贫穷孤儿的身份已经显示了其嫁妆的缺少），在另一些故事中，他矛头直指寡居期出现的问题。在泰戈尔写作生涯中，遗孀所承受的严重缺失感一直是其思考的话题。在孟加拉国，那时候寡妇通常不能再婚，不能打扮装饰自己或穿鲜艳的衣物，不能分享人生普通的乐事，例如品尝一些食物。遗孀，正如兰姆说道，甚至是危险不详的象征（1999：542），在泰戈尔的揭露批评后，这一说法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实际上，遗孀也将自身视为行尸走肉而非鲜活的生命。

在《生者与死者》这则故事中，泰戈尔将这个说辞作为遗孀的隐喻。故事的开篇提到了与莎拉达沙克家族同住的遗孀——卡当比尼。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她并不是路人甲，与寻常家庭一般，她与姻亲同住，然而她并不是家庭中真正的一部分。故事的第一篇章建立了卡当比尼和她侄子紧密深厚的依恋关系，第二篇章告知了卡当比尼死亡的噩耗，事实上她仍健在，然而被误认为死亡并差一点被火化。尽管最终避免了火化的结局，她仍然认为：“我不再属于世上存活的人类，我是可怕的邪恶诱引。”（p. 34）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法颇为怪异，她似乎对于死亡与生存的状态苦恼迷惑，事实上这描绘了当时遗孀普遍的生存画面。

当最终踏入家门时，她仿佛是家庭中的鬼魂。年轻的侄子接受了她并让她保证

“不会再次去世”(p. 40)。这种行为符合了情感依恋纽带和中间者角色(部分控制者,部分受控者)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侄子是男性(因而为控制者),但他又是孩童(因而为受控者)。这类人物试图接受情感依恋的感受并为之报答。然而部分成年控制者相继暴露了社会的暴行与疯狂,并制造了孩童的创伤。家庭成员谴责卡当比尼对于孩子的恶劣影响(p. 41),在他们看来她的身份不是幽魂便是不详的遗孀。之后她试图宣告自己的存在。表面上,她意识到自己并未死亡,然而,从隐喻的角度看来,这一位女性面对着给予她生命意义的依恋关系,决定宣告驳斥自己并不是一位死亡的遗孀,但这活生生的人却比任何人更具不祥之感。

不幸的是,卡当比尼似乎并未找到方式证明自己的生命,公开的宣告也经受不住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事实上,姻亲对于遗孀的冷酷以及盼死的心情是寻常不过的。吊诡的是,在她死后,他们却对她宾礼相待,首先是葬礼仪式的举行——这重大的场合展示了人们的责任感,不管在人死前他们的责任感有多渺小。卡当比尼拥有最受限制的狭隘选择,如勒坦一般,她选择牺牲,石沉大海。泰戈尔的尾句看起来有些简单但却是一个明智的悖论——卡当比尼用她的死亡证明她并未死去(p. 41),但这一点确是遗孀的亲身经历。

在泰戈尔情感依恋的原故事中,《得与失》更能清晰体现这点伦理性的发展。故事带我们回到万恶的嫁妆制度,并详细展现了控制者角色完全掌控道德选择的能力。兰山达有5个儿子,还有老幺女儿。当女儿尼鲁帕玛到了适婚年龄,兰山达找到一位出身名门之家冠以“雷尔巴哈杜尔”之姓的新郎。(p. 48)不幸的是,他的宝贝女儿进入婚姻的门槛如此之高——嫁妆异常丰厚。仪式举行之际,兰山达筹得的嫁妆甚至还未有总数的一半。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一般原则,名门之家的父亲恶言相对。他本可以对兰山达和尼鲁帕玛进行羞辱,在最后一刻拒绝这场婚姻,但新郎阻止了他。结婚后,年轻的新郎需要离开,在和姻亲的相处中,尼鲁帕玛饱受冷眼相待,她的父亲在看望女儿时不断蒙羞(p. 49)。

故事中,父女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情感依恋纽带,(但)因为嫁妆却被姻亲分离。父亲意识到唯有的一种方式能终结羞辱并能自由地见女儿,那便是嫁妆的全额支付。他千方百计筹集却仍只筹得总数的一部分,并换来了再一次的羞辱,亲家表示部分的支付对他来说毫无作用(p. 50)。最终,兰山达决定变卖房子,即使这会让他儿子们无家可归(p. 49)。

当尼鲁帕玛听说了此事,她面临着道德难题并有能力做出选择:她可以接受这一笔钱或者放弃,拒绝与制度的苟合。毫无疑问,她选择放弃并作出牺牲。然而她表达决定的方式至关重要。与泰戈尔其他故事类似,羞辱是强化性别标准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在这则故事中,性别标准与阶级等级制度互相影响,因为父亲试图撵出儿子们而增加其阶级优越感。兰山达在与尼鲁帕玛解释卖房时辩护道:“倘若我不支付这笔钱,我将永远蒙羞,你也如此。”(p. 52)这里的羞耻意指社会界的鄙视,特别是富裕

的雷尔巴哈杜尔一家，“如果你付了钱那么羞辱会更大”，这句话中的羞辱则意指道德错误——敲诈的合理解释。

与勒坦一样，尼鲁帕玛选择捍卫家庭以及自身的尊严，然而代价之大可想而知。知晓她对其父亲的建议后，尼鲁帕玛的姻亲对她的态度愈加恶劣，致使她最终因为未就医而抱病身亡。尼鲁帕玛对于金钱的牺牲导致了生命的逝去，融合了《邮政局长》和《生者与死者》的两种牺牲方式，首先放弃了物质的富足继而放弃她的生命。雷尔巴哈杜尔一家停止了他们的虐待，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惩罚》的故事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道德伦理性。故事中的两个兄弟：杜克汉姆和赤丹被拉做农田工壮丁，在劳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遭到了指责和羞辱（p. 126）。回家后，杜克汉姆因为没钱买食物而遭到妻子的羞辱，“我必须走到大街上去挣钱吗？”（p. 126），经历了一天的蒙羞之后（p. 126），杜克汉姆的怒火终于在对其男性尊严的侮辱中点燃。他粗暴地殴打妻子，结束了她的生命。在此我们重逢了不断出现的原故事元素，性别制度的偏离总是会被羞辱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在这个案例中，羞辱部分来自女性（这同样出现在其他的故事，如《傻子的黄金》，当丈夫无法履行性别角色时）。虽然如此，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暴力倾向于从控制者这方下滑至受控者个体或团体中。杜克汉姆的受辱直接作用于妻子，尽管他最终的羞辱来自经济体系，迫使其从事这份蒙羞的无报酬工作。

赤丹同时也面临了两难境地。他与弟弟有着深厚的依恋纽带，并对其有道德上的责任，这些促使他帮助弟弟逃离诉讼。当弟妹之死被发现后，他责怪自己的妻子仙朵拉——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p. 128）。社会等级中的暴力下滑现象将仙朵拉置于道德尴尬的处境，一方面，这使她成为道德的能动者，但同时却严重限制了她的选择。泰戈尔重描了仙朵拉与赤丹的纽带联结，引导我们将赤丹的控告视为依恋关系的背叛而非错误，因而仙朵拉以伤后自尊的情感给予回应（p. 131），并对这种背叛愤恨不已。这与《邮政局长》中勒坦对于经济救济的反映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次的叛离更为深刻。事实上，故事的叙述者似乎将仙朵拉一系列行为全部归因为这种自尊心，然而就此看来，叙述者并非可靠。

具体看来，仙朵拉有三个选择：首先，她可以说出真相——她的小叔子杀了他的妻子，选择的后果则是小叔子的死亡，这不仅违背了家庭的使命，也与殖民体系的法律制度同流合污，而这套制度引发的剥削和羞辱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第二个选择是归咎于弟妹，例如可以辩护自己因受其攻击而自卫。然而这种诽谤死者的行为损害了仙朵拉的名声，甚至会扭曲她的精神人格，因为她不会接受被弟妹袭击的说辞（p. 131）。最后的选择便是牺牲，这也是她最终的选择。这种牺牲深层次牵连的依恋缺失浮现在故事的末尾几行，在绞刑之前，她欲见其母亲（p. 133）。

然而这又成为故事被忽略的难题，文章的标题为《惩罚》，很明显最终受罚的是仙朵拉，但同时存在另一个惩罚——赤丹的痛苦，他并不愿意将妻子送上刑台，并试

图帮助其脱罪。事实上,故事的结尾他想见妻子,但是妻子愤怒地拒绝了这个请求。仙朵拉是对赤丹夸张的非敏感性的一部分惩罚,这是一个线索。他的非敏感性体现在他甚至丝毫没有意识自己的控告将伤害仙朵拉,他考虑了弟弟的精神状态和环境,但却可能因为男/女性别认同的二分而忽略了妻子。无论如何,这种牺牲没有逃脱报复,但痕迹却愈变愈淡。

在故事《骷髅》中我们发现了这类原故事的变化,故事带我们重新回到寡居的话题,讲述了一个鬼魂萦绕在叙述者的家中,一晚,他们促膝相谈,鬼魂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婚后两个月,她便开始了悲惨的寡居生活。她的姻亲将丈夫之死归责于她,并把她送回娘家。作为遗孀,她并不安分,偷偷地穿着鲜艳的纱丽,发际带着花环(p. 87),因为受限于对外界的接触,她只能见到一位家族外的男性,年轻的医生、弟弟的朋友。医生的瞩目表达了对这位年轻女性的情愫,她也慢慢坠入情网并确信两情相悦的事实,尽管诉说衷肠在她的立场看来困难重重。直到得知他将要结婚并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跟随原故事套路的走势,她感受到了背叛,尽管我们不能精确的辨明她感受背叛的程度。医生自在地与这位年轻遗孀打交道,因为她寡居的事实,他有着很多暗示,唯独没有将其作为配偶的想法。无论如何,对于她日增的依恋,医生感受到了非敏感性的惯例罪恶感。

从这点看来,年轻遗孀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清晰明了,如何面对在她看来是背叛的非敏感性呢?在此,泰戈尔在《惩罚》中提及的报复再一次得到升华。年轻遗孀对医生下毒,以此作为他背叛的惩罚,同时阻止这种背叛。不出意料,报复并不形单影只,他的出现伴随了牺牲,即自杀。年轻遗孀用传统结婚的行头,给头发染了色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又邂逅了《生者与死者》相似的隐喻结尾:这位年轻女子只有以尸体的躯壳成为新娘。她最终达致圆满,并非与她深爱的医生,而是死后与其他医生,她的骨架被用作解剖学的示范道具。

3. 泰戈尔的道德复杂性:自由和正道(Dharma)^④的种类

对于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的细节,我们已经接触不少。几乎每一个例子我们都会发现社会等级和身份类别约束着依恋的敏感性和开放性,并造成痛苦的依恋缺失。然而泰戈尔对于世界的模仿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原故事或依恋基础的理想化。事实上,甚至于他的依恋原故事都包含了许多其他的价值隐意,有时候这些价值特别是与依恋开放性所折射的承诺格格不入。

例如《假日》这则故事,在很大部分与情感依恋相关内容无关。故事中,朝气蓬勃的男孩法缇克被送去叔叔家接受教育。与母亲分离后,他发现自己不受待见,无人关爱,甚至在叔叔看来是不详的“恶魔之星”(p. 110)(社会阶层的底端人物在泰戈尔笔下大抵都是不详的,因为经常是被羞辱的对象)。叔叔家反对的氛围和经常试图羞辱他的老师(p. 111)对他的成长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迫切地需要母亲,无心学

习,也成为了班级里最“愚蠢和怠慢”的孩子(p. 110)。当他发烧时,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并试图回家。而回家的途中他的病情愈加严重,在与母亲团聚不久后他便去世。

正如综述所点明的那般,《假日》契合了我们所考虑的结构,然而故事的细节同样也暗示了一些另外的内容。整个情感依恋的违反和接踵而至的悲剧都是男孩因他的调皮不受训而遭受的惩罚(p. 109)。换言之,依恋的破坏不是等级和贫穷,而是对孩子“自由”的限制(p. 110)——倘若故事中的自由与情感依恋的安全感密不可分。

其他一些故事亦有对自信和自由的聚焦。《妻子的信》是其中颇为有趣的例子之一,故事预设了情感依恋和自由的潜在矛盾。具体来说,姆利纳尔离开丈夫的决定带来了一系列与自由、职责和正道相关的问题。印度的伦理传统与正道的不同分支有所区别,包括家族正道的不同种类,如夫妻之间的正道。对于正统的伦理学家来说,当存在互相矛盾的职责时,家族或是自性(Swadharma),即特指由家族的地位或种姓等决定的正道,应优先考虑(O'Flaherty, 1978: 97)。然而,大体上一些自性也会有颇具争议的违反现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濒临灾难或危机。在一些情境下,寻常的道德原则不再适用,倘若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没有渠道获得食物,那么(有人或许会有争议)危机情况就会战胜普众道德观念下的勿偷窃警示,^⑤这种情形就会引起危机正道——只在千钧一发时刻被允许的行为(Monier-Williams, 1986: 143)。

姆利纳尔离开的决定毫无疑问与普遍的家庭法则相违背,或许这种违背更具新意,因为它印刻了泰戈尔对于家庭正道变化版本的解读即依恋敏感性。具体言之,15年家庭的朝夕相处并没有建立起些许的情感依恋关系,这似乎不太可能,在此,关系一词似乎定义了泰戈尔道德关怀的前沿。如何调和姆利纳尔对于情感依恋的明显忽视和泰戈尔故事蕴含的普世伦理及情感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种方法便是以危机的视角考虑。宾杜并不是简单的自杀,而是整个制度诱发了她的自杀,因为危机的情境源于婚姻制度。姆利纳尔试图从这个制度逃离,在此情况下,她放弃了自身的依恋纽带——她的安全感——这便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不仅给予这位女性更多自尊,也给予她基本的自主。

这也将我们带至最后的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触及了我们所讨论的正道,故事更确切地讲,以“危机”(Āpad)命名。故事中,年轻女性基兰与丈夫沙拉特结伴前往金德纳格尔疗养。在恢复期,她邂逅了一位年轻男孩尼尔康塔,旅行乐家的一成员(p. 163)。基兰与男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依恋纽带。事实上,两者关系与勒坦和局长之间的关系并不背道而驰。泰戈尔解释道,在他们相处期,尼尔康塔完成了青春期向成人的过渡,18岁领域的跨入使他们的情感愈加成熟。因而当基兰仍以与对待男孩的方式与他相处时,尼尔康塔颇为受伤和尴尬(p. 165)。

与其他中间者角色(尤其女性)一样,基兰对尼尔康塔的感受仅仅是部分的非敏感。实际上,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悲痛地意识到对一个终将离别之人产生短暂情感是多么严重的错误(p. 168)。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她欲与男孩同行。在此

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与局长有着明显差异。故事中,基兰与依恋关系外的受控者角色也有很明显的差异。她的丈夫,沙拉特对男孩怀有敌意,屡次有意无意的打他(p. 169)。沙拉特的弟弟萨迪仕不仅呈现对于男孩的依恋非敏感性,甚至对其不屑一顾,断言萨迪仕对于他们离开的痛苦其实源于物质的贪婪(p. 168)——一个重复出现的动机。遗憾的是,基兰并没有一直坚持与尼尔康塔的陪伴,而是向丈夫和弟弟妥协。这也反映了中间者角色的问题——他们有一定的敏感性,然而无法随心所欲,抑或是错过时机。《妻子的信》中的姆里耐尔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在他们离开之前,基兰试图赠送尼尔康塔礼物,表面上,这与邮政局长有一些相似点。然而,基兰的爱心礼物(p. 170)表达了她的情感,而不是将他们的关系化为金钱交易。为了避免尴尬,她将礼物放到了他的盒子,却不幸的引起了误会。男孩自觉不能保留这个盒子,礼物也无缘相伴。因此他做出了普遍的牺牲——“净身出户”,就像勒坦做出的物质的牺牲。

但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并不是对范式的契合,而是决定我们标题的附加因素和道德复杂性。当萨迪仕在基兰前羞辱尼尔康塔后,尼尔康塔从萨迪仕桌中偷走了他尤为珍贵的墨水瓶。沙拉特和萨迪仕指控尼尔康塔,基兰为其辩护,当两兄弟提出搜尼尔康塔房间时,她坚决抵制,做出了最初的道德选择并坚定了自己的自主性。在她把礼物放在尼尔康塔的盒子中时,基兰偶然看到了墨水瓶,尼尔康塔碰巧看到了这一幕,也促使他抛弃这个盒子选择离开,以此向基兰证明他并没有偷墨水瓶,并对萨迪仕残酷的行为作出回应(毕竟,倘若他真的贪婪,也会保留这个墨水瓶)。基兰的境地更为复杂。从正道的角度来看,她似乎有义务说出发现的真相(而不是保守谎言),并将墨水瓶物归原主(而非与小偷保持统一战线)。然而,她都未做到。在尼尔康塔离开之后,她仍拒绝对其房间进行搜查。之后她处理了墨水瓶,违反了正道的普遍规则,至少在与沙拉特和萨迪仕的情感依恋纽带中做出了叛离的行为。但隐含作者似乎对她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在标题中给出了支持的理由,即正道的普遍规则并不适合危急情形下的情境。

依恋原故事与危机正道(āpaddharma)是有保持一致的可能性。危机是来源于萨迪仕最初对尼尔康塔的羞辱和基兰早期的依恋非敏感性。对于男孩的再次羞辱是错误的,即使他不在,但重复证实这些道德错误也有失偏颇。唯一能确认的是沙拉特和萨迪仕的偏见以及未来对于情感依恋纽带伦理和情感维度的叛离。

然而基兰的行为同样也阻止了对于男孩任何的追求和惩罚,给予了他离开的自由,也巩固了基兰自身的自主权。因而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依恋敏感性给予了其他依恋纽带违背破坏的生存空间,同时自由与自主也取代了依恋基础上的职责。

1985年早期,“Āpad”一词问世。同年之后,泰戈尔发表了另一则讲述相似事件的故事《宾客》,但却给予不同的结局和意义(Radice, 2005: 300)。这则故事同样讲述了一个剧团的成员,一位年轻男孩塔拉巴塔,被另一个家庭所领养。故事中,他对

家庭中叛逆的女儿查璐产生了感情。纵使有冲突,查璐也对他的感情愈渐清晰明了。最终,这个家庭帮他找到了真正的家,并欲让两位年轻人结婚。然而,当婚礼即将开始时塔拉巴塔消失了。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节符合泰戈尔原故事的惯例。依恋关系因为抛弃年轻女性的年长男性所表现的依恋非敏感性而被破坏。然而,故事中,塔拉巴塔并非犯了明显的错误,事实上,在结尾处能看到暗示,捍卫找寻自由的权利无可厚非:在爱情和情感纽带禁锢之前他逃离了(p. 211)。在塔拉巴塔和神灵奎师那(Kṛṣṇa)的联系中这一点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一跃从吹长笛转换到声名远扬“偷心贼”的形象(p. 211)。奎师那是一个虔诚的爱情追寻者,然而从未得到完美的生活,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冷漠,事实上他富有爱心,就像塔拉巴塔。但即使如他也无法在这个物质世界中达致圆满。这并不是说塔拉巴塔就是奎师那,毋宁说泰戈尔将两者联系,并以此使塔拉巴塔的离开更易接受。

这则故事似乎与我们探讨的普遍模式相悖,然而当泰戈尔讲述道德断层是他最致命的弱点和最大的力量时^④,这种不一致或许正是他所追求的。泰戈尔情感依恋原故事承担着风险,即依恋纽带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包括自由。当依恋的关系被扭曲甚至被阶级等级制度、父权制(父权制影响下的嫁妆制度和寡居禁忌)和其他社会压迫结构破坏时,泰戈尔似乎意识到保护受控者的情感依恋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仅考虑这一点远远不够,正如《宾客》故事这般部分抵消了与泰戈尔其他故事的伦理不平衡性。泰戈尔将情感依恋视为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关键甚至是中心和主要点,但也认识到就像任何人性的美好,它并不绝对。事实上,这反应了另一类型原故事的存在,以及泰戈尔理解和对情境回馈随机应变的另一方式,这种复合结构的类型我们都拥有,它们不一定完全始终如一,或许会引导我们以矛盾的方式理解情境。

4. 结语

总而言之,故事的讲述就像演讲,个人习语原则编织出了个人故事中往复的模式,故事讲述便是其结果。模式兼具认知性和情感性,他们不仅包含了个人利益,也包括了伦理和其他原则。这些原则根据故事讲述者的一定变化而变化。不同故事中呈现的特殊性起因于原则的分列,他们一定程度上通过故事轨迹和整体轮廓下参数的不同设定而形成。通常情况下,这些原则定义了伴随一系列破坏理想可能性的理想轨迹。一套既定的理想化和中断的可能性,用更准确地话来说,个人习语的叙事原则和参数共同催生了与一系列定义“原故事”相关的故事。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频繁展现了以情感依恋纽带为基础的原故事因素。这类原故事预设了一个惯例,即父母/子女的情感依恋为之深化并会被成年的婚姻纽带所取代。可述性故事(展现叙事性的故事)会在惯例打破时出现。这种打破包括依恋缺失或者依恋脆弱性的短暂缺失,两者情况的出现都会加剧伦理决策需求的出现。在这

类原故事的指引下,泰戈尔提出了两项重要的伦理品性——情感依恋敏感性(即对他者情感依恋需求的专注度)以及情感依恋开放性(即愿意将他者视为关心和情感纽带的对象,无论他们是什么种姓、性别或者其他身份类别)。这些道德原则的闪光点激发了限制依恋弱性的行为并阻止或弥补了情感依恋的缺失。

泰戈尔的原故事包含了许多参数,其中一个便是关于物质约束(如经济地位所引起的)和意识形态约束(主要包括由性别制度所催生的)的不同。泰戈尔作品向我们道明了意识形态的约束限制会破坏情感依恋的关系,并主要通过羞辱扭曲人类的情感,从而巩固范畴的分类。

另一系列可变因素作用于道德行动者,对于这些角色相互的关系有一项重要的区分,即控制者、受控者和中间者。控制者无疑倾向巩固身份类别,然而他们的行为一部分取决于他们与受害者有无依恋纽带。中间者角色的行为形形色色,但更倾向于开篇展示的情感依恋的开放性和敏感性。

原故事关于道德行动者最有趣的角色便是受控者,特别是遭受羞辱的依恋威胁受害者。他们或许与伤害他们情感纽带的制度格格不入,并普遍作出自我牺牲。自我牺牲的内容或是物质的富足甚至是生命。然而这种牺牲也是面对社会羞辱时维护自尊的方式,有时候伴随着报复的行为。

泰戈尔的一些作品也展示了不同类别的原故事。这类原故事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自由而非情感依恋。在一些例子中,这一类原故事与依恋型原故事相冲突。自由类型的原故事折射出了自我提升的规准,并挣脱于家庭或其他循规蹈矩富有使命感的依恋关系的束缚。

最终,倘若这些原故事并未对社会转型中不公平的等级制度作出合力,那么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对于像《妻子的信》中姆里耐尔最终的反抗,文中也给出了一些建议。然而只停留在晦涩的暗示,并没有得到展开和强调。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身份类别的厌恶使泰戈尔无法想象非身份基础上的合力,因而富有消极的色彩。尽管如此,泰戈尔的一些角色展现了依恋关怀衍生出的人道和移情因素,例如从姆里耐尔到宾杜,纵使在一些例子中并没有成功,这些关怀或许仍是非身份基础上合作的模式。这种强调情感依恋敏感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模式能团结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从而抗衡圈内圈外的模式以及由此产生不可避免的羞耻感。

注释:

- ①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6月份在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叙事中的情感研究工作坊”(A Workshop on Emotions in Literary Narrative)上的发言稿。在此,我要感谢组织者:甘尼萨·慕克吉和尚必武先生,感谢他们给予我这次机会与读者分享拙见,感谢他们对本文的评价和建议。
- ②在此,笔者引入了语言学原则——参数理论,并作出一定明显的变化(如原则并非固有和普遍,参数在早期童年期的关键时期并不持久不变)。Surányi 2011 对此理论有介绍。笔者在 Hogan

2013 第四篇章对文学性个人习语的原则和参数有深入讨论。

③如无特殊注明,泰戈尔作品的引用均来自 Radice,2005。

④在此,译者将 Dharma 翻译为“正道”,即存在的法则。

⑤严格来讲它并没有与自性 (swadharma) 相冲突,而是与 sādharma 相冲突,即普世的正道 (等同于 mānavdharma, 人类正道),此正道适用于所有人,包括诸如不能偷窃等规范(参见 Parekh 1989: 16)。

⑥参见 Modern Review (September 1941): 212 和 Visva – Bharati News 28.11 (May 1960): 190。

参考文献:

- [1] Chaudhuri, Sukanta. *Rabindranath Tagor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M]. New Delhi,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Hogan, Patrick Colm.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a.
- [3] Hogan, Patrick Colm. *What Literature Teaches Us About Emo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b.
- [4] Hogan, Patrick Colm. Why Ratan Fell in Love Unnoticed and Why Ashu was Ashamed: Tagore's Short F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Feeling[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2011c. 34: 89 – 99.
- [5] Hogan, Patrick Colm. *How Authors' Minds Make Stor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Lamb, Sarah. Aging, Gender and Widowhood: Perspectives from Rural West Bengal [M]//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1999. 33: 541 – 570.
- [7] McDermott, Rachel Fell, ed. *Singing to the Goddess: Poems to Kālī and Umā from Benga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Monier – Williams, Monier. *A Sanskrit – English Dictionary* [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6.
- [9] O' Flaherty, Wendy Doniger. The Clash Between Relative and Absolute Duty: The Dharma of Demons [M]// Wendy O' Flaherty and J. Duncan M. Derrett. *The Concept of Duty in South Asia*, 1978: 96 – 106.
- [10] Parekh, Bhikhu. *Colonialism, Tradition, and Reform: 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 [M]. New Delhi: Sage, 1989.
- [11] Phelan, James. Rhetoric/Ethics [M]// David Herm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3 – 216.
- [12] Radice, William (ed.). *Rabindranath Tagor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M]. New York: Penguin, 2005. (文中只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 [13] Rimé, Bernard. *Le partage social des émotions* [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5.
- [14] Surányi, Balázs.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 [M]// Patrick Colm Hoga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66 – 670.

责任编辑:陈 宁

跨界研究结硕果 彰显特色创译论

——许建忠教授访谈录

王祖友

(河南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3)

摘要: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许建忠教授是翻译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之一。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翻译和社会各方面高度交融的今天,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翻译放在生态、环境、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的各个不同维度上加以考察和探索,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和见解,颇具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翻译生态学》(2009年)、《翻译地理学》(2010年)、《翻译经济学》(2014年)无疑开辟了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性质,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理论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许建忠教授。

关键词:许建忠教授;《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ianzhong

WANG Zuyou

Abstract: Xu Jianzhong,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 an expert at translation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our global era and with the highly blending of translation and various subjects, Xu associates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ecology,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thus producing *Translation Ecology*, *Translation Geography* and *Translation Economics*, which opens new perspectiv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d out of China.

Key words: Professor Xu Jianzhong; *Translation Ecology*; *Translation Geography*; *Translation Economics*

因为时间关系,我和许建忠教授三度相聚,却没有能专门进行过一次正式采访,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对他进行访谈,主要请他围绕翻译研究,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作者简介:王祖友,男,安徽和县人,河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许建忠教授简介:198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现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等国际刊物编委。独著《工商企业翻译实务》、《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等五部著作。在 Babel、Meta、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The Translator、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 100 余篇,其中被 A&HCI(艺术与人文索引)收录 40 篇。主持完成省级项目三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一项。

王祖友(以下简称王):许教授,请您先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翻译跨学科研究情况。

许建忠(以下简称许):近年来,在多年积淀的基础上,我先后出版了三部翻译跨学科研究著作,即 2009 年 1 月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生态学》、2010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地理学》和 2014 年 3 月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经济学》。这三部书相辅相成,构成我翻译生态研究的三部曲。

王:这几部书出版后的反响如何?

许:《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和《翻译经济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兴趣,反响较大。The Translator(2009 年第 2 期和 2011 年第 2 期)、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11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Target(2011 年第 2 期和 2012 年第 2 期)、《中国科技翻译》(2009 年第 4 期)、Translatio - FIT Newsletter(2011 年 1 - 2 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3 月 24 日)、《山东外语教学》(2014 年第 4 期)等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书评,盛赞三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为此项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良好的建议。

王:《翻译生态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许:《翻译生态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的、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

王:《翻译生态学》的撰写背景是什么?

许:其实,任何一种理念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翻译生态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吻合的。

任何人和物要在地球上生存,就不得不同其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翻译活动也不例外。透过世界翻译史,我们得知,翻译是随着人类的交流需要而诞生的,从翻译诞生的那一天起,翻译就同其生态一直保持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时期都随着其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发展。当前,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整个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是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如何处理好整

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都有比较漫长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几十年翻译学才加速了学科的分化和发展。生态学则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生态学已经超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扩大到其它领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进一步推动了生态学的研究,除生物学中的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外,在地理学中也建立了海洋生态学、土壤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态气象学等。在其它学科领域,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污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旅游生态学、传媒生态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美学、行为生态学乃至教育生态学等生态学的分支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人与生物圈”的研究列为全球性课题,强调从宏观上研究人与环境的生态学规律。正是在这种思潮和背景下,翻译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翻译生态学应运而生。

王:翻译生态学和生态翻译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许:近年来,翻译生态研究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国内有既互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个研究体系,即“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这也足以显示出我国翻译生态研究的和谐性,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所谓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来说,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他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而能够体现上述认识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被视为生态翻译学初期发展的一项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胡庚申,2009)。201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庚申先生的大作《生态翻译学》全面论述了其生态翻译思想,认为“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总管和描述”(胡庚申,2013:封四)。

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是由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人文科学系系主任兼翻译与语篇研究中心主任 Michael Cronin 在其2003年出版的著作《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第五章“全球化背景下的小语种”中首次提出的,并用其中的一小节篇幅来论述。我对此曾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对发展跨学科研究,开拓翻译科学新领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Xu Jianzhong, 2004)。2009年1月,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了拙作《翻译生态学》,这是一部对翻译生态进行系统描述的著作。“翻译生态学紧紧围绕‘翻译生态’这一主题展开,从翻译与其生态环境之关系入手,以翻译系统为纵深推进之主线,以生态体系为“横断面”,建立起全书纵横交织的整体构造和

框架,科学、客观地阐释了翻译生态学的内涵以及翻译存在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出翻译生态之基本原理和规律,阐述了翻译生态的演进、翻译行为生态及其评估标准,并提出了实现翻译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本书以翻译学和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旨在建立翻译生态学这一崭新学科。”(许建忠,2009,封三)

2010年6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拙作《翻译地理学》,2014年3月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拙作《翻译经济学》,它们都是《翻译生态学》的姊妹篇。《翻译生态学》及其姊妹篇互为照应,互为补充。

显而易见,《生态翻译学》是把生态当作研究翻译的一个视角,而《翻译生态学》则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交叉学科。其实,不管是《翻译生态学》及其姊妹篇,还是《生态翻译学》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其貌不扬,缺点错误难免,这些都需要诸位同仁多批评、多扶持、多呵护,使这个其貌不扬的婴孩能茁壮成长,最终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王: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我也研读过,的确同您的《翻译生态学》有不同之处。但胡教授大作中认为,生态翻译学,是生态修饰翻译学,应属翻译学研究,而您的翻译生态学是翻译修饰生态学,应属生态学研究。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许:判断一个术语能否成立,关键要看其创造者(作者)是怎么界定或定义的,而不是他人是怎么阐释的。胡教授的生态翻译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一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因此,此处理解为生态修饰翻译学合情合理。而我的翻译生态学是不能用A修饰B来解释的。其实拙作封三对此已做出明确阐释:“本书围绕‘翻译生态’这一主题……”显然,我是把翻译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描写的。既然“翻译生态”这个术语可以成立,那么研究翻译生态学问的“翻译生态学”也理应成立。

王:在您和胡教授的大作中都提及 Michael Cronin 的专著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您在大作中应用了该作中的一个术语“translation ecology”,而胡教授却在其大作中认为该术语应为“ecology of translation”。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解释。

许:Michael Cronin 的大作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于2003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当时的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主编 Cay Dollerup 教授特约我为该作撰写一书评,他想听听来自中国的学者对这部西方出版著作的评价。为该大作撰写的书评随后发表在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4年第二期上。我在书评中曾对该作中 translation ecology (p. 165) 这一提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上将其译为“翻译生态学”。再看胡教授大作中提到 ecology of translation 这一术语时,并未从原创作者 Michael Cronin 的专著中引用,而是从 Robert Phillipson (2006) 撰写的书评中引用的。我认为,引用某人创造的术语,应该引用其本人的原创,而不应该引用他人的改写;这样做才能更具科学性、公正性,也更能说明问题。

王:《印度的英语翻译:英语的文化政治》作者丽塔·科塔里(Rita Kothari)说:“翻译的隐喻使得我们能用最有成效和最富幻想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建忠的研究在这片沃土上进一步挖掘,并形成一种观点:翻译有其生态。这种观点提法新颖,至今未见经传。其研究激发出我的一些更富哲理性的问题,我不得不问,如果万物均为翻译,那么幻境或幻觉是什么呢?它难道不是翻译中的文本——一种不断的处于是和不是的过程中,物质得像‘原文’而又迷离得像翻译的文本吗?”您是怎么解读这位印度翻译家的评论的?

许:受主编 Cay Dollerup 之约,曾为印度女翻译理论家丽塔·科塔里的大作《印度的英语翻译:英语的文化政治》(*Translating Indi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撰写书评,发表在该刊2005年第一期,这也算是跟她有些交情。《翻译生态学》杀青后,我征求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曾邀请作者丽塔·科塔里(印度)为拙作写几句话,她毅然答应我的请求,挥笔为拙作写下几句推介之言(见拙作封四):“The metaphor of translation has lent to us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and imaginative ways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Jianzhong’s study unearths that soil further, and establishes the notion of translation as ecology, a link hitherto unconceived and undocumented. The study has triggered off within me larger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nd I am led to ask, if nature is translation, what is maya, or illusion? Is that not a text – in – translation, cons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and not – being, physical like the ‘original’ and elusive as a translation?”

最后出现在拙作封四的译文是李运兴教授的笔墨(但他却不愿署名)。我对这句话的理解:①翻译研究是无止境的,我们应不断付出心血和努力;②翻译研究必须有所创新,才能推动翻译研究的稳步健康发展;③翻译是人类进步的钥匙,它涉及到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④只有在“是”与“不是”之间不停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循环反复,以至无穷,才能不断创新,并保持翻译生态的平衡发展。

王:翻译地理学的概念是您首先提出的吗?

许:《翻译地理学》是《翻译生态学》的姊妹篇,是翻译学和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结果,就是将翻译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相关研究,将翻译及其地理因素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力求打破传统的“决定论”研究模式,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地理剖析和阐释。它不但从理论上揭示翻译地理的客观规律,而且注意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立足于阐明翻译实践中的种种问题。

翻译地理学的确是我首先提出的。拙作出版于2010年6月。后在2011年和2013年先后有外国专家来中国参加会议或讲座,有提到这个术语的。如在陕西教育厅网站上(<http://www.snedu.gov.cn/jynews/gdxx/201305/02/34190.html>)有这样一篇报道: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领导人访问西安外国语大学。

日前,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名誉主席 Hannelore Lee-Jahnke 教授、秘书长 Martin Forstner 教授一行访问西安外国语大学。

该校校长卢思社会见了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代表一行,介绍了该校翻译专业的发展情况,并就该校加入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的有关事宜与 Lee-Jahnke 主席及 Forstner 秘书长交换了意见。该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研究生部、党政办公室、高级翻译学院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会后, Lee-Jahnke 和 Forstner 两位教授应邀为该校师生作专题讲座。Lee-Jahnke 教授讲座的主题为“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the way is the target”,她分析了过程导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的重要性及其教学目标,对比了讲座、研讨、合作型学习等不同教学方式的特色与优势。Forstner 教授讲座主题为“Economic Geography and Translation Services”。他从经济全球化的制约因素谈起,提出翻译对国际贸易尤其是地区贸易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翻译地理学的内涵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两位教授还现场细致解答了师生提问。

王:《翻译经济学》论及的是什么?

许:《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兴趣,国内外刊物纷纷发表书评,盛赞两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这些都是给我最大的褒奖,鼓励着我在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兴趣使然,随即便将注意力转向“翻译经济学”话题上来,因为按《翻译生态学》的划分,“翻译经济学”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经济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以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剖析和阐释,从理论上揭示翻译经济的客观规律,并结合翻译产业的实际探讨翻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王:从发生学角度看,翻译和文化传播息息相关,您对翻译和跨学科交叉研究有何见解?

许:跨学科研究不是一门学科在另一门学科中的简单应用,而是当这门学科在寻求自身突破和发展时需要和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以寻找突破点、新的生长点的应用。也就是说,跨学科的结果,不是分散了创造主体的才智和精力,而是给他们带来了相映生辉的悟性和敏锐的思维能力。在现代翻译学产生和发展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没有停止以相关学科的视角审视翻译活动或运作,这是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的重要体现。翻译学者对翻译实践的考察和思考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态势,翻译不再是单纯的、孤立的语言操作,而是特定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宗教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事件。翻译与哲学、翻译与美学、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历史学、翻译与社会学、翻译与心理学、翻译与认知学、翻译与文化学、翻译与宗教学、翻译与生态学、翻译与地理学、翻译与伦理学、翻译与思维学、翻译与语料库等方面的交叉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其学科发展提供了

强劲动力。

王:您预计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什么结果?

许:其结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会为翻译研究增加新的视角、新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会促使更多的交叉学科的创立。比如,有段时间有学者在探讨“和合翻译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王: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学习外国的翻译理论,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挖掘较少。您对这个问题有何见解?

许:从翻译史来看,古代、近代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发展差别不是很大,其差别拉大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革时期。期间,中国译论几乎停滞不前,而西方译论在此期间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加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有如下缺陷:理论意识不强、基本范畴缺乏、学术基础薄弱(王宏印,2003:6-7)。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中国学者突然发现西方译论的先进性和发达性,发现了自己同西方译论的巨大差距。为了赶超西方译论,就必须首先学习引进国外译论。此时出现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现象,也就是您说的习惯于学习外国的翻译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照搬,而是为了消化,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奈达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奈达的翻译理论进入中国,中国译界学者纷纷进行研究,在中国翻译界占据了最具势力的地位,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奈达的翻译理论渐渐失去了原先在中国的权威地位。中国译界学者开始批判它,有些甚至开始全盘否定它。新世纪开始后,国内才形成对奈达理论的正确认识:肯定其优点,指出其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试图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其实,我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做中国特色译论的挖掘和创新工作,如王宏印教授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黄忠廉的《变译理论》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只是这方面的工作开始的时间还不是太长,所做的工作还有待加强。可以预见,假以时日,经过中国学者的奋发努力,把借鉴传统和国外理论相结合,中国的翻译理论定会茁壮成长,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巍然屹立于世界译论之林。

王:那么中国的翻译理论应如何发展呢?

许: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应放弃其地域特色,去追求大一统的世界译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构建大一统的世界译学是痴人说梦,中国只能依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子由中国人自己来走。那么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究竟应如何进行呢?是以构建对人类所有翻译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翻译学为依归,还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为目标呢?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公允。按照生态学原理,全球生态圈和地域生态圈是相互依存的,全球生态圈的形并不意味着地域生态圈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

的地域生态圈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生态圈。中国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世界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翻译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翻译学特色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国别翻译学特色构成了大一统的世界翻译学。那么翻译研究只有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才能保持特色,并使其小翻译研究生态圈得以保留,从而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翻译研究生态圈做出贡献。

“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如包括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1)

王:您认为哪位翻译理论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许: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家当属严复,他所首倡的“信、达、雅”影响国内翻译界一百多年了,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市场。这是一种创举,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从他的《天演论》翻译实践来看,他的翻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为了唤起国人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不惜对原文做较大的变通处理。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值得我们后来者认真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嘛。

王:大家知道,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较难,而您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书评,能否把您给国外投稿的经历给大家分享分享?

许:大家知道,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外话语权是不平衡的,中国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何平衡话语权,让国外翻译界知道众学者在干什么,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我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身体力行,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国外发表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论文(如“TCM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Retranslation: Necessary or Unnecessary”、“Training Translators in China”、“Foreignization or Domestication: Translators’ Conscious Activity”、“Where Does the Cultural School go?”、“Poetic Dialogue Analysis of Chinese-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等)和书评(不但对中国出版的著作而且也对国外出版的英文著作评头论足,以彰显中国学者在国际翻译论坛上的话语权),尤其是把一些比较典型的中国当代论著以书评的方式介绍给国际读者,迄今为止,已向国外推介国内出版的专著40部。

说起给国外投稿,当年首次给国外投稿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一个偶然的机
会,在《中国翻译》的过刊合订本里(1989年第1期的封四)发现了国际译联会刊
Babel的征订启事,欣喜万分,就产生一种冲动,给国外投稿。随即于1997年11月将

同好友李照国先生合撰的论文“TCM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按征订地址投过去,谁知刚过一个月,就接到刊用通知,当然通知里也包含不少的修改意见。接到回信,方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将征订地址当成编辑部地址了。该刊的出版地址在荷兰,是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而其编辑地址却在比利时。我的稿件到达荷兰后,又被转到了比利时的主编 R. Haeseryn 博士手里。博士在接到稿件的当天晚上就审读了稿件,并在当天晚上写信回复。这是我第一次同国外同行打交道,当时还是小讲师的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就同国外翻译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12月,收到先生来信,询问我是否愿意为美国翻译学会出版的翻译研究系列丛书的第十部 *Translation and Medicine* (John Benjamins, 1998) 写一书评。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尽管我对医学翻译研究有限,但面对邀请,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不久便接到了先生寄来的著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在最后期限到达前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就是在这一约稿函里,先生建议我可考虑写书评,因为一方面国外的同行太想了解中国了,另一方面国外同行也急于获知中国学者对其著作的反应。

我接受了先生的建议,既写论文,同时又写书评。我的这一承诺使先生非常高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不停地给我寄他的主编刊物 *Translatio: FIT Newsletter* 上所发表的书评,直至今日。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心朋友。2001年,我的专著《工商企业翻译实务》就要出版了,我曾写了上万字的英文介绍资料,邀他为我书赐序。他欣然答应,并代表国际译联对拙作的出版表示欢迎,认为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创了一个翻译研究新领域。2004年,亚洲翻译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我终于见到了这位80多岁的老先生,相谈甚欢。2008年3月,他来信说要参加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的翻译大会,期待再次会面。可惜的是,到了5月底,他又修书一封,说他刚动完手术,由于身体虚弱,对不能到沪表示遗憾。9月,《翻译生态学》初稿成,就用英文撰写了9000词的简介,邮寄给先生(先生不会发email,但将其女儿的email给我,供我急用),一方面征求先生意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一个意愿:如觉得书稿不错,可赐一序。先生审完大喜,觉得颇有新意,随即赐下一序。先生来信很谦虚,如觉得其序不适合插入书中,可告知。并说如必要,可帮我邀请更高层次的同行写序。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国际同行,是他帮助我走向学术之旅,是他那为人“做嫁衣”、无偿给 Babel 当主编至今的高尚品德情操赐给我力量,使我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大恩不言谢,唯有努力奋斗,多出成绩来报答先生的知遇之恩。

记得是在2001年,从李运兴教授那里得到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的投稿地址,随即我开始给投稿,2002年就被当时的主编 Cay Dollerup 特约为该刊书评栏目特约撰稿人(regular reviewer),随即便一发不可收拾。同先生的首次会面也是在2004年召开的亚洲翻译论坛上,此后先生曾多次来津讲学,来往甚密。我曾将书稿《翻译生态学》英文简介 email 给先生,先生阅后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一些建议。2009年,《翻译地理学》书稿杀青,我将其英文简介通过电子信箱发给先生,恳请他为

拙作撰一序,她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为拙作撰写一 INTRODUCTION。先生现在虽已退休,但仍笔耕不辍,开办一网站,继续从事其喜爱的事业。我能在 Perspectives 上发表大量书评,确实得益于先生的无私帮助。先生在退休之际,还不忘将我推荐给该刊后任主编 Henrik Gottlieb 先生。

也是从 2001 年,开始给 Meta 投稿,命中率较高。2004 年,该刊为庆祝其创刊 50 周年(2005 年),特约论文两篇,分别发表在 2005 年第一期和第三期上。我也曾将《翻译地理学》书稿英文简介 email 给该刊主编 AndréClas(当时刚退休),征求意见,先生说对此不是很懂,但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以上三位都是我学业上的恩师,他们均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为我做过“嫁衣”。每每想到他们,深深的谢意难以言表。愿好人一生平安!

参考文献:

- [1] Phillipson, Robert. Review of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J]. *Language Policy*, 2006(5):227-232.
- [2] Xu Jianzhong. Review of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4(5):148-150.
- [3] 侯影. 应实际之需 立特色译论——评黄忠廉等著《应用翻译学》[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1): 108-111.
- [4] 胡庚申.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 *外国语*, 2009(2):47-53.
- [5]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6]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7]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冯 革

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会话自我修补研究

姚剑鹏

(宁波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会话自我修补是话者在会话过程中对所监控到的言语错误进行自我改正的行为。作为有效的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其价值和功用在二语习得领域也越来越被关注。本文基于COLSEC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从言语错误监控、修补结构和修补策略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会话自我修补的运用现状。研究得出:学习者在进行英语口语交际时具有对言语错误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的元认知能力,能自我监控到各类言语错误,并采取一系列的修补策略进行修补。但也存在着下少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会话自我修补;自我监控;内部结构;修补策略;对策

An Insight into Speech Self-repair by Chinese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YAO Jianpeng

Abstract: Speech self-repair is the self-correction act by the speaker on the speech errors self-monitor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ve strategy and learning strategy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has invi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researchers.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COLSEC data, explores the ability the Chinese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possess to repair their speech errors in the light of self-monitoring, repair internal structure and repair strategy and concludes that they have the metacognitive ability to self-monitor and repair the errors in their oral English practice and are able to use proper strategies for the self-repair, yet speech problems are unavoidably not uncommon, thus upon the analysis, proper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speech self-repair; self-monitor; internal structure; repair strategy; countermeasure

1. 引言

会话自我修补是话者在会话过程中对所监控到的言语错误进行自我改正的行为。自1974年Sacks等人发轫修补研究至今,西方言语研究界对自然言语环境下的

作者简介:姚剑鹏,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
研究。



会话自我修补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同时,作为有效的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其价值和功用在二语习得领域也越来越被关注。本文基于 COLSEC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试图从言语错误监控、修补结构和修补策略入手,探讨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会话自我修补的运用现状,揭示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 研究回望

西方言语研究界围绕会话自我修补对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的作用作了深入的探讨。会话自我修补属于修正后输出(modified output)(Swain, 1985),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占有关键地位,是当今二语习得理论中的基本组成部分(fundamental construct)(Swain & Lapkin, 1995; Shehadeh, 2002)。在自我修补过程中,修正后输出或强制性输出(pushes output)实际上指的是二语学习者所做的自我引发或他人引发的对言语错误的改正或改述。尽管有别于强制性输出,自我引发的自我修补从功能上来说等同于强制性输出,因为自我修补可用来检验对目的语的假设,诱发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办法,扩大学习者现有的资源(Kormos, 1999)。而且,二语学习者语言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他们的二语习得发展的证据(Corder, 1981; Cutler, 1982),对这些错误实施的修补表明他们的二语产生过程在起作用(Kormos, 1999; van Hest, 1996)。因此,二语学习者所犯的这些错误和修补对语言教师而言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指示物来表明哪些内容该传授给学习者。

自我修补过程也是学习者之间进行意义协商以达到可理解性输出的过程。Pica 等人(1989:65)指出,交际双方的协商互动(negotiated interaction)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尚未掌握的 L2 输入知识,并通过协商,获得尝试新的 L2 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机会。协商互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使非本族语者获得经协商后进行可理解性输入的机会,而且通过言语修补进行可理解性输出(Gass & Varonis, 1985; Doughty, 1988)。

Shehadeh(1999b:627-675)提出,二语学习是否成功,或许可以用自启/自补对他启/他补的比例来衡量,可以用内容和语用修补对语言修补的比例来衡量。因此,自启/自补的内容和语用修补越多,互动就越接近本族语,反之,假如他启/他补的语言修补越多,互动就越不像本族语。如此,最佳的二语学习环境应该是自启/自补的内容和语用修补占主流的环境。

可见,自我修补对二语学习极为重要。其重要性可用 Hellerman 的话来概括:“作为语言学家,我认为修补是一种对语言结构资源加以利用、对语言运用尤为必要的行为。研究语言学习者长期的修补行为,其修补行为的变化折射出该学习者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总体变化”(Hellerman, 2009:116)。具体来说,研究修补能使我们深入了解学习者中介语发展过程,并用作证据来证明学习者有能力注意到可观察到的行为,还可从中看到学习者对监控策略的运用情况,表明他们已注意到了某种言语产出错误(Kormos, 1999)。

3. 英语学习者会话自我修补

会话自我修补策略固然重要,那么,我国的大学英语学习者能否运用这一交际和学习策略来助力外语习得呢?我们以 COLSEC 语料库语料为基础,从监控能力、修补结构和策略运用入手探讨这一问题。该语料库是目前我国较新的英语口语语料库,总容量为 70 万英语词。其语料来自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的实景录像。

3.1 COLSEC 话者的自我监控

根据我们对 COLSEC 语料库的语料所作的分析,发现中国学生有能力监控下列言语错误,包括:

(1)概念错误,如 En I always [Mw] get the latest news from TV because [Pu - r] I think that's the con most convenient for me to get the news since there's a TV in my dorm. $\langle /sp1 \rangle$ (000001)

(2)语音错误,如 Mm, mm, playing playing mm...and exer exercise [S3] is more important to our sto to our students. $\langle /sp1 \rangle$ (000012)

(3)语法错误,如 now I because you need to study er that you need to exercise, but also it give you ... gives you em your long development future development a good ... preparation. $\langle /sp1 \rangle$ (000017)

(4)词汇错误,如 Yes. And the college life is like er point a di-direction for you. But er er maybe i - in your college you will find you will explore your potential and find what is your interest, and that is more important I think. $\langle /sp3 \rangle$ (000019)

(5)词片断言内错误,如 Yes, I think daily ex - exercises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up you body. But because ... if you exercise every day, you body will function more smoothly. $\langle /sp2 \rangle$ (000028)

(6)言内错误,如 I think it's a it's a useful method for me to practice my oral English. $\langle /sp2 \rangle$ (000029)

但是,在 COLSEC 语料库中却存在着大量未被监测到的语误,这与 L1 英语口语语料库的发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随机选取其中一个语段,见例:

(1)I think the information in the internet on the internet is more useful than the information got from the TV or others. Maybe it is my it is my way to got the news. I think it is the best. And there are many information we can't got from the newspaper and the TV. But we can got from the stations the internet stations. Just like the the foreign the foreign teaching the foreign teach from the...the foreign the foreign universities. $\langle /sp2 \rangle$ (000005)

话者 2 连 got 的错误都监测不到,而且有 3 次机会,实属遗憾。为何这些语误无法被中国学生监测到?要是我们换个考试类型,如写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学生

不至于犯这么多的错误而未被监测到。

3.2 COLSEC 话者的修补结构

西方言语研究界荷兰派代表人物 Levelt (1983:48) 在他的言语自我修补研究中给出了目前广为引用的自我修补内部结构模型,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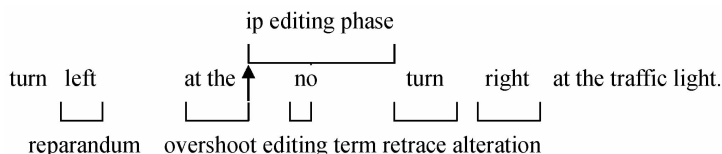


图1 会话自我修补内部结构

上图可见,话者的会话自我修补表现为三阶段结构,其第一阶段为 reparable (待补),第二阶段为 editing (编辑),第三阶段为 alteration (改正)。那么,中国学生在进行会话自我修补时是否遵循了这一规律? 他们的会话自我修补有什么特点? 我们首先来看语料库语料所反映的事实。见例:

(2) But I think just as you what you said just now that radio compared to the internet the TV there's a lot of disadvantage. </sp2> (000001)

(3) I I admit that the radio and TV is the most i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ss media. </sp2> (000016)

语料揭示:中国学生大多采用即刻修补(instant repair),跳过自我修补的第二阶段即编辑阶段直接进行修补。他们的修补结构极大部分由待补和改正两阶段组成。这与L1话者的自我修补结构有所不同。当然,L1话者的自我修补也存在不带填充词的情况。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L1话者往往选择称之为无填充暂停(unfilled pause)的一段时间不等的沉默时间。我们统计了COLSEC的000001-000030文件的自我修补情况,两阶段修补与三阶段修补之比为1158/450,超过一倍还要多。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学生的自我修补数量比英语本族语话者的自我修补数量要多得多,美国英语口语语料库 Santa Barbara 语料库 LDC2003S06 中15个容量很大的文件中话者的自我修补只有481处。

不仅如此,在为数有限的三阶段自我修补中,中国学生似乎尚未掌握利用填充词来争取时间以便能重新有效地计划言语和修补策略,所用填充词十分有限,只局限于“en”和“err”或“mm”,有些还带有明显的中文痕迹。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部分是由于考试的时间压力和精神压力造成了对话者修补的认知负载,使他们对话语认知资源的提取受到了阻碍。但是,会话策略包括自我修补策略的缺损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3.3 COLSEC 话者的修补策略

中国学生能运用以下修补策略进行自我修补。

3.3.1 重复

言语交际过程中,话者往往会对词语、词组乃至句子进行自我重复。在会话自我修补范式下,话者的自我重复被认为是言内修补策略(Levelt, 1983:55)。COLSEC 语料库语料显示,此类策略数量惊人。具体有:

1)词片断重复

此类重复类型在英语语料库中十分常见,表现为在重复的第一阶段一个或数个音素的重复而不是一个完整的词的重复。见例:

(4) I can always g -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source about their student er in the BBS...〈/sp1〉(000016)

(5) Em, then I er familiar, er then I faci - facilitates in our school er from the com - comparison er from the comparison er preparation for the Olympic bit. 〈/sp3〉(000017)

2)一词重复

一词重复指的是话者重复一个单词的现象。见例:

(6) Because [Pu - r] I er I study er out of my home in Beijing. 〈/sp2〉(000023)

(7) And er er planting trees will er... keep keep the soil away from us and provide us enough enough wood. 〈/sp3〉(000026)

3)双词重复

顾名思义,此类重复涉及到两个词的重复。见例:

(8) And I think one day I can I can figure out mm a ship that can never sank. 〈/sp3〉(000003)

(9) When I when I went into the campus, mm I feel the campus [Ms] is not is not as excellent [W1e - i] [W2e - ai] [S2] as I have had imagine. 〈/sp1〉(000011)

4)三词重复

三词重复指的是涉及到三个词的重复。见例:

(10) so I think er after after a short break, you will be you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n your study and your work ...〈/sp3〉(000002)

(11) Maybe school can take some manners mm take some manners to control this phenomenon. 〈/sp2〉(000011)

5)多词重复

多词重复指的是涉及到超过三个词的重复。

(12) So mm I don't think [Wth - s] the college [Wl - r]... I I don't think [Wth - s] the college [Wl - r] life is mm comfort comfortable. 〈/sp3〉(000011)

(13) My picture er is about computer, and I think er internet is the most advantage [Wn - ng] [W2a - i:] way of er is the most advantage [Mge] way. 〈/sp3〉(000016)

除了上述重复之外,还发现句子重复和持续重复,如:

(14) Erm in the first picture there is b a boy reading...erm there is a boy reading.
 </sp1> (000012)

(15) I think if the parents mn if the parents is take good if the parents is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children, and this is the good good way. </sp3> (000030)

3.3.2 插入

话者还采取了插入策略,在自我修补的第三阶段,插入了某些成分。请看下列语料:

(16) I' m the junior student in majoring in law [Pw - r]. And I...I come from Yangzhou, in Jiangsu. </sp1> (000003)

(17) And if you if I I have same hobbies with the other peoples, here we will have very interesting topic to talk with each other. It pro it really provide me a good chances to made new friends. </sp3> (000007)

3.3.3 重组

重组亦称重新开始(fresh start) (Hindle,1983)或重启(restart) (Levelt, 1989)。在这一修补策略中,话者完全放弃原言语,重新计划和组织新言语。请看下列语料:

(18) So that can we have a good energy for our study in the day time. And watch TV. We should watch TV. And [Pd - er] but we couldn't watch too much time. </sp1> (000018)

(19) It means we can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erm at home and [Pd - er] mm in winter, if you...er read [Pd - er] a rela...relaxed book of a...if you read the book, you prefer in the warm bed, that's really a great pleasure. </sp1> (000013)

3.3.4 替换

在自我修补结构中的第三阶段,部分词项被替换以便能使语义更精确、更理想化表达。请看下列语料:

(20) Ok, the first hobby er mentioned er...described in this picture is the surfing on the internet. </sp2> (000013)

(21) And hobbies is a good way to mm broaden your eye, broaden your eyesight and knowledge. </sp3> (000014)

本语料揭示替换修补的一个特点:话者进行替换修补时往往遵循词同原则(category-identity convention)。例(21)和(22)显示话者遵循了词同原则,话者替换的词项同是动词和名词,因而,我们认为,自我修补中的替换修补受到了句法相同性的制约。

除了上述与L1话者的自我修补策略相同之处外,还发现了复式修补和连续修补等策略。见例:

(22) Yeah. En another problem of internet I think is that nowadays there are many

fake [Wk - g] news on internet since people have can not judge can not judge which newses true or false. </sp1> (000001)

(23) And I think the most advantage [Md] of internet is the is up is updated. </sp3> (000001)

例(22)中,话者用了替换和重复两个策略,用“can”替换了“have”,然后重复了“can not judge”。例(23)中,话者连续修补了“is the”。

以上四种策略中,重复数量最多。我们统计了000011 - 000020 十个文件,发现自我修补1 918处,重复就占了705处。从语料可以看出,学生的词汇量实在贫乏,平时又疏于积累,因此,造成运用时提取困难,只能频频凭借重复来争取时间,恢复认知资源供应,以便提取准确的词语信息,达到理想表达的目的。

4. 问题与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就自我修补的会话策略而言,我国英语学习者在进行英语口语交际时具有对言语错误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的元认知能力,能自我监控到各类言语错误,并采取一系列的修补策略进行修补。但也存在着下列问题:

(1)缺乏有效利用填充词进行交际和修补的能力。研究表明,填充词在自然言语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蕴涵着话者丰富的认知活动。但是,从COLSEC语料库来看,我们的学生似乎尚未意识到这种重要性,很少能用填充词来实现言语修补、争取时间来重新组织言语并留住话头。即便有的话,也是数量有限,很少有诸如“I mean”、“you know”、“that is”等词汇性填充词(lexicalized)。

(2)缺乏较强的自我监控能力。为何COLSEC语料库中存在着大量的言语错误未被监控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生对言语交际的自我监控能力尚未有效地开发。话者对言语交际具有元认知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监控到言语错误后,话者会停止语流,施行修补(姚剑鹏,2005:23-28)。而我们的学生由于缺乏这种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的能力,任凭言语错误存在,造成了语料库中出现大量未被修补的言语错误。

(3)容易受到汉语的影响。语料中甚至出现中文“不是”来引起修补,如“Mm”、“mm”、“now nage”、“let me introduce myself”、“I’m a major bushi”、“I ma-major in the clinic department”[</sp3> (000004)]。该语料中还发现了“那个”。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学生还未能具备用英语思维和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好多学生仍然习惯于先用汉语思维,然后再用英语表达,这样势必造成交际时出现汉式表达。

上述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强调开发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英语学习的应用能力,在教学中引入了不少教学方法和模式,在实践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如英语角、英语口语大奖赛等,但到头来学生的口语能力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明显

的提高? COLSEC 语料库反映的事实便是明证。而且,能够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的考生均是在笔试成绩达到一定分数方能参加的同学。他们的口语水平仍无法接近英语母语者。这些问题与我们的教学、教材、习得环境不无关联。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1)在口语教学中不但要教授学生口语能力提高的技巧,而且还要教授如何有效地进行英语交际的策略。从语料库语料分析,中国学生尚未掌握英语交际的策略,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语料中缺乏填充词(filler),无论是非词汇化填充词如“um”、“uh”、“er”等还是词汇化填充词如“I mean”、“well”、“sorry”、“you know”等,在语料库中为数不多。因此,我们在教授口语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认识主要填充词以及其他交际策略的功能和作用,掌握利用策略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通过专题讨论、反复操练等形式加强学生这方面的能力。

(2)使学生认识元认知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在自然言语交际中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强调这种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如录音分析、自我评估、同伴评估等方式来大力开发学生的元认知自我监控和修补能力。

(3)增加语境体验,改善英语学习环境,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L1 话者的语料,通过观察与模仿,体验真实交流的技巧和场景。从 COLSEC 语料库的语料来看,大部分的考生仍无法自由运用所学语言进行流利、得体地交流,而且,错误率实在太高。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我们应提倡真实语境教学,让学习者能够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互动、学习和交流,以便能更好地掌握交际策略,灵活表达。英语口语本身是一门技能型课程,而非知识型课程。

(4)提倡大英语教育,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学生融入更多的语言交际环境。语境对英语口语学习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课堂所提供的交际环境,还应包括学习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家庭语境等,通过参与诸如英语角、口语俱乐部等活动,使学习者体验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接触更多的外语交流机会,让他们能大量地用英语思考和交流,从而加强口语表达能力。

(5)着手编写高质量的口语教材,选用真实、自然的语料。目前,制约我国英语口语教学的瓶颈之一是教材建设问题。现有的教材缺乏必要的交流语境,编写上按部就班,内容上都是规范句子,并沿袭精读、泛读教材的编写方式,容易使学习者失去兴趣,容易引导学生在交际中追求过于精确的表达。因此,我们应化大力气加强口语教材的建设,让同学们接触真实语料,通过分析、比较,掌握交际策略和技巧,流利、得体地进行交际。

5. 结语

作为有效的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会话自我修补对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它甚至被看成是首选的课堂策略(preferred classroom strategy)

(Shehadeh, 1999a:3)。因此,从自我修补入手探讨学习者的英语口语水平,从中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无疑为一条有益的路子。随着 COLSEC 以及其他英语口语语料库的问世,相信围绕学习者会话自我修补以及其他交际策略,会有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 [1] Corder, P.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 Cutler, A. *Slips of the Tongue and Language Production* [M]. The Hague: Mouton, 1982.
- [3] Doughty, C.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lativization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88.
- [4] Gass, S. & E. Varonis. Task Variation and Nonnative/Nonnativ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G] // Gass, S. & C. M. Rowley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1985.
- [5] Hellermann, J. Looking for Evidence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Practices for Repair: A Case Study of Self-Initiated Self-Repair by an Adult Learner of English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9, 53 (2): 113 - 132.
- [6] Hindle, D. Deterministic Parsing of Syntactic Nonfluencies [R]. The 2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Mass, 1983.
- [7] Kormos, J. Monitoring and Self-Repair in L2 [J]. *Language Learning*, 1999, 49 (2): 302 - 342.
- [8] Levelt, W. J. M. Monitoring and Self - Repair in Speech [J]. *Cognition*, 1983 (14): 41 - 104.
- [9] Levelt, W. J. M.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 [10] Pica, T., Holliday, L., Lewis, N. & L. Morgenthaler. Comprehensible Output as an Outcome of Linguistic Demands on the Learner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9, 11 (1): 63 - 90.
- [11] Shehadeh, A. Insights into Learner Output [J]. *English Teaching Forum*, 1999a, 37 (4): 1 - 6.
- [12] Shehadeh, A. Non-native Speakers' Production of Modified Comprehensible Output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Language Learning*, 1999b, 49 (4): 627 - 675.
- [13] Shehadeh, A. Comprehensible Output, from Occurrence to Acquisition: An Agenda for Acquisitional Research [J]. *Language Learning*, 2002, 52 (3): 597 - 647.
- [14]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G] // S. M. Gass & C.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5.
- [15] Swain, M. & S. Lapkin. Problems in Output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ey Generate: A Step Toward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5, 16 (3): 371 - 391.
- [16] van Hest, E. *Self - Repair in L1 and L2 Production* [M]. Tilburg: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7] 姚剑鹏. 监控和调节: 会话自我修补的元认知分析 [J]. 国外外语教学, 2005 (3): 23 - 29.

责任编辑: 蒋勇军

受控 PRO 在英汉语中的分布和存在的理据

李来发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PRO 作为空范畴理论的一部分在生成句法学理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揭示了语言中存在的“无声有义”现象。本文分析受控 PRO 在英汉语中的分布并从 EPP 原则、题元准则和局域性制约三个方面讨论 PRO 存在的动因, 依据句法学中的小句概念和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提出, 汉语的连动式和兼语式事实上包含者若干小句, 应把连动式和兼语式进一步切分成中心谓语句和次属谓语句, 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根据 Chomsky 的 UG 理论, 空范畴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而 PRO 同样存在于汉语中, 汉语中的受控 PRO 主要分布于连动式和兼语式的次属谓语句中。

关键词: 受控 PRO; 受控 PRO 的分布; 受控 PRO 存在的理据; 连动式和兼语式的切分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led PR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Motivation of Its Existence

Li Laifa

Abstract: PRO, as part of empty category theor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yntactic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reveal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phonetically silent but semantically meaningful” subject in languages. In this paper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led PR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s analyzed and the motivation of its existence explored in terms of 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 theta criterion and locality requirement. Since PRO is a universal property of languag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exists in Chine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liandong” construction and the “jianyu” construction be further segmented into a matrix predicate clause and a subordinate predicate clause. It is assumed that controlled PRO exists in subordinate predicate clauses in both the “liandong” construction and the “jianyu”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ntrolled PRO; distribution of controlled PRO; motiv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controlled PRO; segmentation of the “liandong” and “jianyu”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李来发, 男, 哈尔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 主要从事句法学、词汇语义学、句法—语义接口及加拿大问题研究。

1. 引言

空范畴(empty category)又被译作空语类或虚范畴,是现代句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理论语言学的语法系统中都有关于空范畴问题的研究(桂诗春、宁春岩,1997:76)。它对解释某些语言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空范畴是一个用来表示“没有显性语音形式,却有语义内容的结构成分”(同上:76)。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空范畴理论被提出以来(Chomsky, 1976; Lightfoot, 1976; Postal & Pullman, 1978等),PRO作为空范畴理论内容之一受到了世界众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运用PRO对汉语中存在的空范畴现象进行探讨的研究者更是数量众多(胡建华,1997;Huang, 1992;饶萍,2003;沈阳,1994;徐烈炯,1988,2009;燕莉,2008等)。

Chomsky(1981)在《支配和约束论集》中指出,PRO既是语义主语又是句法主语,分布于非限定性小句中(包括不定式和动名词)。Radford(1997a:131)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无主语的不定式小句IP包含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零位主语(understood null subject),即PRO。Poole(2002:84)称PRO为不发音的不定式小句主语(unpronounced subject of infinitivals)。Carnie(2006:393)提出PRO是处于内嵌小句主语位置上的一种特殊的零位DP。简言之,PRO是没有语音形式,但有语义内容,并在非限定性小句中充当内在主语的代词性成分或称之为虚代成分。那么PRO存在的理据是什么?汉语的什么位置存在着PRO?

2. 受控PRO在英语中的分布

PRO有任意PRO(arbitrary PRO)和受控PRO(controlled PRO)之分。任意PRO是指虽做IP小句的零位主语但没有先行成分控制的PRO。例如,“It is hard [PRO] to give up smoking”,“PRO吸烟有害健康”。在这两个句子中,PRO在句内没有具体的“某人”作先行成分来控制它,它的意义来自于句外,泛指“任何人”,具有类指功能(generic interpretation)(Poole, 2002:86)。关于任意PRO,本文不做探讨。受控PRO是指其意义来自于句内的其他DP并且依赖于该DP而存在的PRO。由于该DP决定着PRO的意义和指称,并起着先行成分的作用,因而它是PRO的控制者(controller)。

语言中存在着两种受控PRO:主语控制PRO和宾语控制PRO。当一个句子中的PRO受限定性主句中的主语控制时,该句被称为主语控制(subject control)结构。句法学家们认为下列(1)中的句子是主语控制结构。

- (1a) He hopes to go there.
- (1b) They promised to come.
- (1c) I am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 (2a) He hopes that he can go there.
 (2b) They promised that they would come.
 (2c) I am sorry that I have kept you waiting.

Radford (1997b:83)指出,(1)中的句子和(2)中的句子虽然结构不同,表达的意义却相同。(2a)、(2b)和(2c)中我们看到,that 所引导的从句中的主语和主句中的主语同标,即主句的动作发出者就是 that 从句的动作发出者。由于(1a)(1b)(1c)和(2a)(2b)(2c)是同义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1a)、(1b)和(1c)中的不定式小句中的动词前也应存在着动作发出者。该动作的发出者被称之为 PRO。

- (3a) He hopes [PRO] to go there.
 (3b) They promised [PRO] to come.
 (3c) I am sorry [PRO]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由于 that 从句中的主语回指的是主句中的主语,以此类推,英语(3a)、(3b)和(3c)中的 PRO 也应分别回指主句中的主语,即他们的先行成分:He, They, I。所以,限定性主句中的主语即是不定式动词动作的发出者。PRO 的意义来自于限定性主句中的主语。没有了作为控制者的限定性主句主语,PRO 就失去了存在的倚靠。因此我们说 PRO 具有与代词相同的语法特征和指称功能。像“hope”等这样允许其不定式补语中存在 PRO 做主语的动词被 Poole(2002: 85)称作“主语控制动词”(subject - control verb)或“控制谓语”(control predicate)(Radford, 1997a:132)。

当 PRO 所受的控制不是来自于限定性主句的主语而是来自于限定性主句的宾语时,我们称这样的句子为宾语控制(object control)结构。例如(4):

- (4) John persuaded Bill to give up smoking.
 句法学家们认为在(4)中同样存在着一个 PRO。如(5)所示,
 (5) John persuaded Bill [PRO] to give up smoking.

(5)中的 PRO 仍然做不定式小句 to give up smoking 的主语,然而 PRO 的控制者不再是限定性主句的主语 John,而是动词 persuade 的宾语 Bill。Poole(2002:85)称能引导这样句式的动词为宾语控制动词(object-control verb)。Radford(1997a:382 - 84)把这类动词叫做宾语控制谓语(object-control predicate)并对 PRO 在宾语控制结构中的存在进行了下列句法剖析:

- (6) [What] decided [you] [to take syntax]?

在(6)中,decide 是一个三价动词,除了主语之外后接两个补语:第一个 you 做它的宾语,是第一个补语;不定式小句 to take syntax 是一个命题,做它的第二个补语。(6)的意义等同于(7):

- (7) What decided you [that you should take syntax]?

由于(6)中的 you 做的是 decide 的宾语而不是 to take syntax 的主语,因而不定式小句同样需要一个动作发出者。很显然,(7)中的第二个 you 是 should take syntax 的

动作发出者,它所回指的不是主句中的主语 what,而是作宾语的第一个 you。由于(6)和(7)是同义句,因此不定式小句 to take syntax 前也应存在着一个动作发出者,即 PRO。

(8) What decided you to [PRO]^① take syntax?

该 PRO 做不定式小句的零位主语,回指主句宾语 you 并受 you 控制。因此这样的结构是宾语控制结构。

3. 受控 PRO 在汉语中的位置

为了避免和通常所使用的以大写字母开头,句号结尾的“句子”一词混淆,句法学中采用小句(clause)一词作为句子分析单位(Tallerman, 1998: 64)。Radford (1997a: 498)把 clause 定义为包含着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的表达式,同时该表达式中也可以包含像补语和附加语这样其他类型的表达式。小句可以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句子,也可以是句子的一部分(Kim & Sells, 2008: 11)。Tallerman(1998: 64)认为小句几乎总是以动词为中心,包含一个谓语,表达一个事件(event)。

根据句子有无时态变化,句法学家把句子划分为限定性小句(finite clause)和非限定性小句(non-finite clause)。包含有因时态和一致关系而致使动词发生屈折变化的小句是限定性小句,没有时态、动词不发生屈折变化、没有一致关系的小句是非限定性小句。我们说 John hopes to catch the ball 由两个小句构成:[John hopes [to catch the ball]]。第一个小句是[John hopes to catch the ball]整个句子,第二个小句是[to catch the ball]。由于第一个小句有时态和一致关系等的变化,又由于它是句子的最主要部分,我们将其称作限定性主句;而第二个小句被划分为非限定性小句,因为作为不定式短语它没有时态等的变化。

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言不同,类型上属分析语。其特点是不通过词形变化,即词的内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的作用,而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语序来表达语法意义,因而不存在通过词的屈折变化而构成动词的时态变化,即汉语不具备动词限定性成分(Hu, et al, 2001)。在多个动词的句子中,仿佛各个动词的地位无论先后都是相等的,无主次之分,因而无限定性小句和非限定性小句之分。然而,邢福义先生(1995, 1996)指出,在汉语中,小句处于语法系统的中枢地位,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只有小句能控制和约束其他语法实体,成为其从属或依托的核心实体(参见黄忠廉, 2005)。即汉语最小能独立表述思想的语法单位不是句子而是小句。那么如何确定汉语的小句?根据句法学的小句理论,小句以动词为中心,至少包含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描述一个事件。据此,我们可以对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连动式和兼语式句子做进一步小句化切分。

(9) [我去][拿喷壶][浇花]。

(10) [大家选他][当代表]。

在(9)句中“我去”、“拿水壶”和“浇花”实际上分别描述了三个事件,包含了三个 IP 或 TP。(10)句同样包含了两个事件,“大家选他”是一个事件,“当代表”又是一个事件。因此(9)中包含了三个小句;(10)中包含了两个小句。其实在汉语中,看似等位的动词,其逻辑关系上存在先后顺序,因此包含了地位不等的小句。汉语支配语句结构的根本原则是:“前管后”(徐通锵,2001:186-88)。“我去”是主事件,引发另外一个事件“拿水壶”;拿水壶做什么?引出第三个事件“浇花”。因此,每后一个事件都以前一个事件为依托。但第一个事件是最重要事件:由于“我去”才引发出“拿水壶”“浇花”两个目的小句。因此,本文提出,根据句子主次依存关系把连动式和兼语式划分为中心谓语句与次属谓语句。中心谓语句是句子的最主要部分,其他部分的存在依赖于它的存在,中心谓语句对次属谓语句在语义上起着制约作用。例如,“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是连动式句式。其特点是:几个动词(或一动一形)紧紧贴接,几个动作带有次序性,不能任意调换位置。“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是中心谓语句,“吮了一下”是次属谓语句,只有把手指放了之后才能吮(赵遵礼,1983:163)。又如,“风吹着雪花满天乱飞”。“风吹着雪花”是中心谓语句;“(雪花)漫天乱飞”是次属谓语句。由于“吹”而产生了“飞”(吴竟存、梁伯枢,1997:238)。因而,次属谓语句居于从属于中心谓语句并受中心谓语句制约的地位。

空范畴是在人类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空范畴的句法分布情况在各种语言中几乎完全对应:语言 A 在 X 位置上的空范畴会对应于语言 B 在 X 位置上的一个空范畴;A 在 Y 上的空范畴对应于一个 B 在 Y 上的一个空范畴(桂诗春、宁春岩,1997:79)。在英语中,PRO 存在于无时态变化的不定式小句中。依此类推,根据汉语次属谓语句处于从属地位的句法特点和受中心谓语句制约的语义特点,汉语的兼语式和连动式的次属谓语句中存在 PRO。例如:

(11) [我去] [PRO拿水壶] [PRO浇花]。(主语控制结构)



(12) [大家选他] [PRO当代表]。(宾语控制结构)



汉语连动式的每一个动词都与主语发生着主谓关系(赵遵礼,1983:163),在(11)句中,三个动作的发出者都是“我”:“我去,我拿水壶,我浇花。”因此,(11)中的两个 PRO 都回指中心谓语句的“我”。它们的先行成分就是中心谓语句的主语。因此(11)句是主语控制结构。(12)句的分解形式是“大家选他,他当代表”。PRO 回指的

是中心谓语句中的宾语“他”而不是主语“大家”，因而该句是宾语控制结构。陈建民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新著《现代汉语句型论》中对兼语式的论述中其实已经包含了PRO受宾语控制的思想：“例如在‘我叫他来’句子里‘叫他’的是‘我’，‘来’的却是‘他’，‘叫’和‘来’这两个动词不连系同一个主语。这个句子的底层是‘我叫他，他来’而不是‘我叫他，我来’”(246)(转引自吴竞存、梁伯枢，1997:215)，因而“我叫他来”是一个带有PRO的宾语控制结构：我叫他[PRO]来。范晓先生(1993:489)给出了兼语句基本式的语义结构：“大家选老王当代表”可分析为“大家选老王+老王当代表”，实质上是两个表述套接在一起的句子，即第二个“老王”是具有语义内涵，没有语音和显性句法表现形式的PRO。

4. 受控 PRO 存在的理据

PRO没有语音形式，没有文字形式，也没有显性句法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存在于上述语言中？它存在的理据是什么？请看下列句子：

(13a) John hopes to catch the ball.

(13b) 我去拿喷壶浇花。

(13c) John is willing to help me.

(13d) John persuaded Bill to give up smoking.

(13e) 大家选他当代表。

(13b)是汉语的连动句式。连动句式是指由连续采用两个以上动词(或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而构成的连续谓语的句式。“去”、“拿”和“浇”是三个连续发生的动作，均由“我”发出。但为什么“去”的前面有动作的发出者“我”构成主谓结构“我去”而“拿”和“浇”前面没有语音和文字表现“我”而只有“拿”和“浇”：我去——拿喷壶——浇花？(13a)是一个包含着两个小句的句子：一个是限定性主句[IP1 John hopes [IP2 to catch the ball]]，一个是无时态变化的不定式小句[IP2 to catch the ball]。同样，在不定式小句IP2中也没有动作的发出者做不定式的显性主语：[IP2 ___ to catch the ball]。(13c)也是如此：[IP1 John is willing [IP2 ___ to help me]]。

Chomsky(1981)在《管约论》中提出的扩充的投射原则(EPP)规定：所有小句(clause)必须有主语。根据这一规定，(13a)(13b)和(13c)似乎全部违反了EPP原则。不仅如此，我们再以(13c)为例分析一下句子中的题元角色(θ -role)。(13c)也是一个包含两个小句的句子：[IP1 John is willing [IP2 to help me]]是限定性主句，[IP2 to help me]是不定式小句。首先，限定性主句谓语is willing有两个论元(argument)：一个是被指派感受者(experiencer)题元角色的John，另一个是作为命题(proposition)的不定式小句to help me。我们可以运用题元格栅(θ -grid)来表示：

is willing

感受者 DP	命题 CP
John	to help me

在命题中, help 作为二价谓语也应该带有两个论元: 一个是被指派施事题元角色的主语, 另一个是被指派受事题元角色的宾语:

help

施事 DP	受事 DP
—	me

题元准则规定: 所有的非虚义成分 (non-expletive) 的 DP 必须被指派一个题元角色并且每一个题元角色都必须被指派给一个 DP。help 将受事题元角色指派给了 me, 而 help 前面没有论元, 那么将施事题元角色指派给谁呢? (13a) 和 (13b) 以此类推。看来它们似乎不仅违反了 EPP 原则而且违反了题元准则。

(13e) 是汉语的兼语句式。兼语句是指一个动词的宾语兼做下一个动词的主语的句式。“选”的宾语是“他”而“当代表”这一动作的发出者也是“他”。关于兼语式的成因尚存在着多种观点。普通的汉语语法理论认为兼语式是汉语的一种特有的语言现象, “他”既做“选”的宾语又做“当代表”的主语, 合二为一, 名曰“兼语”。然而根据题元准则, 每一个论元能且只能被指派一个题元角色, 即题元角色和论元之间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如何解释汉语的这种一个论元同时携带两个题元角色的语言现象? (13d) 也似乎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 Bill 只做 persuaded 的宾语, 那么不定式小句就出现了无主语现象; 如果 Bill 同时兼作不定式小句的主语和 persuaded 的宾语, 那么 Bill 就要同时被 persuaded 和 give up 分别指派受事题元角色和施事题元角色, 出现了一个论元被指派两个题元角色的现象, 违反了题元准则的规定。

据此, 语言学家们提出: 语言的直觉告诉我们, 似乎看起来无主语的不定式小句事实上包含着一个虽无显性语音形式但却是人所共知的隐性主语 (Radford, 1997b: 82), 即 PRO。如 (14) 所示:

(14a) John hopes [PRO] to catch the ball.

(14b) 我去 [PRO] 拿水壶。

(14c) John is willing [PRO] to help me.

(14d) John persuaded Bill to [PRO] give up smo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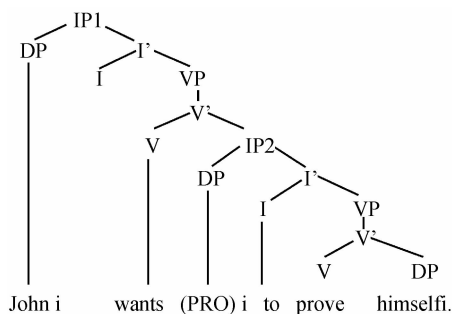
(14e) 大家选他[PRO]当代表。

也就是说(13a) (13b) (13c)并没有违反 EPP 原则,只不过它们的不定式小句的主语是隐含存在的。PRO 的存在也使得不定式小句动词有了可指派施事题元角色的论元。在(14d)(13e)中,“Bill”和“他”做宾语,携带由主句动词所指派的受事题元角色,而 PRO 做“当代表”和“to give up smoking”的隐性主语,由动词“当”和“give up”指派施事题元角色,宾语和 PRO 各司其职。PRO 的存在使得上述句子既遵循了 EPP 规定,又满足了题元理论的要求。

Radford(1997a: 133)运用局域性制约(locality requirement)对(15)进行了剖析,证明了 PRO 存在的必要性:

(15) [IP1 John wants [IP2 to prove himself]].

在(15)中,反身代词 himself 是一个回指词(anaphor),指称 John。然而约束理论中的原则 A 规定:一个回指词必须在包含它的最小的同一 IP 内受到约束;先行成分当且仅当成分统辖并与回指词同标时约束回指词。换句话说 himself 必须在 IP2 内找到它的先行成分。我们知道 himself 回指的是 John,然而它和先行词 John 却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 IP 内。如何解释(15)虽然违反了局域性制约但却是个完全正确的句子?人们认为(15)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在不定式小句动词前存在着一个零位主语 PRO。由于 PRO 同时具有回指词和代词特征,即[+a]和[+p],那么在 IP1 内,PRO 回指 John 并与 John 同标,受 John 成分统辖和控制。而在 IP2 内,PRO 又成为 himself 的先行成分,成分统辖 himself, himself 与 PRO 同标。由于两者都回指 John,因而都与 John 同标。这样,原则 A 的条件就得到了满足,如图所示:



Chomsky(1981:23 - 25)指出,PRO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像(i) The students [βwant [βto [γvisit Paris]]], (ii)The students [α wanna [γ visit Paris]]和(iii) The students [vp want [s' [s Bill to [vp visit Paris]]]]这样的句子在逻辑形式表现的层次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逻辑表现形式:The students [vp want [s' COMP [s NP INFL [vp visit Paris]]]]。在(iii)里,内嵌主语 NP 是 Bill;而在(i)和(ii)里,内嵌主语是以某种方式标记的指代成分,用来表示它的所指就是

母句主语 the students 这一短语的所指。

虽然 PRO 的存在满足了 EPP 原则要求,但 PRO 只能隐含,不能以有形词语出现。例如,

(14a) John hopes [PRO] to catch the ball.

* (14b) John hopes John to catch the ball

(13a) 我去[PRO]拿喷壶[PRO]浇花。

* (13b) 我去我拿喷壶我浇花。

(14a) 大家选他][PRO]当代表。

* (14b) 大家选他他当代表。

也就是说 PRO 与有形 NP 只能呈互补分布(方环海、谭乡荣,2006)。由于句法结构中其他成分的制约或本结构所处的位置的限制,句位规定的 NP 位置上根本不能出现 NP 词语(沈阳,1994:101)。

5. 结语

PRO 是 Chomsky 生成语法关于空范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PRO 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非限定性小句从句法层面上看由于无显性主语而违反了 EPP 原则并导致不定式动词无法指派题元从而又违反了题元准则但却仍然合乎语法性的问题。本文对受控 PRO 在英汉语中的分布和存在的理据进行了分析,从 EPP 原则、题元准则和局域性制约三个方面证明了 PRO 存在的必然性。生成语法既然具有普遍意义,那么 PRO 同样存在于汉语中。经过对汉语的连动式和兼语式的成分做进一步审视和切分,本文根据句子主次依存关系把它们划分为中心谓语句与次属谓语句,从而确定了连动式和兼语式第一个谓语动词后的动词部分的从属小句地位和受制约关系,并提出受控 PRO 存在于连动式和兼语式中的次属谓语句中。

注释:

- ① Mark Baltin(1995: 244)建议 PRO 存在于 VP 的限制语(specifier)位置:I want [TP to [VP PRO be free]],这样 I want to be free 句中的 to 就可以附着于(cliticize onto)want 上而不受 PRO 的阻挡(block)构成 I wanna be free。

参考文献:

- [1]Baltin, M. Floating Quantifiers, PRO, and Predica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5(26): 199-248.
 [2]Carnie, A. *Syntax: A Generative Introduction (2nd ed.)* [M].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6.
 [3]Chomsky, N. Conditions on Rules of Rules of Grammar [J] *Linguistic Analysis*, 1976(2): 303-351.
 [4]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1981.
 [5]Kim, J.-B. & P. Sells. *English Syntax: An Introduction* [M]. Stanford: CSL Publications, 2008.
 [6]Hu, J.-H., Pan, H. -H. & L.-J. Xu,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J].

- Linguistics*, 2001,39(6): 1117-1148.
- [7]Huang, J. C-T. Complex Predicate in Control [G] // R. K. Larson, S. Iatridou, U. Lahiri & J. Higginbotham. *Control and Grammar*, 1992:109-147.
- [8]Lightfoot, D. Trace Theory and Twice-Moved NP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76(7): 559-82.
- [9]Poole, G. *Syntactic Theory* [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10]Postal, P. M. & G. K. Pullum. Trac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English Complementizer Contrac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978(9): 1-29.
- [11]Radford, A.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A Minimal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UP, 1997a.
- [12]Radford, A. *Syntax—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UP, 1997b.
- [13]Tallerman, M. *Understanding Syntax* [M]. London: Arnold, 1998.
- [14]方环海, 谭乡荣. 空主语的性质、分布及其相关问题[J]. 外语研究, 2006(3): 21-25.
- [15]桂诗春, 宁春岩. 语言学方法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16]胡建华. 英、汉语空语类的分类、分布与所指比较研究[J]. 外国语, 1997(5): 38-44.
- [17]黄忠廉. 小句中枢说全译 [J]. 汉语学报, 2005(2): 62-69.
- [18]诺姆·乔姆斯基. 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讲演[M]. 周流溪、林书武、沈家焯, 译, 赵世开,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9]饶萍. 空语类 PRO 在英、汉语中的照应特征[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1(2):25-30.
- [20]沈阳. 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 [21]吴竞存, 梁伯枢.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 [22]邢福义. 小句中枢说 [J]. 中国语文, 1995(6):420-428.
- [23]邢福义. 汉语语法学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24]徐烈炯. 生成语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 [25]徐烈炯. 生成语理论: 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6]徐通锵. 基础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7]燕莉. 汉英空语类 PRO 对比分析[J]. 现代语文, 2008(11):102-103.
- [28]赵遵礼. 现代汉语句子成分的分析[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路小明

平等解释权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

李龙泉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马丁·路德当年翻译的《圣经》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他采取的翻译策略与他的宗教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马丁·路德宗教思想的两个重要观念——应许恩典和平等解释权,特别是后者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理解;权威理解;解释权;判断权;翻译研究

Influences of Equal Interpretation Righ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Li Longquan

Abstract: Bible translated by Martin Luther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even the world. Th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Martin Luther adopted then had a direct relation with his religious though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wo important ideas of Martin Luther: promised grace and equal interpretation right, and their great vital influences upo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y, especially the latter, have brought.

Key words: comprehension; authentic comprehension; interpretation right; judgment right; translation studies

论及马丁·路德,人们立刻会联想到16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改革运动和他的德文《圣经》翻译。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已发表过不少论述(张匡娟,2004:6),但仔细阅读之后发现,大多数论述都只是对马丁·路德其人其事的概略描述和对其翻译原则和技巧的总结归纳。其实,作为宗教改革领袖,路德的思想博大精深,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迄今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作用于欧美人,特别是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与翻译研究的直接关联而言,赋予理解《圣经》“平等

作者简介:李龙泉,男,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研究与翻译研究。

解释权”的观念于今天的翻译理论研究也仍带来积极的启示,甚至可以说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透露出的一些思想就是源自该观念。

在本文里,笔者拟从路德的早年经历与德国宗教现状、应许恩典与平等解释权、平等解释权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三方面探讨路德的“平等解释权”观念对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

1. 早年经历与德国宗教现状

马丁·路德出生于一个小矿主之家,其父脾气暴躁,时常打骂路德,可以说,路德从小并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受更多的是惧怕和自卑。路德的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却对培养小路德十分上心,望子成龙,把儿子送到条件好的学校学习拉丁文,指望儿子以后能出人头地,至于儿子本人是否愿意那样他却很少考虑。成年后,路德回忆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时说,仍感觉十分痛苦,仿佛经历了炼狱和地狱,心情倍感压抑。上大学之后,路德按照父亲的意愿攻读完法学硕士,进而攻读博士,但内心的逆反已愈来愈强烈,终于,在1505年7月违抗父亲的意志,放弃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机会,转而进入一所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谢文郁,2-3)

进入神学院后,路德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与钻研,对《圣经》教义有了更为确切的把握,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罗马天主教廷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以及民间泛滥成灾的加圣习俗就认识得更为透彻。当时,罗马天主教廷是整个欧洲的精神主宰,教皇通过各地教会控制人们的思想,甚至拥有跨越国界的生杀大权。而在德国民间,流传着一种对一些已故著名基督徒进行加圣的传统。该传统原本是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殉道者,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圣”字,以表达人们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可是,一旦被加圣,该圣徒头上便具有了神秘的光环,其人也就被神化了,在一般信徒眼里就成为与神特别接近的人,具备特别的能力,可以充当人们的保护神。到路德时期,这种加圣传统已经泛滥成灾,甚至延伸到对圣徒遗物的崇拜,认为圣徒遗物也都具备了神秘力量。如此情形显然有悖于基督教信仰,然而,罗马教廷对于普通基督徒的这些做法却听之任之,还给予鼓励,其主要缘由是当时德国的基督徒大多不识拉丁文,无法直接阅读《圣经》。如果没有圣徒崇拜,这些平民基督徒就无法维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这种态度十分不满。

由于不懂拉丁文,基督徒们对《圣经》教义的领受只能通过神职人员的讲解,这就无形中赋予了教会神职人员对《圣经》的判断权和解释权,天长日久,此种权力演变为一种特权。历史上的教皇权威便是靠着这种特权建立起来的。比如,《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19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地上所释

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教会神职人员对它的解释是耶稣对彼得的喜爱,把彼得称之为“磐石”,并且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也就是说,彼得的后继者们(即所有的罗马主教或教皇),按照基督教的属灵传统承传,都是教会的基石。这样的解释极大地支持了教皇的权威。又如,《约翰福音》第21章第17节,耶稣复活后在湖边显现,并和门徒们在一起。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向耶稣忏悔之后,耶稣对他说:“喂养我的羊。”教皇主义者对其解释为,彼得以及彼得的所有属灵传统继承者,被授权作为“喂养人”照顾他人。这是教皇的特权,也是他的义务。

教皇权威建立起来之后,他对《圣经》的解释便成为权威解释,任何挑战都会被判定为错误或异端,人们的精神、思想、心灵也都受到这种权威的压制。到路德时期,这种权威已经演变成被滥用的特权,特别是:①曲解、误解《圣经》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以至路德禁不住发出这样的呼喊:“我越读教父们的著作,越感到气愤。他们是人,而不是神!”“在《诗篇》中,奥古斯丁的错误是如此之多!”“要想透过教士们的判断来学习《圣经》,实在是愚蠢之极。”(马丁·路德,1979:165)②对《圣经》原义的曲解、误解到后来已发展为一种有目的的故意行为,使《圣经》成为维护特权、掩盖罪恶的幌子,利用主和圣徒彼得的名义去干各种肮脏的勾当,如出售赎罪券。①

加圣传统下的民间圣徒偶像崇拜现象、权威解释中对《圣经》原义的曲解误解、教廷特权的滥用,所有这些都激发起路德对罗马天主教廷的强烈不满,他决心从破除权威解释入手来反对教皇体制。

2. 应许恩典与平等解释权

《圣经》历来被视为神的话语,在其1500多年的成形过程中,虽然历经40多位记录、整理者的手,却一直被看作是由神的默示而成,在其信徒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历年来,人们对《圣经》教义的领受都源于教皇权威之下神职人员的解释,渐渐地,人们的思想、心灵都受到这些解释的控制,而解释者们也已习惯了人们的逆来顺受,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然而,马丁·路德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圣经》中神的话语和我们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是两回事。神的话语必须在信徒的信心中完全被接受,故而是唯一的,但如何理解神的话语,则因每个人自身经验背景和理解水平的不同而各不一样。所谓权威说法,从人的角度看仍然属于人的立场观点,它可以是一批有学问的人的观点,但要说它就是真理,那还是缺乏根据,它依然是可错的。实际上,任何一种权威说法都可以在其他说法中被判断为错误。如果从错误的权威说法出发对其他不同的理解进行压制,那就等于坚持错误,抵制真理。神的话语,就其定义而言,是绝对不会错的。因此,路德强调,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解。路德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把《圣经》的解释权平等地分配给

每一个人,后人称之为平等解释权。

平等解释不同于权威解释,虽然它也坚持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会出错,但对于那种“关于《圣经》的同一段经文必须只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观点,它却表示出反对,因为,它认为关于这“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的判断权并不在读者手里,而只能在作者手里,这个作者就是神自己。既然关于“正确的理解”的判断权不在人手里,那么,当我们说“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时,我们作为《圣经》读者就越权了。而且,即使假设只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人还是无权判断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同样,承认“只有一种正确解释”的判断权只在《圣经》作者手里,那么,就不难看出,以前通过权威解释来解决在《圣经》理解上的分歧和冲突,实际上是人借着权威的名义与神争夺《圣经》的最终解释权。面对权威解释,基督徒是在听他人(即权威)对自己说话;面对《圣经》,却是在直接聆听神对自己说话,而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拥有直接从《圣经》领受神的话语的权利,也正是这一权利赋予了《圣经》解释多样性的合理性。至于究竟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只能由神自己来判定。

路德关于《圣经》平等解释权的思想无疑从根本上瓦解了多年来形成的教皇权威,把人们从所谓权威解释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赋予了每一位基督徒以平等理解《圣经》的权利和合法性,有助于他们与神建立直接的亲密关系。因此,基督徒应该相信,只要他是在神的话语里直接领受,那么,他所领受的都是来自于神。神在这个时候、这个境况中给他这种理解,乃是因为这位基督徒在现有的理解力中只能接受这么多。神当然会不断更新他的理解力,使他能接受更多,但在他尚未得到新的理解力之前,他只能这样去理解《圣经》,他也只能坚持自己的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有人担心“平等解释权”会彻底破坏基督教教义及其神学统一性,造成人人各凭己意随便解释《圣经》为己所用的局面,这是对路德“平等解释权”思想的曲解。在路德看来,解释权不是判断权,《圣经》平等解释权要求基督徒凭信心领受神的旨意,放弃自己的判断权,而且,作为领受者,每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是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既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也不使自己高高在上。它要求基督徒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共同提高。这也是后期世界各地《圣经》查经小组存在的意义。

路德《圣经》平等解释权的思想源自他关于上帝恩典的观念。路德认为,上帝的恩典是应许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①已经给予的,归结为让人认罪悔改,跟随耶稣;②尚未给予的,归结为耶稣应许了所有信徒,只要相信并跟随耶稣,他就会把他们带到天父那里去。至于耶稣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信徒带到天父那里,这得由耶稣说了算,因为,恩典的主权在上帝手里,而人作为接受者,可以在已经给予的恩典中体会上帝的旨意,但无权对应许的恩典进行任何判断。

路德的“应许恩典”观深刻地支持着他的《圣经》平等解释权思想。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即使他们在阅读《圣经》时得出不同、甚至冲突的理解,他们也相信神一定会让他们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如

果基督徒对《圣经》的完全理解是在应许中的,那么,彼此就不能凭着当下的理解去评判其他理解的正确与否,因此,各种理解在神的应许中都是平等的。当然,平等的并不意味着终极的。在“应许恩典”中,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信徒的理解力,至于究竟是哪种方式,乃是神说了算,属于神的主权。

3. 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

路德的“平等解释权”思想距今虽已近500年,但其生命力仍旧强健,对我们今天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具有很好的启示。通过类比,我们可以发现,“平等解释权”的核心是关于文本理解的认识,而文本理解对于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都至关重要。具体分析,“平等解释权”思想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可以归结如下:

(1)它十分清晰地地区分了神的话语和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之间的不同。比如,有关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19节和《约翰福音》第21章第17节的内容,马丁·路德就得出了与罗马教会传统解释不一样的理解。他认为教会传统的解释是错误的,《马太福音》那段经文要说的是,彼得代表门徒,而不是仅仅代表自己,向耶稣忏悔,并领受从耶稣那里来的祝福。因此,是彼得的信心,而不是他这个人,使他成为教会的基石。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每一位基督徒信心基础之上的,因此才会永不失落。《约翰福音》的那段经文表明,当耶稣赋予彼得喂养他的羊的权力时,乃是因为彼得的信心使他拥有这权力。同样,每一位基督徒也因着自己的信心而拥有这一权力。

这给了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作为一个文本,其意义从作者完成它的那个时刻起就已经是相对固定、单一、静止的,而译者作为理解者在人数、背景、时空等方面都是变化、多样、动态的,因此,作为文本的原文与作为理解者的译者之间的关系是定与变、一与多、静与动的关系。一方面,原文的意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相对静止的,统一的;另一方面,译者由于各自的生长背景、经历、能力等各不相同,对同一原文的理解又是动态的、差异的。然而,无论哪一种理解都有存在的理由,不同理解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人为地下结论或做判断,说谁的理解是更正确或更高明,因为那样做是一种越权,而判断权本身并不在译者或评论者,只在原作者本人。第二,不能混淆原本文本意义与译者对原本文本理解后得到的意义,后者永远不可能与前者完全等同,只能尽可能接近或部分等同,故所谓“忠实于原文”的忠实观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至于“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等观念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排除和否定了原文意义的存在,与史实和事实都不相符。

(2)面对一个文本,人们也同时面对着两种不同的权力,即文本作者所拥有的判断权和文本读者所拥有的解释权,前者是独有的,后者是众有的。就翻译而言,对于同一原文,作为读者的不同译者可以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因为他们各自的人生背景、经历和能力不同,且在这不同的理解、解释之间,彼此拥有的理解、解释权力

是平等的。故我们不能在抛离原文作者的情况,各自固执己见地评判说哪位译者的译文理解是对的或错的、哪位的解释更正确或谬误,因为关于这个对错、正误的判断权只在原文作者那里,不在作为读者的译者或评论家,如果硬要作判断,那么,它将是一种越权行为,是混淆了解释权和判断权的行为。所以,据此审视功能学派强调的读者反应论,我们会发现其实质是把属于原文作者的判断权交到了译文读者手里,以读者拥有的解释权取代了作者的判断权,属于一种彻底的侵权行为,而翻译界如果尊崇这种行为,让翻译质量只是以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导向,那么,我们的译文质量最终只能走向低劣、庸俗和粗制滥造,彻底背离翻译的初衷和本质。

4. 结语

马丁·路德离世距今已 500 余年,他生前的翻译实践成效斐然,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考察其背后的翻译思想,其中,“平等解释权”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翻译研究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破解传统固有忠实观的弊端,明确区分解释权和判断权的观念,让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客观、全面地认识当代西方译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及翻译中的“读者反应论”等等。一方面,借助马丁·路德的“平等解释权”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译论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偏激和不足。

注释:

- ①16 世纪初,罗马教廷因为重修彼得大教堂而筹集资金,以教廷的名义发放赎罪券,凡购买赎罪券者,同样享受炼狱赦免之惠。1516 - 1517, 多明我修会教士约翰·特次勒奉命在德国出售赎罪券。他的著名说法:“银币叮当入库,灵魂跳出炼狱。”有人甚至还把自己购买的赎罪券向路德炫耀,路德对此十分反感,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出售赎罪券及教会的其他许多弊端,并质疑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权威。
- ②参阅马丁·路德的檄文《论德国基督徒的尊严》及《在奥格斯堡的活动程序》,载《路德全集》,第 31 卷,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7: 277 - 283.

参考文献:

- [1] Brendler, Gerhard. *Martin Luther: Theology and Revolution* [M]. Claude R. Foster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Brecht, Martin.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 - 1521)* [M]. James L. Schaaf (tran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5.
- [3] McKim, Donald K.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tin Luthe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 刘行仕,雷雨田. 论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研究与翻译[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1).
- [5] 马丁·路德. 致市长参议员的信. 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献精华[C]. 台湾:台湾大学出版社, 1979.
- [6] 马丁·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M]. 李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7] 杨平.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及其影响[J]. 湖北社会科学, 2006(4).
- [8] 张匡娟. 《圣经》译作评述[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6).

责任编辑:朱晓云

副文本：译本接受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以《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为例

李媛媛¹ 胡安江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要:《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是我国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翻译的第一部合集。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广泛的关注,至今多次再版。文章通过对译本中的副文本因素进行解读,深入探究《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副文本要素对译本接受的影响,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译本以及副文本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副文本;接受

Paratext as an Inneglectable Force for the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ion: Wi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as a Case Study

LI Yuanyuan HU Anjiang

Abstract: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was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1916. Since its birth, the volume has won great popularity and attention and has been published for several times so far. By analyzing the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the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atext in promot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help the reader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transl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the paratext.

Key word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paratext; acceptability

1. 引言

福尔摩斯系列小说是英国著名作家柯南·道尔的作品,该作品于1886年在英国陆

作者简介:李媛媛,女,河北沧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安江,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续出版,以其严密的逻辑,科学的推理和复杂的情节而一炮蹿红,随后陆续被译为多种语言,受到各国读者的强烈喜爱。自其 1896 年首次引入中国以来,便开启了中国侦探小说之门,并在百年侦探小说史中屹立不倒,始终是最受中国读者青睐的侦探小说。近年来,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多个福尔摩斯译本进行了研究,如 191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81 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以及各类儿童版、青少年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其中 1916 年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因其历史的特殊性及其重要的价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对该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介情况、人物形象塑造、翻译策略和方法、叙事视角、文化视角等方面,而对其中的副文本因素却鲜有涉及。本文拟以《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为个案,从译本的副文本入手,对其中的副文本因素进行解读,以期全面、客观地探究译本的价值,并引领读者重视副文本要素对翻译研究的作用和价值。

2. 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视角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于 1979 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给予确切的解释和说明。此后,他陆续发表相关文章,并于 1997 年发表著作《副文本:阐释的门槛》(*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其中对副文本概念进行了定义:“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Genette, 1997: 1)。在书中,他还列举了 13 种副文本形式,即出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辞和题词、题记、序言交流语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注释、公众外文本和私人外文本(朱桃香,2009: 39)。此外,热奈特还将副文本进行了分类,分类方式主要依据空间性、时间性、物质性、语用性和功能性。不过广为接受的是按照空间性分类,即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其中内副文本是指文本内部的呈现方式,如标题、序言、注释等;外副文本是正文之外的呈现形式,包括媒体的采访、报道、私人的信件、日记等。同时,作者还提醒读者要对事实型副文本引起关注,即他者对文本的评论,文本接受的效果,作者的年龄、性别、名声和成就,创作的历史背景等。这类事实型副文本如果按照空间性的划分当属外副文本的范畴(Genette, 1997: 5-7)。热奈特曾指出:“副文本是使文本成之为书,以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更广泛地说是呈现给公众”(Genette, 1997: 1),可见副文本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3. 副文本对译本接受的作用和价值

Icklar-Kocak 认为:“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Icklar-Kocak, 2007: 171)而“副文本相对于文本本身而言,更先被读者所接受,所以译本的副文本也会对读者对

文本的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Tahir-Güraglar, 2007: 45)。因此,副文本因素对探究译本的推介和读者的接受有着重要作用。

经过细致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笔者发现:《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之所以得以畅销,屹立百年不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的副文本因素。下面对《全集》的副文本进行分析,以探究其对译本接受的影响。

3.1 封面和装帧

书籍之封面,犹如人之脸面,是读者接触到书籍的第一直观印象。据《华尔街日报》调查统计,书店的读者平均注视封面的时间只有8秒,而书商和批发商作采购决策的时间则更短(庞书纬, 2011: 22),因此,封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封面而言,《全集》共有12册。观察每一册的封面,我们可以发现,12册书的封面风格相同,都是在最上面一行用十分醒目的红色字体从右向左依次写着书名“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书名旁边配有绿色的花鸟图,是清末民初书籍封面的显著特征,接下来是福尔摩斯的缩印画像,画像下面是一幅红色的和故事情节相关的图,图片十分生动,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在封面的右侧,写着册数,封面的左侧则以红色字体列出了案件的名称,让读者一目了然。在封面的下方,用红色的字体由右至左写着中华书局的字样,出版商的名字便直接映入读者眼帘。

当时,由于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原因,一般的书籍封面还停留在黑白两色,或者是单一的色彩上,对于人物和花鸟图的使用也是刚刚起步,因此,《全集》当时的封面设计在众多的书籍中已经属于上乘之作。当时的作品,如《新青年》,也是从1915年起才开始使用艺术字的形式将书名由右向左依次排列,这是从旧形式向新形式的过渡。虽然当时在一些书籍和刊物的封面上印有图画,但图画内容与书籍内容并无太大关联。而《全集》的封面图画都和书籍中的故事情节相映衬,采用的也是当时刚刚起步的由右向左以美术字呈现书名的方式,这样有助于吸引读者的兴趣。

3.2 凡例和序跋

《全集》体例十分完备,书前有凡例和包天笑等三人撰写的序,书后还有刘半农撰写的《英勋士柯南道尔先生小传》和《跋》(路艳霞, 2012)。

在包天笑、陈景韩和严独鹤所写的序中,三人均介绍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原作内容和创作背景,同时也解释了国内引进该侦探小说的原因,“《福尔摩斯侦探案》,侦探学中一大好之教科书也,则其适合于我国今日之时势,殆犹药石之于疾疫也已。同人因汇而译之,将以饷当世”(任翔, 2013: 32)。在《英勋士柯南道尔先生小传》中,刘半农介绍了原作者的基本情况、创作历程、作品章节以及对作者和作品的鉴赏,让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原著的情况,缩小和原著的距离感。

凡例是关于这本书的风格的描述,即书籍的目的、内容、风格、结构和规定的一些基本问题或描述。《全集》的凡例主要介绍了翻译目的和原因、具体的处理方法、编排方法等,如“全书人名、地名,译者概从一律。分之则各案自为首尾,合之仍可互相印

证”(任翔,2013:35)。跋主要告诉读者书籍原作者的创作宗旨,介绍侦探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对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介绍等。凡例和译序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 and 认识原著,同时知晓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避免了不必要的误区。

3.3 出版社

翻译小说副文本中最显著的文字符号除了书名、作者、译者外,便是出版社。《全集》的出版社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出版社汇聚了大量的文人名流,如梁启超、赵景深、叶圣陶、朱自清、茅盾、徐志摩、杨宪益、丰子恺、徐悲鸿等,在当时名气很大。此外,中华书局对我国教育事业和国家发展贡献巨大,具有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中华书局发行了我国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迅速风靡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2)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很多杂志和重要的出版物,如《四部备要》、《中华大词典》、《辞海》等,至今都在发行出售。

(3)中华书局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制设备,因精湛的技术和精良的设备,中华书局得以参与国民政府钞票的印制,因此受到了“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的赞誉。

此外,中华书局十分注重广告宣传,在抗战以前的《申报》,我们几乎在每一天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中华书局作的各种广告。广告上所宣传的有图书,也有期刊等。当时推销图书的方式也有很多:有预约订购,特价告知;图书内容的介绍,图书样本的赠送,还有各种图书目录的发放。除了《申报》以外,上海的《新闻报》、北京的《晨报》也都是中华书局宣传图书的阵地,另外,还利用自家发行的期刊做广告(吴永贵,2002:60)。这一点在《全集》中也有体现,12册书中,几乎每一册的前面都有其他书籍的广告或者售价等信息。因此,在当时,中华书局的名号可谓家喻户晓。中华书局在推销《全集》时写道:“警界军界尤不可不手此一编”(阿瑟·柯南·道尔,1916:1),因此,我们看到,中华书局发行新图书的同时,还在不停地进行广告推销,这样,自然也会激发读者的购买欲望。

3.4 译者

译者是副文本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而言,民众对外界的了解有限,对柯南·道尔更是闻所未闻,但对于《全集》的译者却是十分熟悉。《全集》的译者众多,有刘半农、程小青、严独鹤、陈小蝶、天虚我生、周瘦鹃、陈霆锐、陈天侓、李常觉、渔火等10人,这些译者在当时十分有名。虽然当时处在清末民初时期,对外交流相对闭塞,但其中很多译者都有过外语学习,甚至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因此其双语水平在当时可以算作领先的水平。此外,这些译者不仅从事翻译工作,还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当时可算是家喻户晓。其中很多译者都

是受邀参与福尔摩斯的翻译。显然,出版社也是看中了他们的名气以及他们的能力。所以,译者符号,无疑也为书籍的发行和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5 报刊连载

读者对于小说的潜在认识和了解十分重要。如果读者对于译本的内容完全是陌生的,那么,自然译本的接受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中华书局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发行之前,很多报纸和杂志都陆续刊登和连载了福尔摩斯的系列案件,并且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于1896年首次引入中国,《时务报》于9月27日到10月27日之间连载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于11月5日到25日连载了《记愆者复仇事》。1897年又分别连载了《继父诬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这两则故事,自此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1899年素隐书屋单独发行了福尔摩斯小说中的《包探案》,该译本又于1903年由文明书局再次出版印刷。1901年,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的六则故事经翻译,收录在《泰西说部丛书》中出版发行。1902年余学斋发行《议探案》,其中将主人公译为休洛克福而摩司和华生。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发行了《续包探案》,其中包含七起案件。同年,《绣像小说》先后连载了《旅居病夫》等六起案件。1906年,商务印书馆将这六起案件收录在《补译华生包探案》中出版发行。1903年《小说林》上也刊登了《唯一侦探案(四命名)》。1904-1906年,周桂笙等又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其中共有13起案件。1904年《新民丛报》刊登了周桂笙翻译的《歇洛克克复生侦探案》(李德超,2003:1)。此后,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翻译和原作的发行基本保持一致。

一直到1916年,刘半农等10人共同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发行。译者将所有的案件进行梳理,并统一了其中的人名和物名,确保了翻译风格的一致性,自然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译文。

以上的副文本因素对于译本接受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有利于开拓译作潜在的读者市场。而事实也恰恰如此,该全集初版后十分畅销,3个月后就再版,20年中就出了20版。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戸川乱步在看到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全集时感叹道:“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比日本晚很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福尔摩斯故事翻译方面比我们进步很多,相当意外。”由此可见,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4. 结语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是我国侦探小说翻译的经典之作,很多人将其看做是最成功的侦探形象,而该书的出版和发行又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经过上述对该译本中副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副文本在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帮助我们探究译本推介的影响因素,让我们能够

更加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译本和副文本的价值和作用,从而促进译本更好地被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 [1] Icklar-Kocak, M. *Problematizing Translated Popular Texts on Women's Sexua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in Turkey from 1937 to 1959* [D]. Isantambul: Bogazic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 [2] 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Jane E. Lewin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Tahir-Güraglar, Sehnaz.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M] // Theo Hermans.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44 - 60.
- [4] 阿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M]. 程小青, 等译. 上海: 中华书局, 1916.
- [5] 李德超, 邓静.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探源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 1 - 6.
- [6] 路艳霞. 福尔摩斯新版译者: 用文言文翻译书中新闻报道 [N]. 北京日报, 2012 - 11 - 12(11).
- [7] 庞书纬. 《狼图腾》的市场运作与文化分析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1(5): 19 - 22.
- [8] 任翔, 高媛. 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 - 2011)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2 - 35.
- [9] 吴永贵. 中华书局的成功经营之道 [J]. 编辑周刊, 2002: 59 - 62.
- [10] 朱桃香. 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4): 39 - 46.

责任编辑: 赵小刚

“言语证素”的翻译对新闻叙事视角的影响

裔传萍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二系,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在新闻报道中,为了表达所提供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记者往往不时地使用言语证素;这些言语证素是新闻中的活跃因子,散落在文中的各个部分,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报道的叙事视角。本文选择将英语新闻的汉译作为对象,分析其中言语“证素”的不同翻译对新闻叙事视角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叙事视角;新闻;复述;翻译

Influence of the Verbal Evidential Translation o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News

Yi Chuanping

Abstract: In news texts, in order to show the source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news, reporters often use many verbal evidentials. Scatter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news texts, these verbal evidentials are such active factors that they may directly influence or even determine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news. This article, tak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 English news text as a study object,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verbal evidentials may influence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news.

Key words: narrative perspectives; news; verbal evidentials; translation

1. 引言

“证素(evidential)”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博亚斯(Franz Boas)提出,意指说话人能运用一种后缀表达自己所提供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开启了言语的“可证

作者简介:裔传萍,女,江苏盐城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系讲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性”研究。当代语言学家已经非常重视语言的可证性研究,并在更多语言中发现了表示可证性语义的证素(胡壮麟,1994a)。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证素。胡壮麟先生修正了华莱士·切夫(Wallace Chafe)的框架,并将证素大致分为信念、归纳、传闻、演绎、信度、言语和预期七种(胡壮麟,1994b:22)。这些不同种类的证素在不同的文类和作品中会有选择地出现,并完成自己担负的使命。

在新闻报道中,记者所报道的一般是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件或者是他们所采访的他人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了表达自己所提供信息的来源和可信用度,肯定需要不时地使用证素。然而,对一个事件的断言,他们除了可以自己直接感受外,在更多情况下,是有人亲口告诉他们,所以,言语证素又成了新闻报道主要使用的证素类型。这样,“不仅使观念思想具有了外在的可被感知的存在方式,获得了‘事实’的确认,而且也使对事实的表达方式显得更加客观、权威、真实”(黎明洁,2008:208)。

言语证素不但直接关系着新闻所提供信息的来源和可信用度,而且也直接影响或决定着新闻的叙事视角。在英语新闻的汉译过程中,如何翻译这些言语证素,决定着译文是再现了还是改变了原报道的叙事视角。

2. 新闻所采用的四种主要的叙事视角

新闻的叙事视角,是作为文本的新闻,观察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是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巴尔,1995:113-114)。不同的视角连接着谁在看、看到什么,谁在说、如何说等问题。叙事视角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近20年以来,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很难找到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视角分类。然而,经过多方参考和研究,本文在结合了新闻叙事特点和新时期新闻叙事视角变化实际的基础上,大致区分出四种主要的新闻叙事视角。

(1)全知全能视角。在一篇采用全知全能视角的文本新闻中,叙述者不受任何限制,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他/她既可以了解人物所有的内心感想,也有权力对事件进行各式评论,叙述者比新闻中所有的人物知道的都多。这样的视角也常常被称作零聚焦或无聚焦。

(2)人物限知视角。采用这类视角时,“叙述者或者主动放弃全知的权利,只是通过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视野观察事物,或者只了解部分情况,并把所了解到的部分当作整体”(曾庆香 2005:127)此类的新闻,一旦确定了视点人物,就严格依据人物的知识、情感、立场等来表现所有的信息。视点人物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由多个人物轮流担当。

(3)纯客观视角。纯客观视角也属于叙述者权力受限视角。然而,该视角从一个非人格化角度出发来进行新闻叙述,通常只能反映所涉人物的语言、动作、外表和

环境,不能对人物的内心进行分析,对事件进行评判。当然,所谓的“纯客观”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真正的“纯客观”。

(4)复合视角。有的时候,叙述者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在叙述中适当进行视角转换,使叙述突破单一视角所限定的信息数量,同时又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这样的叙述被称为复合视角叙述。

虽然我们大致区分出了四种新闻叙事视角,但是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复合视角和前三种视角不属于一个层面,复合视角是对前三种视角的一个综合使用;二、在具体的新闻播报中,从头至尾使用单一视角的很少,所以,复合视角是最常见的新闻书写模式。在深入了解新闻的叙事视角之后,我们能够高效地把握住新闻的视角组成和各组成部分的特点,最大限度地理解新闻话语及其背后的涵义,并在翻译中更好地再现各部分的叙事视角,更好地再现原新闻材料的构成。

3. 言语证素与叙事视角之间的联系

简洁地说,叙述视角就是“谁看和谁说的的问题”(热奈特,1990:126)。“谁看”指的是叙述眼光,这直接决定了新闻叙述的焦点,决定着被看的对象。“谁说”,是指叙述声音,也就是以谁的口吻来叙述事件,这不仅决定着信息与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还决定着叙述者观察问题和言说事实的方式(杨先顺,2001:36-39)。由此可见,新闻的叙事视角直接关联着叙事时通过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和语气口吻,所以与言语证素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叙事视角直接决定了言语证素的使用,言语证素正是叙事视角的文体表现。

言语证素一方面是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心灵契合点,是文本叙述者把自己体验到的物质或精神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的一个基本角度;另一方面,言语证素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户的密钥。新闻作者可以通过言语证素来传达新闻话语建构者自己的叙述声音,传达自己对叙事的判断、个人或明或隐的情感倾向,进而让同一个事件在不同叙事视角的观照下,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与特质。

同样,在英语新闻的汉译中,言语证素也是关键,因为它身系着信息的来源、叙事视角的传达以及新闻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言语证素的翻译也成了个阵地,在这里,新闻的原作者和译者可以放手一搏,争夺各自的“话语权”。

4. 言语证素的翻译对新闻叙事视角的影响

“言语”一词表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采取的是语言的方式,而不是感官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对某事件的知识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得的,而是有人亲口告诉他们的,或是用书面方式向他们表达出来的。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表示言语认识来源的词都丰富无比,不仅仅非用“说/say”这个字眼。

从词性上来看,言语证素可以使用动词,也可以使用名词。就句式而言,可以陈

述,也可以使用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然而,选用不同的字词或者不同的句式,会直接影响到译文中所呈现的叙事视角是否与原文一致。

实例:

原文:

(1.1)The White House **say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pen direct peace talks with the Taliban in the next few days. (1.2)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in Qatar where the Afghan rebels have opened a long – awaited first official overseas office.

(2.1)However, President Obama **sounded a note of caution** about the talks. (2.2)“We don’t anticipate this process will be easy or quick, but we must pursue it in parallel with our military approach. (2.3)And we, in the meantim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our military efforts to defeat al-Qaeda and to support the 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3.1)But the Taliban’s spokesman **said** it had met all the preconditions that the US **said**. (3.2)“The Islamic Emirate neither wants to pose harms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its soil nor will allow anyone to pose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countries from the soil of Afghanistan.”

(4.1)Paul Adams now looks the way ahead. (4.2)“The Americans **say** they expect to hold their first formal meeting with Taliban in a couple of days to be followed shortly afterwards by direct talks between the Taliban and members of President Hamid Karzai’s High Peace Council. (4.3)The talks will succeed, the Americans **say**, when and if the Taliban finally sever all ties with al-Qaeda, end violence and accept the Afghan constitution. (4.4)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calling** this an important moment but **urging** caution to, in the **words** of one, the road towards Afghan reconciliation will be complex and messy.”^①

译文一:

白宫**称**美国未来几天将与塔利班进行公开的直接和谈。会议将在卡塔尔举行,阿富汗叛军已在这里设立了被期待已久的首个官方海外办公室。

然而,总统奥巴马对和谈**发出警告**。“我们认为这个进程不会很容易,也不会很快完成,但我们会在坚持军事途径的同时实施这个进程。我们同时还会完全致力于军队的努力打败基地组织,支持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但塔利班发言人**称**本组织已满足美国之前**所说**的全部前提条件。“伊斯兰酋长国既不想从本土对他国构成危害,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从阿富汗本土对各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保罗·亚当斯报道下面的新闻。“美国**称**希望未来几天内与塔利班举行首次正

式会议,此前塔利班和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刚刚完成直接对话。美国人**说**会谈将会取得成功,前提是塔利班最终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结束暴力,接受阿富汗宪法。高级政府官员称这是个重要时机,但同时**警告说**,通往阿富汗和解之路将是复杂又麻烦的。”^②

译文二:

白宫**宣称**,美国未来几天将与塔利班进行公开的直接和谈。会议将在卡塔尔举行,阿富汗叛军已在那里设立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首个官方海外办公室。

然而,奥巴马总统在提到和谈时,却**听起来**比较谨慎。他**警告说**,美国并不指望和谈进程非常迅速而容易,但是美国必须在采取军事途径的同时,寻求这个进程,当然,美国同时还是会继续致力于对基地组织的军事打击和对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支持。

另一方面,塔利班发言人**指出**,塔利班已经满足了美国之前所**提出**的全部前提条件。他还表示,伊斯兰酋长国不会从本土对其他国家构成危害,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在阿富汗领土上对各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记者保罗·亚当斯展望了一下未来,**指出**,美国**宣称**,希望未来几天内能与塔利班举行首次正式会议,在这之后,希望塔利班将很快会和总统卡尔扎伊的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进行直接对话。美国人**相信**会谈必将取得成功,只要塔利班最终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结束暴力,并接受阿富汗宪法。高级政府官员称,这是个重要时机,但同时**敦促**大家要警惕;用其中的一位的话说,阿富汗和解之路将是复杂又麻烦的。^③

这篇新闻采取的是复合视角。从视角构成来看,复合视角将全知全能叙事视角、人物限制叙事视角和纯客观叙事视角组合或搭配使用。通常,这样的新闻会借助全知全能视角拓展人物限制视角所不能及的视域范围,同时,让人物限制视角来负责事件场景和人物言行的描绘任务,并增加新闻的现场感。复合视角汇融了多种叙事视角,所以也意味着有可能会融汇入各种视角的长处或者短处。所以,新闻在运用复合视角时,关键是要对各种视角的内在机理进行准确的把握,扬各自所长,避各自所短,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新闻传播任务,营造最佳的预期效果。

具体而言,在原新闻中,第一段是纯客观视角,第二段用的是全知全能视角,第三段用的是纯客观视角,第四段用的是人物限制视角。言语证素除了文中被标黑的10个词(包括1个词组)外(既有动词,也有名词),还包括一些直接引语,如2.2,2.3,3.2,4.2,4.3,4.4。在翻译过程中,这些言语证素的翻译将直接决定着译文的叙事视角。下面我们通过将不同的译文进行对比,进行具体的说明。

词语类言语证素的翻译

原文	译文一	视角变化(原→译)	译文二	视角变化(原→译)
1. 1 says	称	纯客观→纯客观	宣称	纯客观→纯客观
2. 1 sounded	发出	全知全能→纯客观	听起来	全知全能→全知全能
2. 1 a note of caution	警告		警告说	
3. 1 (spokesman) said	称	纯客观→纯客观	指出	纯客观→纯客观
3. 1 (the US) said	所说		提出	
4. 2 say	称	人物限知→人物限知	宣称	人物限知→复合视角(人物限制+全知全能)
4. 3 say	说		相信	
4. 4 calling	称		称	
4. 4 urging	警告说		敦促	
4. 4 words			……的话	

直接引语的翻译

原文	译文一	视角变化(原→译)	译文二	视角变化(原→译)
2. 2	保留	全知全能→纯客观	改成间接引语	全知全能→全知全能
3. 2	保留	纯客观→纯客观	改成间接引语	纯客观→纯客观
4. 2	保留	人物限知→人物限知	改成间接引语	人物限知→复合视角(人物限制+全知全能)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言语证素的不同翻译可能会引起叙事视角的改变。在翻译词语类语言证素的时候,若是选用带有明显感情或个人感知倾向的译文,那么,叙事视角可能会更倾向于人物限知视角,反之,如果选用更加中性的译文,就会更加倾向于纯客观视角,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会使全知全能视角。当然,译文是否会改变原文的叙事视角,还得看句式层面的翻译处理,尤其是对于直接引语的翻译。若将直接引语翻译成间接引语,在基本忠实于原材料信息、指明信息的来源的同时,能够让信息显得更加客观、真实、权威,但是,叙事视角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5. 结论

在英语新闻的汉译中,言语证素的翻译显得十分关键,因为它身系着信息的来源、叙事视角的传达以及新闻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对于原新闻文本来说,言语证素是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心灵契合点,是作者把自己体验到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之一;对于译文来说,更是如此。言语证素是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一条心灵通道,也是译文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新闻原作者和译者心灵窗户的密钥。翻译就是一种选择,选择用什么样的译入语字眼和句式来翻译原文中的言语证素,直接决定着译文的叙事视角是否跟原文一致,从以上的对比中可见一斑。

注释:

- ①该新闻来自 2013 年 6 月 22 日的 BBC 新闻,详见 <http://www.kekenet.com/broadcast/201306/245009.shtml>。新闻的分段、文中的标记和黑体都是笔者所加,是为了便于分析。
- ②该译文来自 2013 年 6 月 22 日的 BBC 新闻,详 http://www.kekenet.com/broadcast/201306/245009_4.shtml。新闻的分段、文中的标记和黑体都是笔者所加,是为了便于分析。
- ③该译文由笔者试译。

参考文献:

- [1]胡壮麟. 语言的可证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a(1): 9-15.
- [2]胡壮麟. 可证性, 新闻报道和论辩语体[J]. 外语研究, 1994b(2): 22-28.
- [3]黎明洁. 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 视角·主体·结构[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4]米克·巴尔. 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13-114.
- [5]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6]杨先顺. 试论新闻写作的叙事角度. 新闻大学[J]. 2001(夏): 36-39.
- [7]曾庆香. 新闻叙事学[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肖 谊

语言乃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立场论文^①

杨 旭¹ 王仁强² 译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要:社会功能是语言的根本功能之一。人类交往过程与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共同塑造了语言结构和语言知识。近年来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使用模式对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语言演变影响巨大。这些过程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同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AS)的不同方面。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语言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语言系统包含多个交际主体(即言语社群中的说者);语言系统具有适应性,即说者现在的言语行为是以其过去的言语交际为基础的,现在和过去的言语交际共同影响将来的言语行为;说者的言语行为是从感知约束到社会动因等诸多因素相互竞争的结果。语言结构是从经验、社交和认知机制的关联模式中涌现出的。CAS路径的研究表明,语言研究诸多领域(如一语/二语习得、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演化和电脑建模等)都存在相通之处。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基于使用的语法;言语社群;社交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

YANG Xu WANG Renqiang

Abstract: Language has a fundamentally social function. Processes of human interaction along with domain-general cognitive processes shape the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of language. Recent research in the cognitive sciences has demonstrated that patterns of use strongly affect how language is acquired, is used, and changes. These processes are not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but are facets of the sam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 Language as a CAS involves the following key features: The system consists of multiple agents (the speakers in the speech community)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The system is adaptive; that is, speakers' behavior is based on their past interactions, and current and past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兼类词处理策略研究”(CYS151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旭,男,山西介休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从事词典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王仁强,男,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词典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interactions together feed forward into future behavior. A speaker's behavior is the consequence of competing factors ranging from perceptual constraints to social motivations. The structures of language emerge from interrelated patterns of experienc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The CAS approach reveals commonalities in many areas of language research, including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Key words: CAS; usage-based grammar; speech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1. 引言:共同假设

社会功能是语言的根本功能之一。人类交际过程与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共同塑造了语言结构和语言知识。近年来,认知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表明,使用模式对语言习得、语言构造、语言的认知表征以及语言演变都有重要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语言的习得、使用和变化的过程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我们主张,最好把这个系统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CAS)。这个系统完全不同于生成语言学所普遍主张的语法原则静态系统。相反,作为一个涵盖动态使用及其经验的复杂适应系统,语言具有以下重要特征:①该系统涉及多个交际主体(即言语社群中的说者);②语言系统具有适应性,即说者现在的言语行为是以前过去的言语交际为基础的,现在和过去的言语交际共同影响将来的言语行为;③说者的言语行为是从感知约束到社会动因等诸多因素相互竞争的结果。语言结构是从经验、社交和认知机制的关联模式中涌现出的。

把语言视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对看似毫不相关的语言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Holland, 1995, 1998; Holland, et al., 2005)。这些语言现象包括:语言组织各个层面的变异、语言行为的概率本质、言语主体之间以及言语社群内部的连续变化、语法规则在语言使用中通过言语主体的交际过程涌现出来、潜在的非线性过程所导致的场景切换。本文将概述复杂适应系统研究路径有助于揭示语言研究诸领域(包括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一语/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存在相通之处。最后,我们将阐明,复杂适应系统研究路径有助于对涉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形成汇流证据的未来研究指明新方向,这些研究方法包括语料库分析、跨语言比较、语法化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实验以及电脑建模等等。

2. 语言与社交

语言是由范畴化、顺序加工和计划之类的人类认知能力所塑造的。然而,语言并非其简单产物。上述认知能力其实不需要语言参与。假如我们仅有这些认知能力,

我们其实无须开口说话。语言是人类用来进行社交的,语言的起源和功能取决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充当的角色(Croft,2009; Tomasello,2008)。要理解语言在人类谱系中是如何演化以及它为什么拥有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特征,我们需要观察许多约束条件互动之下的综合效应,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思维过程结构、感知与运动神经偏差、认知限制以及社会一语用因素等等(Christiansen & Chater,2008; Clark,1996)。

灵长目动物是尤喜社交的哺乳动物,但是人类的社交能力似乎更为凸显。这意味着语言是在一个高度社交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演化的。这种密集的交际表明,语言演化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来理解。语言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是文化知识传递、阐释和革新的主要方式。文化本身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为人类认为有趣和重要的事物的反映,而这又反过来反映了进化的生物偏好(如我们可以从满足生理欲望中获得愉悦)和文化偏好(如追求衣饰风格)的复杂互动。因此,语言和文化都是从日益复杂的社会存在中涌现出来的现象。

语言的本质源于其在社交中的角色。尽管有时候社交是不合作的,并出现明显的冲突,但通常还是符合行动哲学家所说的共享合作行动(Bratman,1992,1993,1997)或共同行动(Clark,1996)。共同行动取决于宽泛的共享认知,即认识到自己可以与他人共享信念和意图。共同行动至少涉及不同个体的单独行动会被有意识地执行为共享行动,比如搬钢琴和表演弦乐四重奏。关于共享合作行动的心理态度,Bratman列举了几点,其中包括为完成共同行动而协调子计划、承诺帮助别人,以及上述全部共享信念。

最后,Bratman也指出,为了实现共同行动,组成共同行动的个体行动必须有效协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搬钢琴的人或者表演弦乐四重奏的人没有协调各自的行动会出现什么状况?)这其实就是语言的终极来源。共同行动带来协调的问题(Lewis,1969)。解决共同行动中的协调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最简单的莫过于对环境中共同突显特征的共同关注(Lewis,1969; Tomasello,1999)。然而,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协调手段还是参与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可是交流属于一种共同行动:说者和听者必须在听者能够领会说者的意图上达成一致(Grice,1948/1989)。人类为交流发展出一种有力的协调手段,那就是规约,确切地说,是规约的信令系统(Clark,1996,1999; Lewis,1969)。规约是一种行为规则(可以产生特定语言形式的话语),它具有部分任意性,固化于言语社群。作为一种协调手段,它解决了不断协调的问题,即交流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交流作为一种手段,还能服务于其它任何一种人类希望采取或者希望出现的共同行动(或者其它类型的交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文化得以建构。

语言作为一个双层系统嵌入两个更高的层面:交流(即Grice所言的意义)和共同行动(言外行为即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参见Austin,1962; Searle,1969)。语言涉及运用诸如言谈、手势或者书写等媒介发出信令。这就是对话者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即 Austin 所说的言语行为。然而,这些信令又被 Searle 表述为命题行为,也就是语言学家所说的词语及语法构式。这样,语言运作最终涉及四个层面:说话听话、表达和识别命题、表达和识别交际意图、提议和采取共同行动(Clark,1992,1996)。

这个复杂模型其实脆弱不堪,因为我们都有误解过别人或被别人误解过的经历。不过,交流过程之所以脆弱并引起变异(最终导致语言演变),这是事出有因的。首先,当然就是我们无法解读别人的心思了。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协调手段的规约并非一成不变(Croft,2000,2009)。说者在交流过程中选择词语和构式(即语言规约)是以他在过去碰到类似情况时的规约使用情况为基础的。听者亦然——不过,有关这些规约在过去的使用情况,听者与说者不太一样。最后,交流中的新情况具有独特性,并且受制于不同的识解。尽管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交流的不可能性——毕竟恢弘的文明都是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交流具有不确定性,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才导致了语言演变无时不在。

3. 基于使用的语法

本文采用基于使用的语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语言的认知组织直接源于语言经验。不同于把语法视为一套与语言经验间接相关的抽象规则或结构,我们把语法看作一张建立在语言使用范畴化实例基础之上的网络(Bybee,2006;Hopper,1987)。语法的基本单位是构式——直接的形式—意义配对体,范围涵盖从非常具体的(如词或习语)到比较抽象的(如被动构式、双及物构式),从非常小的单位(如 walked 这种带有后缀的词)到小句层面甚至语篇层面的单位(Croft,2001;Goldberg,2003,2006)。

因为语法是建立在使用基础上的,所以它不仅包含出现和共现概率的记录,而且包含许多共现的细节。使用影响认知组织的证据包括:语言使用者知道规约化构式的具体实例、知道使用频率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其个人语言结构。后者包括提取速度与个例频率的相关性和高频形式对规则化的抵制(Bybee,1995,2001,2007),在句法和词法加工中的概率作用(Ellis,2002;Jurafsky,2003;MacDonald & Christiansen,2002),以及使用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Bybee,2003)。

近年来,许多实验研究(Saffran,Aslin & Newport,1996;Saffran,et al.,1999;Saffran & Wilson,2003)表明,幼儿和成人都会追踪人造语法中的共现模式和统计规律。这些研究表明,即使话语不指向任何意义或交际意图,受试也会学习其中的模式。这就难怪在真实的交流情景中词的共现情况会对认知表征有影响。多方证据表明,认知变化伴随语言使用,同时塑造了语法。不妨思考以下三个现象:

(1)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从可能组合中随机挑取。事实上,欲表达特定的想法,都会有一些常规方式可供选择(Sinclair,1991)。Pawley 和 Syder(1983)观察到,一门语言要表达得地道,需要的主要不是生成规则,而是有关预期言语模式的知识。英语本族人会说“I want to marry you”,但不会说“I want marriage with you”或者“I

desire you to become married to me”,尽管后两种说法也能表达相同意思。事实上,语料库分析表明,交流包含了大量的预制序列,而并非对所有可选词进行开放选择(Erman & Warren,2000)。只有当说者在记录词语共现的实例和追踪特定模式使用的语境的时候,才存在开放选择模式。

(2)语流中的发音模式表明,词语在语流中共现后会逐渐被追忆为组块。举例来说,Gregory 等(1999)发现,说话中语音弱化的程度(比如英语[t]在词尾的“闪化”)与相邻词的“交互信息”(即与随机分布形成对比的两个词共现的概率)有关(又见Bush,2001;Jurafsky,et al.,2001)。类似的现象在句法层面也有发生:高频的词语搭配会被编码为组块,从而影响到我们对句子的即时加工(Ellis,2008b;Ellis,Simpson-Vlach,Maynard,2008;Kapatsinski & Radicke,2009;Reali & Christiansen,2007a,2007b)。

(3)语言的历时演化指向一种必须考虑共现模式的模型。概言之,“一块儿使用的词项会熔合到一块儿”(Bybee,2002)。比如,英语中的缩写形式“I'm”和“they'll”就源于共现形式的熔合。助动词附着到其常用搭配上,也就是该词前面的代词上,尽管这种发展与传统的句法成分分析是背道而驰的。

语法和词汇在使用中相互影响(如哪些单词通常用于哪些构式)的详细信息表明,语法和词汇是高度融合而非截然分开的(Bybee,1998a;Ellis,2008b;Goldberg,2006;Halliday,1994;Langacker,1987)。说话者根据其所体验的语言形式、意义和语境把话语归纳为范例和范例丛等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表征(Pierrehumbert,2001)。因为范畴化在语言使用中随时发生,因此即使是成人的语法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随语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的潜势(参见MacDonald & Christiansen,2002;Sankoff & Blondeau,2007;Wells,et al.,2009)。

语言演变是通过局部交际缓慢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间或跨语言的共性就不存在。就像任何复杂适应系统一样,通过反复运用语言演变的一般过程,语言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普遍特征会出现在任何语言中。因为相同的过程适用于所有语言,普遍的相似性随之产生;不过,变化轨迹(如语法化路径)相对于结果状态而言更具有相似性(Bybee,Perkins & Pagliuca,1994;Greenberg,1978)。

在基于使用的框架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跨语言涌现出的普遍性,促进语言演变和显示语言表征的具体使用模式以及语言加工和演变的认知基础。有鉴于此,较之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式的数据来源大为扩展:基于语料库的共时历时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电脑建模等都为理解语言的认知表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4. 源于语言使用的语法发展

过去20年来的密集研究(Bybee et al.,1994;Heine,Claudi & Hünnemeyer,1991;Hopper & Traugott,2003)发现了语言中通过历时发展创造语法的机制。在有完整历

时记录的某些语言中,我们发现:构式中的词汇项目可以演变为语法项目,小句中和小句间组织松散的成分会变得更加紧密。这种过程被称之为“语法化”,它是许多言语事件重复的结果,在语法化过程中,要素序列被自动化为神经运动程序,并导致发音的弱化和词义的特定变化(Bybee, 2003; Haiman, 1994)。词义变化既有语境的影响,又有因重复使用而形成习惯的因素。其中,语境影响主要来自共现成分和组成构式义部分内容的频繁推理。

比如,英语中的将来表达式“be going to”现在已经实现了语法化,但它最初不过是一个表示主语将去某地做某事的普通表达。在莎士比亚的英语表达中,这个结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的所有剧作(共计 850 000 个词)中仅出现过 6 次。在当代英语中,这个结构使用得非常频繁,在一个 350 000 词次的小型英式英语语料库中就出现了 774 次。功能变化使频率增加成为可能,但是重复也是变化发生的一个因素。比如,这个结构失去了空间运动义,但增加了“试图做某事”的意义,而这在早期用法中不过是推断出来的意义而已。伴随重复而来的是语音融合与弱化,在当代英语中这个短语最常见的发音是“(be)gonna,”而它的组成部分已经难以辨认了。

所有语言的语法化过程实质上是相同的,其证据来源于一项对 76 种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中的动词标记及其历时来源所作的跨语言调查(Bybee et al., 1994)。该项研究表明,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时、体标记和情态派生于相似的语义来源。比如,在 76 种语言中,有 10 种语言的将来时源于意思为“去”的动词,有 10 种语言的将来时源于意思为“来”的动词,还有一些语言的将来时使用原义为“要”的动词(如英语中表达将来时的“will”,其原义就是“要”)。

因此,所有语言中的语法范畴都以相同的方式发展,但发展的结果不尽一致。来源于不同词汇的语法范畴在意义上会有细微差别;语法化程度不同的语法范畴,其意义和使用范围也不尽相同。同时也有一些罕见的词汇来源。比如:使用“soon”或“by and by”等时间副词来表达将来时看似罕见,但确实存在。

鉴于所有语言都可探查到处时发生的语法化,以此推测人类语言的语法来源遵循以下路径也就合情合理了:一旦人类能够把词合起来使用,发展出语法的潜力随之产生,此时不需要更多的机制,只要序列加工、范畴化、规约化和推测就足矣(Bybee, 1998b; Heine & Kuteva, 2007)。

语言演化是一个文化演化的过程(Croft, 2000; 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根据“选择的一般分析”(Hull, 1988, 2001),演化过程发生在两个相连的层面上:复制和选择。复制者就像基因、词汇或者婚姻实践这样的单位,一旦有创新和变异的机会就会被复制。选择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与环境互动的个体,比如有机体、作为说者或有文化者而存在的人类,致使复制者之复制存在差异。换言之,一些复制品相对而言被复制得更多,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前者的修复和后者的灭绝。在语言中,每次我们张口说话的时候,声音、词汇和构式等语言结构就会在话语中被复制。也就是说,复

制和变异就发生于当我们使用语言服务于社群中人类之间的共同行动的时候。复制过程中会产生变异,部分原因就在于上文所提到的交流之不确定性。说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复制特定结构,这取决于交际环境,即交际情景和交流对象。在前一种情况下,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与之相关的词语和构式的出现和消失[比如“cell (phone)”的出现和“harquebus”的消失];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身份和交际的社会语境会导致与说者不同社会价值相关的语言形式的出现和消失。

5. 一语/二语习得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Barlow & Kemmer, 2000)认为,我们是在交际中学会构式的,而时时处处塑造语言的正是交际和认知过程(Slobin, 1997)。这种理论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影响日益巨大(Goldberg, 2006; Tomasello, 2003)。它颠覆了传统生成语言学有关内在语言习得机制的假设、连续性假设以及自上而下、规则统辖的加工过程,取而代之的则是采用数据驱动和涌现论对语言系统特征进行阐释。构式学者以图表方式告诉我们:儿童利用一般认知能力对其语言使用历史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对蕴含其中的规则进行抽象,在此基础上涌现出创造性语言能力,即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看,语言习得就是一个取样的问题,涉及到从学习者有限的经验样本中对群体常值作出估计,其样本的感知受限于认知器官的约束性和可供性、他们所具有的人类经验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动态因素。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输入中不同构式出现的频率(Gernsbacher, 1994; Reali & Christiansen, 2007a, 2007b)和形式意义误配事件(MacWhinney, 1987)极为敏感,这些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果无疑证明,每个使用事件和对构式组件的加工过程都会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产生影响(Bybee & Hopper, 2001; Ellis, 2002)。

输入和交际一直是二语(L2)学习研究的核心(Gass, 1997;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在学习者对语言刺激进行即时加工的过程中,共现模式及其概率塑造了L2中介语。起初,这些构式体现出相互排斥(一对一规则)(Andersen, 1984)。接下来,它们被范畴化、泛化,并最终被分析为组织形式,虽然构式可以在不同的抽象程度上被同时表征和存贮,就像在一语(L1)中那样。L2的发展顺序真实反映语言输入的情况(Collins & Ellis, 2009; Ellis & Cadierno, 2009),其中包括构式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的齐夫分布(Ellis, 2002; Larsen-Freeman, 1976)、信号依赖(MacWhinney, 1997)、信号凸显及其结果在话语整体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Ellis, 2006; Goldschneider & DeKeyser, 2001)。L2构式对频率、近因和语境这三个联想学习要素特别敏感。如同L1学习一样,学习者不会简单遵从L2,他们会通过类推和模式重组来构造新形式超越L2(Larsen-Freeman, 1997)。其对图式的能产构式的习得遵循范畴学习的一般原则(Robinson & Ellis, 2007)。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一语习得与二语习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L2 学习者在学习 L2 时伴随着已经固化的 L1 模式(MacWhinney,1997)。对这些模式的神经认同产生跨语言的影响,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出来:发展顺序被逆转的速度、词汇重组、过度概括、避免使用、过量产和矫枉过正(Odlin,1989)。L1 也会调整学习者的感知机制,以至他们对已有知识的注意妨碍了他们感知到 L2 中的不同。其次,作为表征同一事件不同识解的规约化语言表达方式,构式通过特定语言提供给说者的选项来建构概念和调整视角(Talmy,2000)。跨语言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说话者在叙述同一事件的时候其侧重点大不相同(Berman & Slobin,1994)。因此,源于 L1 的概念模式塑造了构式的组合方式,导致不地道的范畴化和“为言而思”(Slobin,1996)。此外,尽管 L1、L2 习得都是社会认知过程(Kramersch,2002;Larsen-Freeman,2002),但是因为通常情况下 L2 学习者的认知更为成熟,因而他们学习 L2 与儿童习得 L1 的社会环境或条件大不相同。总之,认知语言学(Robinson & Ellis,2007)、心理语言学(Kroll & De Groot,2005)和社会语言学(Lantolf,2006)等视角的研究都无疑表明,学习 L2 比学习 L1 要复杂得多。

上述各种因素在动态中相互作用(de Bot,Lowie & Verspoor,2007;Ellis & Larsen Freeman,2006)的结果就是,即使是最勤奋的 L2 学习者,其最终所能达到的水平也远低于儿童习得 L1 的水平,对那些仅在日常生活中习得 L2 的人而言,他们只是掌握了一种以语用词序和最少形态为特征的“基本变体”(Klein & Purdue,1992)。L1 中语法功能词的用法模式妨碍了 L2 的习得,因为频繁使用的形式会出现缩略,并限制其感知凸显(Ellis,2006)。黏着语素尤其如此。为了帮助学习者学习这些形式,必须通过明确提示的方式唤起学习者的注意(Ellis,2005;Larsen-Freeman,2003)。如果不进行明确指示,大部分成人语言学习者典型的语言使用就是简化,且大多体现为冗余信息和不规则用法的缺失,还有就是表达透明度的增加(McWhorter,2003;Trudgill,2001)。以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形式涌现出的新语言就是语言演变过程中一个更加戏剧化的例子,在克里奥耳语和 L2 学习者中介语基本变体的语法结构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Becker & Veenstra,2003;Schumann,1978)。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取笑 L2 学习的不足之处,而应该把成人看作具有多种能力的学习者(Cook,1991),在完成各种语言的学习中,拥有解决所遇问题的多重技能(Simon,1957)。

因此,从 CAS 视角来看,典型的 L2 学习者最终状态上的局限正是言语社群成员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语言演变、语言感知和语言学习动态循环的结果(Ellis,2008a)。总之,我们认为:①使用导致变化:语法功能词的高频使用导致发音弱化和同音(形)异义;②变化影响感知:发音弱化的信号感知困难;③感知影响学习:低突显的信号学起来很难,同音(形)异义或多义构式亦然,因为其形式一功能关联度低;④学习影响使用:④当成人是在不注意其形式的情况下自然学得语言的,那么典型的结果就是中介语的一种基本变体,语法结构简易但能达到有效交流。因为使用导致变化,在 L1 学习者不能脱口说出目标语的情况下,自然习得的接触语会大大简化并失

去语法复杂性;或者:⑥当努力去提升形式上的准确性时,通过调动学习者意识、形式聚焦和显性学习等因素,就能摆脱基本变体的石化状态。因为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语言维护。

6. 模拟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化

在本文所论述的语言的各个方面之中,语言形式、使用者与使用密切关联。然而,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很难在人体内部进行调查。长达数月对个人的语言使用和习得进行详实的纵向研究非常罕见,而要把调查范围扩展至整个言语社团,把时间延展到覆盖整个语言演化过程,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的语料库研究和心理语言学调查将采用取样的办法,集中调查变化最多的时段和最重要的交际情景。不过,调查语言是如何以 CAS 方式涌现和演化也有其它的办法。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数学建模或者电脑建模。

鉴于相关数据稀缺,人们可能会想,这种方法用处有限。我们认为这并非事实,因为我们相信语言的很多性质都是涌现的,建模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证明:特定基础机制组合起来会产生一些可观察到的效应(Holland,1995,1998,2006a,2006b;Holland et al.,2005)。尽管这完全可以通过论辩方式进行证明,但是建模可以提供额外的定量信息来指正缺陷。比如,Baxter等(2009)沿用Trudgill(2004)基于使用理论而提出的新方言形成模式并建构了一个数学模型,加上Gordon等(2004)的相关实证数据就能显示:尽管模型预测了一种实际的方言,但是其形成时间却比实验观察到的要长得多。而Reali和Christiansen(2009)的研究则表明,认知约束条件对几代人序列学习的影响可以催生出一致的语序规则。

对于哪些机制对涌现行为影响最大,哪些基本没什么影响,建模同样可以提供参考。为了阐明这一点,不妨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先前的经验是影响个体说者言语行为的关键因素。在基于言语主体的框架中,坚持这种观点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不同的说者会表现出不同的言语行为,而且会跟社群中的不同成员进行交流(正如现实中一样)。即便在简单的模拟模型中,文化创新被采纳为社群规范的可能性和所花的时间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结构的巨大影响。对于这些模型及其特征,Castellano、Fortunato和Loreto(2007)有很好的回顾。这个形式化的结果为收集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数据提供了动力,因为这些数据看来还缺乏实证支持。文献中讨论过的少数例子,比如电影合作明星之间的网络(Watts & Strogatz,1998)、科研合作者(Newman,2001)、处于性活跃期的高中生(Bearman,Moody & Stovel,2004),都与语言没什么明显的关联。我们因此设想:形式建模和实证数据收集将互为指引。

建模是定量研究的事实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建模既是科学又是艺术。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力量法则不像与之对应的物理现象那样容易通过数学建模和实验检验。不过,把语言看成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尤其是基于使用的理论框架,确实能够在语言

使用、变异和变化的数学模型或电脑模型构建中设置一些约束条件。

显然,需要为说者设置一个规定,即他会说出与别人不同的话语(语法)。变异单位取决于建模对象。比如,在语言竞争模型中(参见 Abrams & Strogatz, 2003; Minnet & Wang, 2008; Reali & Christiansen, 2009; Schulze, Stauffer & Wichmann, 2008),自然应该根据所说的语言来定义说者。在另外的场合,客体(或概念)和声音之间的“具体匹配”就比较合适(Hurford, 1989; Nowak, Komaraova & Niyogi, 2002; Steels, 2000)。而另一种更灵活的办法就是采用抽象的变异单位——Croft (2000)称之为“语位”(linguemes)——包括各种类型的语言变异,从单个的元音到句子结构(参见 Baxter, Blythe, Croft & McKane, 2006; Oudeyer & Kaplan, 2007)。

最重要的是,基于使用的模型应该让人洞察到言语社群中变体的频率。从这点来说,应该通过一般机制所提供的信息归纳出产生话语的规则。以往的研究路径认为说者预置有固定的、先验存在的语法,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路径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已经主张需要一种基于言语主体的理论模型,它考虑到言语主体接触史中的变异(可能是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行为。重要的是,塑造说者语法的交际会贯穿他的一生(有关建模研究中利用到该路径的例子可以参阅 Baxter 等(2009)、Wedel(2006)。这种观点不同于以前的路径,后者认为,从上一代稳定的说者到下一代不稳定的学习者的纵向传播是语言演变的主要机制(Nowak et al., 2002; Smith, Kirby & Brighton, 2003)。因此,话语人群的动态性与潜在人群的动态性并不是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较之其他理论,在语言塑造中自然选择所充当的作用则有可能被削弱(Croft, 2002; Nowak et al., 2002)。

尽管如此,语言交际中的许多细节仍有待限制;而且我们还可以追问,通过建模再现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就可以证明其中的假设是正确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如果一个模型可以基于现有数据和理论作出新的、可验证的预测,那么我们对这些假设将更有信心。在一个模型包含特定规则的事件中,为了与把语言视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观点保持一致,我们必须通过独立证据来证明,这些规则是更为基础、更为一般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特征。

7. 语言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语言具有七大特点,这七大特点与语言演变、语言使用、语言习得和电脑建模相关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这里简要介绍如下:

7.1 分布控制和集体涌现

语言既存在于言语个体中(即作为个人语言),又存在于使用群体中(即作为社群语言)。语言在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层面都可以涌现出来:个人语言是言语个体通过与社群语言中的其他个体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而社群语言的涌现则是个人语言交互影响的结果。两个层面的区别与联系是所有复杂适应

系统的共性。集体层面的模式(比如鸟群、鱼群或经济体)不能归结为个体之间的全局协作,因为全局模式是涌现出来的,是个体之间长期局部互动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务必搞清楚特定语言现象所在的层面。比如,语言演变就是一个在社群语言层面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导致语言演变的机制(比如导致发音弱化的语言表达经济性和频率效应)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或者在同一时间作用于全部个体。此外,导致语言演变初期创新的功能/社会机制在后期并不一定产生作用。比如,随着这个创新用法在社群语言中如同大多数词一样定型下来,其他后来的个体完全可以通过反复使用而习得这个当初的创新用法。语言演变的实际过程非常复杂,且与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电脑建模有助于我们洞察其涌现机制(详见 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

7.2 内在多样性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主体代表。正如在经济中并不存在理想的消费者代表一样,对于语言使用、语言表征和语言发展而言,也不存在理想的说者—听者。个人语言都是个体独特的语言输入和语言使用经验的产物(Bybee, 2006)。社会语言学研究已经表明,个人语言之间存在大量的有序异质性(Weinreich, Labov & Herzog, 1968),不仅在语言使用方面如此,在其内部组织和表征方面也是如此(Dbrowska, 1997)。注意到内在多样性对理论建构大有益处。当对自上而下的规律和语言共性约束参数的探寻停滞不前时,认知语言学转而开始调查从低层表征互动中涌现出来的共性,如在构式语法中所描述的那些低层表征,以及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交能力、共同注意、模式萃取和模仿等一般认知能力。

7.3 永远的动态性

社群语言和个人语言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与重组之中。语言在不断演变,语言变化无处不在(Hopper, 1987)。在个体层面,每一次语言使用都会改变个人语言的内部组织(Bybee, 2006)。当我们主要以“动态”而非导向静止平衡的“力量”来定义语言时,它实际上与其它复杂系统一样拥有远离平衡的性质(Holland, 1995)。开放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化,并自动适应进入系统的力量所注入的动力,而封闭系统则会还原到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7.4 通过因素加强和竞争而达到适应

复杂适应系统通常包含多个互动因素,它们会彼此增强和/或相互竞争。复杂系统倾向于通过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的交互影响而产生结构,其中正面反馈会让某些元素留存下来,而负面反馈则会强加某些限制条件,比如空间或资源的局限(Camazine, et al., 2001; Steels, 2006)。语言亦然,所有因素都是互动互融的。比如,语言可能在说者和听者利益冲突的拉锯战中发生变化:说者偏好表达的经济性,促进言简意赅和发音弱化,而听者希望得到感知上的凸显、明晰和清楚,要求详细表达(Zipf, 1949; DuBois, 1985; Lindblom, 1990; Cooper, 1999; 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语言会因利他的信息分享和社会合作而演化,也会因团体之间为关联和地位的竞争

而发生演化(Dessalles,2000)。

7.5 非线性和相变

在复杂系统中,特定参数细微的量变经常引起相变(也就是质变)。Elman(2005)指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在多个方面(如社交能力、共同注意、记忆容量、快速测序能力、声道控制等方面)存在着细小的表型差异,而这些细小差异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赋予人类的交流方式以完全不同的特性。此外,在动态系统中,即使没有任何参数上的变化,也可能在一个持续动态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发生行为突变,从而引起相变。比如,水在持续加热的情况下就会从液体变成气体,其中并没有任何参数变化。

在语言发展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相变。语言发展中的“词汇激增”常常导致语法方面迅速提升(Bates & Goodman,1997)。语言演变中的动态S型曲线也属于一种相变。一些有关语言起源的电脑建模就展现出这个特征(Ke, et al., 2002; Kirby, 2000)。作为语言使用结果的语法化(即词汇项目变成语法项目的过程)就是这种相变的另一个例子。举例来说,在英语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表示“知道”的主动词“cunnan”在使用频率激增之后发生了质变:如今“can”是一个表示根源可能的助词(Bybee, 2003)。语言演变伴随个体说者的话语和推论而逐渐积累。但是在演变过程的某一点上,进程会逐步加快:当“can”的意思变得更为抽象和概括时,其使用频率大大增加,其语法化程度也进一步增强。

7.6 网络结构敏感性和依赖性

复杂系统网络研究表明,真实世界的网络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随机的(Barabási, 2002; Barabási & Albert, 1999; Watts & Strogatz, 1998),复杂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连通性对系统动力学具有深远影响(Newman, 2001; Newman, Barabási & Watts, 2006)。同样,语言交际也并非随机的;语言交际受社会网络的约束。语言使用 and 语言交际的社会结构对语言演变的过程具有重要影响(Milroy, 1980),对语言变异也有重要影响(Eckert, 2000),而早期人类的社会结构在语言的起源和演变中肯定也扮演过重要角色。认识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仍然是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变研究的重要目标。而通过电脑建模和数学方程来调查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也同等重要(Baxter, et al., 2009)。

7.7 变化的局部性

复杂性是通过渐变方式在系统中产生的,是基于局部可用资源而非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产生的,也不是朝着特定目标移动(参见Dawkins, 1985)。同样,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中,语言被视为诸多领域一般认知能力的延伸,其中包括共同注意、模仿、顺序学习、组块和范畴化等(Bybee, 1998b; Ellis, 1996)。语言是通过不间断的社会交往涌现出来的,而语言结构是通过先在的认知能力、认知加工特质与局限以及人脑一般和特殊的概念回路塑造而成的。因为从语言起源开始每一代语言使用者都是如此,语

言可以说是文化适应人脑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人脑去适应加工自然语言语法的结果(Christiansen, 1994; 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 Deacon, 1997; Schoenemann, 2005)。上述视角对大脑加工语言的方式都有影响。具体而言,语言对与多种概念理解、社交加工以及模式识别与记忆密切关联的脑区极度依赖。它也预示了,所谓“语言区”即便在现代人的大脑中也应该具有更为一般的前语言加工功能;而且,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其相应脑区加工信息的方式也应该使它们成为初始语言中可预测的基质。此外,它还进一步预示,交流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复杂性的功能体现。鉴于社会复杂性反过来与灵长类动物的脑容量相关,因此早期人类脑容量的演变应能让我们找到语言演变的蛛丝马迹(Schoenemann, 2006)。把语言视为复杂适应系统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各个层面发生的变化。

8. 结语

语言中的认知、意识、经验、体验、大脑、自我、人类交际、社会、文化和历史以丰富、复杂和动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万物相连。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复杂性以及缺少明显统揽,模式还是无处不在,语言并非混乱无序。语言模式并不是由上帝、基因、学校课程或者其它人类政策所预定的;相反,它是涌现出来的,包括发生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篇章、体裁等语言组织各个层面的共时模式,语言使用的动态模式,语言演变(如语法化、皮钦化和克里奥耳化等的语言循环等)的历时模式,儿童语言习得中的个体发育发展模式,以及语言消长得失的全球地缘政治模式,等等。除非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否则我们将难以理解这些现象。本专辑中的其他论文将具体展示各种语言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揭示 CAS 框架有助于指引未来的理论研究。

注释:

①原作:Beckner, Clay, et al. .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J].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s1): 1 - 26.

参考文献:

- [1] Abrams, D. M. & S. H. Strogatz, Modelling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Death [J]. *Nature*, 2003 (424): 900.
- [2] Andersen, R. W. The One to One Principle Of Interlanguage Construc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1984(34): 77 - 95.
- [3]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4] Barabási, A. -L. *Linked: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M]. Cambridge, MA: Perseus Books, 2002.
- [5] Barabási, A. -L. & Albert, R.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 [J]. *Science*, 1999 (286): 509 - 511.
- [6] Barlow, M. & S. Kemmer.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M].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2002.

- [7] Bates, E. & J. C. Goodman. On the Inseparability of Grammar and the Lexicon: Evidence from Acquisition, Aphasia and Real-Time Processing [J].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997(12), 507 - 586.
- [8] Baxter, G. J., Blythe, R. A., Croft, W. & A. J. Mckane. Utterance Selection Model of Language Change [J]. *Physical Review E*, 2006(73):046118.
- [9] Baxter, G. J., Blythe, R. A., Croft, W. & A. J. Mckane. Model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aluation of Trudgill's Theory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Zealand English [J].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2009, 21(2): 257 - 296.
- [10] Bearman, P. S., Moody, J. & K. Stovel. Chains Of Affection: The Structure of Adolescent Romantic and Sexual Network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110): 44 - 92.
- [11] Becker, A. & T. Veenstra. Creole Prototypes as Basic Varieties and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G]// C. Dimroth & M. Starren.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2003: 235 - 264.
- [12] Berman, R. A. & D. I. Slobin.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A Cross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Study* [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4.
- [13] Bratman, M. 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y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92(101): 327 - 341.
- [14] Bratman, M. Shared Intention [J]. *Ethics*, 1993(104): 97 - 113.
- [15] Bratman, M. I Intend That We [G]// G. Holmström-Hintikka & R. Tuomela (eds.). *Contemporary Action Theory*, Vol. 2. Dordrecht: Kluwer, 1997: 49 - 63.
- [16] Bush, N. Frequency Effects and Word-Boundary Palatalization in English [M]// J. Bybee & P.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Benjamins, 2001: 255 - 280
- [17] Bybee, J. Regular Morphology and the Lexicon [J].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995(10): 425 - 455.
- [18] Bybee, J. The Emergent Lexicon [G]// M. C. Gruber, D. Higgins, K. S. Olson & T. Wysocki (eds.). *CLS 34: The Pane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98a: 421 - 435.
- [19] Bybee, J.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Grammar and Its Evolution [J].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1998b(2): 249 - 278.
- [20] Bybee, J.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1] Bybee, J. Sequentiality as the Basis of Constituent Structure [M]// T. Givón & B. F. Malle (eds.).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Out of Pre-Language*. Amsterdam: Benjamins, 2002: 109 - 132.
- [22] Bybee, J.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G]// R. D. Janda & B. D. Joseph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3: 602 - 623.
- [23] Bybee, J. 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J]. *Language*, 2006(82): 711 - 733.
- [24] Bybee, J. *Frequency of Us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5] Bybee, J. & P. Hopper.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01.
- [26] Bybee, J., Perkins, R. & W.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27] Camazine, S., Deneubourg, J.-L., Franks, N. R., Sneyd, J., Theraulaz, G. & E. Bonabeau. *Self-Organiz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8] Castellano, C., Fortunato, S. & V. Loreto. Statistical Physics of Social Dynamics [J]. *Arxiv Preprint Arxiv*, 2007(7): 32 - 56.
- [29] Christiansen, M. H. *Infinite Languages, Finite Minds: Connectionism,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 [D].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94.
- [30] Christiansen, M. H. & N. Chater. Language As Shaped By the Brain [J].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2008(31): 489 - 509.
- [31] Clark, H. H. *Arenas of Language Us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992.
- [32] Clark, H. H. *Using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3] Clark, H. H. On the Origins of Conversation [J]. *Verbum*, 1999(21): 147 - 161.
- [34] Collins, L. & N. C. Ellis, Input and Second Langua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Frequency, Form, and Function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9, 93(2).
- [35] Cook, V. The Poverty-Of-The-Stimulus Argument and Multi-Competence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91(7): 103 - 117.
- [36] Cooper, D. *Linguistic Attractors: The Cognitive Dynamic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hange*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9.
- [37] Croft, W. *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M]. London: Longman, 2000.
- [38] Croft, W.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9] Croft, W. The Darwinization of Linguistics [J]. *Selection*, 2002(3): 75 - 91.
- [40] Croft, W. Towards A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V. Evans & S. Pourc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2009: 395 - 420.
- [41] Dbrowska, E. The LAD Goes to School: A Cautionary Tale for Nativists [J]. *Linguistics*, 1997(35): 735 - 766.
- [42] Dawkins, R. *The Blind Watchmaker* [M]. New York: Norton, 1985.
- [43] De Bot, K., Lowie, W. & M. Verspoor. A Dynamic Systems Theory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7(10): 7 - 21.
- [44] Deacon, T. W.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45] Dessoalles, J. -L. *Aux Origines Du Langage: Une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Parole* [M]. Paris: Hermès, 2000.
- [46] Dubois, J. A. Competing Motivations [G]//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Benjamins, 1985: 343 - 366.
- [47] Eckert, P.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 [M]. Oxford: Blackwell, 2000.
- [48] Ellis, N. C. Sequencing in SLA: Phonological Memory, Chunking, and Points of Order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6, 18(1): 91 - 126.
- [49] Ellis, N. C.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4(2): 143 - 188.
- [50] Ellis, N. C. At the Interface: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Language Knowledg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5(27): 305 - 352.
- [51] Ellis, N. C.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ransfer Phenomena in SLA: Contingency, Cue Competition, Salience, Interference, Overshadowing, Blocking,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 27(2): 1 - 31.
- [52] Ellis, N. C. The Dynamics of Language Use, Language Change, and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 Acquisition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8a, 41(3): 232 - 249.
- [53] Ellis, N. C. Phraseology: The Periphery and the Heart of Language [G]// F. Meunier & S. Grainger (eds.). *Phraseology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msterdam: Benjamins, 2008b: 1 - 13.
- [54] Ellis, N. C. & T. Cadierno. (eds.). Constructing a Second Language. Special Section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9(7): 113 - 292.
- [55] Ellis, N. C. & D. Larsen-Freeman.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 27(4).
- [56] Ellis, N. C., Simpson-Vlach, R. & C. Maynard. Formulaic Language in Native and Second-Language Speakers: Psycho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ESOL [J]. *TESOL Quarterly*, 2008, 42(3): 375 - 396.
- [57] Elman, J. L. Connectionist View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Where Next?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5(9): 111 - 117.
- [58] Erman, B. & B. Warren. The Idiom Principle and the Open Choice Principle [J]. *Text*, 2000(20): 29 - 62.
- [59] Gass, S. *Input,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s*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7.
- [60] Gernsbacher, M. A. *A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M].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 [61]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3(7): 219 - 224.
- [62]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3] Goldschneider, J. M. & R. Dekeyser. Explain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L2 Morpheme Acquisition” in English: A Meta-Analysis of Multiple Determinants [J]. *Language Learning*, 2001(51): 1 - 50.
- [64] Gordon, E., Campbell, L., Hay, J., Maclagen, M., Sudbury, A. & P. Trudgill, *New Zealand English: Its Origins and Evolu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5] Greenberg, J. Diachrony, Synchron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G]// J. H. Greenberg, C. A. Ferguson & E. A. Moravcsik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1. Method and The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61 - 92.
- [66] Gregory, M., Raymond, W. D., Bell, A., Fossler-Lussier, E. & D. Jurafsky, The Effects of Collocational Strength and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in Lexical Production [J].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99(35): 151 - 166.
- [67] Grice, H. P. *Meaning: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1989.
- [68] Haiman, J. 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 W. Pagliuca (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1994: 3 - 28.
- [69]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70] Heine, B., Claudi, U. & F. Hü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71] Heine, B. & T. Kuteva. *The Genesis of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2] Holland, J. H. *Hidden Order: How Adaption Builds Complexity* [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5.
- [73] Holland, J. H.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4] Holland, J. H. A Cognitive Model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J]. *Journal of Bio-Education*, 2006a(1): 79 - 83.

- [75] Holland, J. H. Studying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J].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2006b(19): 1 - 8.
- [76] Holland, J. H. , Gong, T. , Minett, J. W. , Ke, J. & W. S.-Y. Wang.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G]// J. W. Minett & W. S.-Y. Wang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411 - 435.
- [77] Hopper, P. J. Emergent Grammar [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87(13): 139 - 157.
- [78] Hopper, P. J. &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79] Hull, D. L. *Science As A Process: 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the Social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80] Hull, D. L. *Science and Selection: Essays On 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1] Hurford, J. Bi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aussurean Sign as a Component of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J]. *Lingua*, 1989(77): 187 - 222.
- [82] Jurafsky, D. Probabilistic Modeling in Psycholinguistics: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G]// R. Bod, J. Hay & S. Jannedy (eds.).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39 - 95.
- [83] Jurafsky, D. , Bell, A. , Gregory, M. & W. D. Raymond, Probabilistic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Evidence From Reduction in Lexical Production [G]// J. Bybee & P.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Benjamins, 2001: 229 - 254.
- [84] Kapatsinski, V. & J. Radicke.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Prefabs: Evidence From Monitoring [G]// R. Corrigan, E. A. Moravcsik, H. Ouali & K. M. Wheatley (eds.). *Formulaic Language: Volume 2. Acquisition, Loss, Psychological Reality, Functional Explan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2009: 499 - 520.
- [85] Ke, J. -Y. , Minett, J. , Au, C. -P. & W. S. -Y. Wang. Self-Organiz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Vocabulary [J]. *Complexity*, 2002(7): 41 - 54.
- [86] Kirby, S. Syntax Without Natural Selection: How Compositionality Emerges From Vocabulary in a Population of Learners [G]// C. Knight (Ed.). *The Evolutionary Emergence of Language: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Origins of Linguistic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3 - 323.
- [87] Klein, W. & C. Purdue, *Utterance Structure: Developing Grammars Again*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2.
- [88] Kramsch, C.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M]. London: Continuum, 2002.
- [89] Kroll, J. F. & A. M. De B. Groot.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0] Krug, M. String Frequency: A Cognitive Motivating Factor in Coalescence,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Linguistic Change [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1998(26): 286 - 320.
- [91]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92] Lantolf, J.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L2: State of the Art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6(28): 67 - 109.
- [93] Larsen-Freeman, 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Morpheme Acquisition Order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J]. *Language Learning*, 1976(26): 125 - 134.
- [94] Larsen-Freeman, D.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 Linguistics*, 1997(18): 141 - 165.
- [95] Larsen-Freeman, 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Use From A Chaos/Complexity Theory Perspective [G]// C. Kramsch (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2.
- [96] Larsen-Freeman, D. *Teaching Language: From Grammar to Gramaring* [M]. Boston: Heinle & Heinle, 2003.
- [97] Larsen-Freeman, D. & L. Cameron. *Complex System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98] Larsen-Freeman, D. & M. Long.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 New York: Longman. 1991.
- [99] Lewis, D. *Conven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 [100] Lindblom, B. Explaining Phonetic Variation: A Sketch of the H & H Theory [G]// W. Hardcastle & A. Marchal (eds.). *Speech Production and Speech Modeling*.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0: 403 - 439.
- [101] Macdonald, M. C. & M. H. Christiansen. Reassessing Working Memory: Comment On Just and Carpenter (1992) and Waters and Caplan (1996)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2(109): 35 - 54.
- [102] Macwhinney, B.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Model [G]// A. M. B. De Groot & J. F. Kroll (eds.). *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7: 113 - 142.
- [103] Macwhinney, B. *Mechanism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7.
- [104] Mcwhorter, J. Pidgins and Creoles As Models of Language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Art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3(23): 202 - 212.
- [105] Milroy, J.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M]. Oxford: Blackwell, 1980.
- [106] Minnet, J. W. & W. S.-Y. Wang. Modell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The Effects of Bilingu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J]. *Lingua*, 2008, 118(1):19 - 45.
- [107] Newman, M. E. J.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Fundamental Results [J]. *Physical Review E*, 2001, 64(1): 016131.
- [108] Newman, M. E. J., Barabási, A. -L. & D. J. Watts,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Network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09] Nowak, M. A., Komaraova, N. L. & P. Niyogi. Computational and Evolutionary Aspects of Language [J]. *Nature*, 2002(417): 611 - 617.
- [110]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11] Oudeyer, P. -Y. & F. Kaplan. Language Evolution As A Darwinian Process: Computational Studies [J]. *Cognitive Processing*, 2007(8): 21 - 35.
- [112] Pawley, A. & F. H. Syder. Two Puzzl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Nativelike Selection and Nativelike Fluency [G]// J. C. Richards & R. W.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83: 191 - 225.
- [113] Pierrehumbert, J. Exemplar Dynamics: Word Frequency, Lenition, and Contrast [G]// J. Bybee & P.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Benjamins, 2001: 137 - 157
- [114] Reali, F. & M. H. Christiansen. Processing of Relative Clauses is Made Easier By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7a(57): 1 - 23.
- [115] Reali, F. & M. H. Christiansen. Word Chunk Frequencies Affect the Processing of Pronomial Object-Relative Claus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07(60): 61 - 170.
- [116] Reali, F. & M. H. Christiansen. Sequential Learn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 Linguistic Adaptation in Language Evolution [J]. *Interaction Studies*, 2009(10): 5 - 30.
- [117] Robinson, P. & N. C. Ellis. *A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LA*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7.
- [118] Saffran, J. R., Aslin, R. N. & E. L. Newport.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8-Month-Old Infants [J]. *Science*, 1996(274): 1926 - 1928.
- [119] Saffran, J. R., Johnson, E. K., Aslin, R. N. & E. L. Newport. Statistical Learning of Tone Sequences By Human Infants and Adults [J]. *Cognition*, 1999(70): 27 - 52.
- [120] Saffran, J. R. & D. P. Wilson. From Syllables to Syntax: Multilevel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12-Month-Old Infants [J]. *Infancy*, 2003(4): 273 - 284.
- [121] Sankoff, G. & H. Blondeau. Language Change Across the Lifespan: /R/ in Montreal French [J]. *Language*, 2007(83): 560 - 614.
- [122] Schoenemann, P. T. Conceptual Complexity and the Brain: Understanding Language Origins [G]// W. S.-Y. Wang & J. W. Minett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47 - 94.
- [123] Schoenemann, P. T. Evolution of the Size and Functional Areas of the Human Brain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6(35): 379 - 406.
- [124] Schulze, C., Stauffer, D. & S. Wichmann. Birth, Survival and Death of Languages By Monte Carlo Simulation [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 2008(3): 271 - 294.
- [125] Schumann, J. H. *The Pidginis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7.
- [126]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27]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RAL*, 1972(10): 209 - 231.
- [128] Simon, H. A.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M].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57.
- [129]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0] Slobin, D. I. From "Thought and Language" to "Thinking for Speaking." [G]// J. J. Gumperz & S. C. Levinson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0 - 96.
- [131] Slobin, D. I. The Origins of Grammaticizable Notions: Beyond the Individual Mind [G]// D. I. Slobin (Ed.). *The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7: 265 - 323.
- [132] Smith, K., Kirby, S. & H. Brighton. Iterated Learning: A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J]. *Artificial Life*, 2003(9): 371 - 386.
- [133] Steels, L. 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G]// M. Schoenauer, K. Deb, G. Rudolph, X. Yao, E. Lutton, J. J. Merelo & H.-P. Schwefel (eds.). *Parallel Problem Solving From Nature—PPSN VI,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1917. Berlin: Springer, 2000: 17 - 26.
- [134] Steels, L. How to Do Experiments in Artificial Language Evolution and Why [G]//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2006: 323 - 332.
- [135]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136] Tomasello, M.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7] Tomasello, M.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38] Tomasello, M. *The 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 [139] Trudgill, P. Contact and Simplification: Historical Baggage and Directionality in Linguistic Change

- [J]. *Language Typology*, 2001(5): 371 - 374.
- [140] Trudgill, P. *New-Dialect Formation: The Inevitability of Colonial Englishe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1] Watts, D. J. & S. 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J]. *Nature*, 1998(393): 440 - 442.
- [142] Wedel, A. B. Exemplar Models, Evolu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J]. *The Linguistic Review*, 2006(23): 247 - 274.
- [143] Weinreich, U., Labov, W. & M. I.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G]// W. P. Lehmann & Y.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95 - 195.
- [144] Wells, J., Christiansen, M. H., Race, D. S., Acheson, D. & M. C. Macdonald. Experience and Sentence Processing: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Relative Clause Comprehension [J].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9(58): 250 - 271.
- [145] Zipf, G. K. *Human Behaviou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1949.

责任编辑:蒋勇军

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教学研究： 从词语到语体^①

詹宏伟 张 霞 吴龙凤 译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论述了语料库与学术英语教学的紧密联系。首先解释了 Sinclair 词本论的概念,接着对有关词汇、短语(包括词块)和语篇修辞功能的研究进行了说明,最后结合语料库和 Swales 的语步结构分析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论文强调,在语料库研究以及学术英语(普通学术英语和专门学术英语)教学中,要重视词汇的作用。

关键词:语料库;学术英语;教学;词汇

Corpus-based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EAP: From Lexis to Genre

Lynne FLOWRDEW trans. by ZHAN Hongwei, et al.

Abstract: This plenary paper showcases the tight links between corpus research and pedagogic application to written discourse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It first explicates Sinclair's concept of the 'lexical approach', then discusses studies which focus on individual lexical items, phraseology (including lexical bundles) and rhetorical functions in discourse. It further goes to exam studies that combine Swalesian move structure analysis with corpus analysis. This whole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lexis in both corpus research and pedagogic applications of corpus findings in the realm of written discourse in EAP, covering both general and more specific purposes.

Key words: corpus; written discourse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pedagogy; lexis

1. 引言

近 40 年来,语料库在语言学和教学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

作者简介:詹宏伟,男,江西瑞昌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张 霞,女,河南南阳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吴龙凤,女,安徽安庆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部分涉及到语言语法的研究,如 Biber(2006)探讨学术语体的语法变异,Biber et al. (1999)的著作《朗文口语语法》(*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对包含口语、报纸、小说和学术四个不同语域的 4000 万词的语料库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语法变化在不同语域的呈现情况。一方面,利用语料库对语法范畴的分析产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像上文提到的,对语言教学的应用有一定的启示;另一方面,语料库和词汇分析相结合的创新研究也不胜枚举。这里,研究对象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原因是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词汇在语料库和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比如在 Nation(2001)的著作中,他重新审视了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和当下词汇—语法分析方法的关系,Sinclair(1999)指出词汇高于语法的地位。另外,Halliday(2004)指出,语料库主要通过一系列专用的索引软件生成“类符”(词形)统计列表,进而分析语言的使用特点,而以“功能词”为主题词的检索方式比以“语法结构”为主题词的检索方式简便易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语料库中就不能索引出要研究的语法范畴结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便于系统地分析,需要对索引出的语料做进一步的语法范畴标注。类似的情况是,在未经过标注的语料中,索引出过去式的动词将是一件非常费心的任务。

就语言教学而言,语料库在词典和语法用书编纂过程中能直接发挥较大的作用,而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则不然。(Stubbs 2004)虽然在课堂中教师能够将索引出的词汇生成表展示给学生或者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检索任务,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有效渗入到所有课堂中,或者至少到大学课堂,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建立一个专门适合于英语学习者学习的语料库有困难,并且,像学生和老师这样的群体缺乏语料库学习策略的培训。

鉴于此,本篇论文将主要关注两点,第一点:将语料库和词汇分析方法应用在通用学术英语和专业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中所利用到的语料库大部分是由个人团体在研究机构编译(Flowerdrew 2004, 2010)。第二点:多种语料库分析方法的展现,帮助课堂教学的直接、有效进行。

围绕着上述的关注点,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 Sinclair(1999)提出的“词本论”(lexical approach)概念,着眼于以单个词为出发点的相关应用和研究。然后讨论了这些词的语法行为,包括经常提及到的“词块”方面,接着从功能的角度分析词汇,诸如,和 evidence 和 research 两个词分别搭配使用的短语,在论文中通常表示前人的研究结果。此外,由于分析语篇的语步结构模式能够体现一定的修辞效果,文章借鉴 Swales(1990, 2004)的体裁分析方法,如在写文章引言部分经常被用到的 CREATE - A - RESEARCH - SPACE (CARS) 模式——语步 1:确定领域;语步 2:确立地位;语步 3:占据位置。其中,语步 2 主要体现论文“参考文献”部分的修辞功能,往往采用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on...等短语表达,展现当前文章在该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语料库分析方法,对学术英语写作的教学方面做了进

一步的应用研究和分析。纵观全文,文章从自下而上的词汇视角逐步转向自上而下的语篇视角的研究。

2. 词本论的概念

Sinclair (1999) 提出的“词本论”(lexical approach)认为:词汇的地位要高于语法,并且指出事实上语言是由语法化的词汇,而非词汇化的语法构成。这一理念使一些学者关注英语词汇频率表和这些单词的惯用语法形式,并促进了英语词汇教学大纲的生成(Willis, 1990, 2003)。Willis (1990: vi) 曾指出柯林斯(COBUILD)教材中,英语学习者的初级水平为要求掌握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700 词汇,这些词从语料库中收集,在英语文章中所占比例为 70%。需要注意的是,单个词汇的不同语义出现的频数不同,如 Sinclair & Renouf (1988) 提到 make 这一单词通常会出现在 make decisions、make discoveries、make arrangements 等短语中,而 make 这样的虚义用法要比它在 make a cake 类似的实义用法中被使用的频数要多,所以在教学中应该被引起重视(J. Flowerdew, 2009),但是文中同样指出,尽管有些频率较高的词汇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有些很多意义在英语初学者课程中并未涉及到。

虽然词汇教学大纲是基于词频设计出的,它仍然兼顾这些词经常出现的语法环境,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对语法教学的忽视,Sinclair (1991) 就利用语料库证明了词汇在不同的词汇—语法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词义。Willis (1990: 38) 同样给出了示例说明:Way 是英语词汇中第三个出现频数最多的一个单词,在英语教学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当 way 表示“方向”的含义时,经常会出现类似于 A man asked me the way to St Paul's'. 的句子中,但是“方法”“途径”是 way 意义中被使用较多的,并多用在以下语法环境中:

The best way to...is to...

One way of _____ ing...is to...

利用语料库可以发现词汇在不同语境下的多种词义,那么在 EAP 教学中,语料库同样能够帮助辨别不同学术体裁中词语运用的显著特点,那么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是否存在一系列普遍使用的核心词汇呢? 下一章节将讨论这个问题。

3. 词汇

在不同的学术文章、领域中是否存在一系列核心词汇的问题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Coxhead (2000, 2001) 在包含有 3 500 万词汇,覆盖艺术、贸易、法律和科学四个不同学术领域的语料库中,对词族和词汇条目做了统计分析,提取了四个学术领域共有的词汇项目,制作出了学术词汇表(Academic Word List, AWL),从而支持了核心词汇假说,Paquot (2010) 的研究也是对 Coxhead 研究成果的肯定。但是 Hyland & Tse (2007) 的研究则指出,不同学术领域有自己专有的词汇库,此外,还有一些如 Chen &

Ge (2007)的研究,他们基于语料库分析了专业学术英语语篇,将生成的专业学术英语词汇表与 Coxhead 的学术词汇表进行对照,发现专业学术英语词汇有特定的学科性质(Flowerdew,2012a)。因为不同的研究者选取的语料库不同,利用的分析软件工具也不一样,出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这一问题仍旧是该领域的争端之一(Flowerdew,2012c)。目前,针对譬如 in order to、on the basis of 这样的短语研究情况就很复杂,再如 Simpson - Vlach & Ellis (2010)制作出的学术词汇惯用表(AFL)和 Martinez & Schmitt (2012)起草的学术常用短语使用表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Coxhead 的学术词汇表研究,他们也指出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学术短语表达并不限于某个领域的使用,尽管这一发现与 5.1 章节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关于学术英语教学方面,Ward (2009)和 Mudraya (2006)以工程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强调词汇的非专业的本质属性。原因主要在于:Mudraya 发现有一系列词汇在文本中会高频率、大范围地出现。例如 solution,更令其感到吃惊的是:在 200 万字的工程教科书语料中,solution 的通用意义比它的专有意义使用得更加频繁。鉴于此,Mudraya 引导学生注意 solution 的两种不同的意义。教学任务的示范见表 1。

表 1 关键词为 solution 的索引目录(Mudraya,2006:246)

so What if the gas were not ideal? A	Solution	can still be found. Go back to
y the calculations required to obtain a	Solution	An average constant velocity
K - wall properties do not complicate the	Solution	a great deal and give a better
Is dried and a water - based caustic soda	Solution	Is added. Following a timed mix
he equation of state. A trial and error	Solution	Is the simplest way to proceed.
the last trial. So this is an adequate	Solution	Notice how quickly the solution
or realm in. 4. 1. A direct analytical	Solution	is possible when the substance
ture is unknown, an explicit analytical	Solution	is not possible. However, in the
to the desired answers. Attempting the	Solution	with "shortcut" method is not
tion is obtained by adding a particular	Solution	of the given equation to the
of copper. The electrolyte is an aqueous	Solution	of and. Nothing happens until
11 not spontaneously be reduced in acid	Solution	Is positive. At the cathode,

学生任务:研究索引信息,查询 solution 两种意义的示例:①通用意义;②化学专有意义。

这样的教学设计理念植根于 Sinclair (2004)的语言模型,即:语义是由与其搭配出现的语境决定的,而不存在于词本身。Mudraya 的教学指导看起来似乎只关注于单个词汇,但学生被要求找出关键词的不同意义时,就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横向和纵向地

观察索引条目,因此,Mudraya 的课堂有效展示了怎样对 Coxhead 学术词汇表词的研究延伸至对与其共现短语结构的研究。事实上,Coxhead(2008)也建议扩充学术词汇表,找出与它们经常共现、搭配的短语。下一节将介绍语言的构块性。

4. 从词汇到短语,再从短语到词汇

书面语的学术英语,很显然不仅仅涉及单个词汇项目,也有短语。词汇项目的意义主要通过其搭配行为体现,而它们出现的频数(类符)则是了解词义表达的窗口(Wible & Tsao,2011: 238)。这里词汇的搭配行为,即 Hunston & Francis(2000)提出的“型式语法”,在上节 Sinclair 的词汇法中也有体现。学界对“短语”有不同的定义手段,但最重要的是,它包括“搭配”和“类联接”两种形式,其中“搭配”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而“类联接”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它是词汇语法范畴间的相互关系,与其搭配共现的主要是语法词而非一些实词。目前,语料库的研究中强调了对短语“类联接”方面的探讨。例如,Byrd(2007)研究了学术词汇表(AWL)中的 require 一词,发现 required 是词目 require 最常见的使用形式,其后主要衔接以下三种补语型式。需要注意的是,相比另外两种补语型式,required + 不定式 infinitive 有明显较高的使用频数,这对学术英语教学大纲的编写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required + 不定式 infinitive (most characteristic pattern)

required + that 从句 ‘that’ clause

required + 名词短语 noun phrase complement

Oakey(2005: 178)也做了相似的研究,他从一系列经济学杂志中选取了 1360 篇学术文章,以 AWL 中的 evaluate 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 evaluate 在主动和被动语态句子中呈现不用的短语型式 (phraseological patterning)。一方面,三分之二比例的 evaluate 和不定式 to 型式出现在主动语态句子中,而且这个型式普遍和动词 use 的宾语不同的分析工具一起搭配使用,如 This paper uses laboratory methods to evaluate whether price - fixing conspiracies break down.... 另一方面,当 evaluate 和 use 共同使用在被动语态句子中时,则出现较多可以搭配使用的名词型式,如 model、objective、functions、ration、assumption、measures、test、approach 等等。下面是一个完整的例句:

Marshallian producer and consumer surplus measure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the given supply shift.

可以看出,以上两个对短语的研究都以单个词汇为出发点,我们同样可以从另外的语法型式出发,回到对词汇的研究中。正如 Hunston & Francis(2000: 31)所说的那样,Sinclair 的理论本身就包含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单个词汇,一个接着一个地去探寻它所出现的不同短语型式,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直接产出一系列经常共现的词汇序列列表。但是,语料库研究中要选取哪一种方法则具体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范围,就像笔者(2012a)曾说到的,在一个专用语料库中,较适合采用词汇关键

词的研究方法,原因之一在于 Sinclair(2005)指出,专业领域的词汇在词频表上的分布有着显著的不同,当然,有些研究不排除使用以短语型式为关键词的方法合适,尤其对于那些学术水平比较高,有自己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后者也许比较适合。

Lee & Swales(2006)在所带的博士研究生要求下,制作出了一个工作任务表,有以下几种经典的分析模式,集中体现了基于语料库进行教学时经常运用到的归纳、提出—验证假设方法的精神:

(1)猜想、排列词频表,尝试列举可能出现的词汇形式,然后在语料库中加以验证。

(2)检查一些给定的句子,改正有错误的地方。

(3)每一组句子中,哪一个表达方法更准确,为什么?

其中有一项工作任务是在学生要求下设计,加强 ADJ/N/V for V - ing(如: appropriate for modeling...; devices for storing...; suited for studying...)这一语法型式的使用。研究参与者被要求找出在学术英语写作中,哪一种语法型式最易和 for V - ing 搭配使用,并排列以上三种可能使用的顺序(答案是名词、形容词、动词),因此,通过让学生仔细观察语法型式以及频率统计表,较好展示了在学习中怎样通过语料库发现学术英语写作中常用的短语表达式。这样的研究任务是以语法型式为出发点,词汇为最终落脚点的有效例证。

在这里,笔者要暂时离题,谈一下在课程设计中经常遇到的频率统计表的使用问题,尽管它对教学实践有重要的作用,但要清楚这并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Widdowson(1991)对一项完全基于词汇频率表设计出的教学大纲提出了质疑,并在几年以后,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语言词汇和短语在实际语境中的应用情况如何,它们本身覆盖范围广、生成能力强的特点,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学习进程。在学习者某一个特殊的学习阶段,这些词汇和短语是教学过程中重要、核心、优选的原型结构。”

Granger(2011: 135)目前对该问题也作了一番讨论,他指出,语言使用频率在教学中的参考价值应当和其他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加以权衡:个体差异、可学性、可教性。其中,个体差异包括学习者的年龄、语言天赋、学习动机和学习类型等因素;可学性多涉及学习者的心理方面,如对信息的可记忆、处理、存储和提取程度;可教性是指教师对语言有选择性的教授情况,比如虽然某些词汇的隐喻意义使用较多,但选择它的基本意义作为教学内容则较合适。

在对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方面的研究中,有些不仅仅考虑了语言实际使用频率结果,而且结合了可学性和可教性因素。Jones & Schmitt(2010)就进行了这样的创新研究,他们将基于语料库得出的、关于专用学术英语词汇和短语研究成果运用到国际法和创业学的教学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重要的词划分为专业性,如 regional body; 口语性,如 gut feeling 和通用性的,如 take the initiative,这一成果既是语料库的统计

结果,也考虑到了研究报告者和学生的输入情况。另外的一些研究,像 Ellis、Simpson - Vlach & Maynard (2008)和 Simpson - Vlach & Ellis (2010),他们在研究当中,考虑了高频率的词汇、短语型式,心理语言凸显性及从教师的角度看,与教学相关的多方面因素,得出了一系列在教学中使用的惯用语,例如 in terms of、in order to。这里提到的惯用语,也指“词块”,是语料库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接下来一个章节将从功能的角度,介绍怎样界定和教授语言的词块、短语方面。

5. 从词块、短语到功能

5.1 词块

词块是从功能的角度被划分出的,是“短语”的一种常见类型。词块是由频率驱动方法自动产生的三到四个单词组成的连续序列。(Biber, Conrad, Cortes, 2004; Cortes, 2004; Hyland, 2008)。Biber(2006:134)指出,能作为词块的单词序列通常在学术文本中,每百万字至少会出现 40 次。例如,Hyland 将词块划分为以下三种功能范畴:研究型、语篇型和参与者型(Hyland, 2008:13 - 14):

研究型:帮助写作者建构现实世界的各项活动、经验,如:

步骤(the use of the、the operation of the)

定量(the magnitude of the、the surface of the)

语篇型:有助于语篇及意义组织的信息说明,如:

构建标记:组织话语延伸的文本标记(in the present study、in the next section)

框架标记:通过限制条件陈述说明(in the case of、with respect to the)

参与者型:关注文本的作者或读者,如:介入特征:直接指向读者(it should be noted that、it can be seen)

早期 Jones & Heywood(2004)和 Cortes(2006)在研究中曾提及词块教学,Eriksson (2012)作了进一步总结说明。Eriksson 在自己的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的语料库教学中,用了两个规模相近的小型语料库(约 10 万字)。一个语料库是由 25 篇生物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文章组成;另一个语料库则是由六个博士生的书面文本组成。他对用于教学中的“词块”选择首先是基于对这两个语料库中的词块比较而得。而那些在出版书中出现但未在博士生文本中出现的词块在教学中应用观察。值得注意的是, Eriksson 也参阅了 Hyland(2008)的词块表(从生物学和工程学文本中得出)以及 Simpson - Vlach 和 Ellis 的(2010)的学术惯用语列表(AFL)。Eriksson 指出,通过对比发现,如果仅用 Hyland 的词块表和 AFL,有一半以上的专用词块不能被发现,因此他强调词汇的专业性特点。与 Lee & Swales(2006)的研究有相同之处的是,Eriksson 利用可免费获得的软件 AntConc(Anthony 2010),同样采用了验证假设和归纳法。

修饰断言

1) 你如何表达或者暗示不确定性,并且/或者你如何避免在文本中使用过于强硬

的主张(例如,如果你知道你的结果没有定论)?

2) 从你的学科角度看,你认为下面哪些词块常用于文本中?

- it looks like
- may be due to
- appear(s) to be
- might be able to
- results suggest that
- at least in

3) 在软件 AntConc 中打开文本,搜索上述词块

奇怪的是,虽然有不少有关词块的研究,但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文献中关于词块的教学研究数量很少。正如 Byrd & Coxhead (2010) 所指出,这种教学应用少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词块使用的语境信息。他们研究了在相关文献提到的词汇列表中大多会出现的一个词块: *on the basis of*。通过他们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在 AWL 列表中出现的该词块有三种可能的使用方式:

(1) 置于句子开头,用来表明过渡和实施一个进程的方法,如:

On the basis of his analyses, Clyne also identifies a number of...

(2) 在被动句或从句中作原因状语,用来解释作出决定或处理数据的方式,如:
Meanwhile, unskilled and unassisted migrants, most notably from Southern Europe were accepted on the basis of nomination by relatives in Australia...

(3) 与状语从句一起加强或减弱话语力,如:

Only for L. notosaurus was the decision on its specific distinction made solely on the basis of allotropic data. (Byrd, Coxhead, 2010: 53 - 54)

5.2 短语

基于语料库驱动的方法研究学术文章的主要修辞功能通常以单个词汇为出发点,理应延伸到短语方面。早期遵循此原则是 Thurstun 和 Candlin (1998a, b) 的关于一般学术英语(EGAP)写作的研究。他们基于一定的语料,在每一个修辞功能(话题陈述、参考文献、研究综述)范围之内,按以下四步的活动索引产出一系列的突显词汇(如 *issue, claim, identify*)。这样就激励学生首先关注于词汇意义和型式。

步骤 1: 查看含有关键词及其周围词的索引行,思考它们的意义。

步骤 2: 根据索引,完成任务,熟悉关键词的语法型式。

步骤 3: 不对照索引,自行练习该语法型式。

步骤 4: 用该语法型式写一篇完整的文章,实现一定的论文修辞功能。
(Thurstun, Candlin, 1998b: 272)

步骤 1 要求学生检测索引出的关键词并反思它在上下文中如何使用。例如,词目 *issue* 常用来陈述写作主题,如: *The issue for consideration is the selective treatment*

of disabled new - born babies。步骤 2 要求详细地检测关于 issue 的索引信息,从词汇到语法型式。学生要对 issue 前的形容词进行分类,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关注搭配,而且需要注意语义关联(语义偏好),即 issue 常被限制性的语义集所修饰,如重要性或量化性词。

步骤 2:熟悉(关键词 issue)

(1)哪类形容词常用在 issue 之前?

组一(学科领域)economic issue

组二(类型/重要性)key issue

组三(数量)single issue

(2)哪些介词常跟在 issue 后面?(Thurstun & Candlin,1998a:1-3)

关于学术英语写作中以功能为导向的探究在 Charles (2007,2011) 和 Bloch (2008,2009,2010)的研究中有所体现。Bloch 的任务是基于学术写作中动词使用研究的语料库,目标是在校本科生。然而,不同于上文提到的 Thurstun 和 Candlin 建议的纸笔任务,Bloch 基于语料库的任务则是通过自己专门设计的人性化程序访问。该界面允许学生们选择对一个特定的单词或依概念进行搜索,单个单词搜索每个界面显示的索引条目限制为 20 个,而依概念搜索则是通过五个提示类别来引导学生们,如下关于“做出断言”的修辞目的:

思考你想做的断言,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Do you want an Integral or Non-integral example?

Do you want an Informative or a Descriptive example?

Do you want an examp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you are citing or yourself as the writer?

You can express an attitude towards the truth of a claim:

(1) Positive (2) Negative (3) Unclear

You can modify or hedge how strong that attitude is:

(1) Strong (2) Moderate (3) Weak

(Bloch,2008:199)

如果我们将 Bloch 关于“做出断言”的习题类型与 Eriksson(2012)从“词块”角度做“修饰断言”的类型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语料库能为各种活动提供借鉴。然而,如何使用语料库主要取决于学生的水平和语言能力。Eriksson 的博士生是高级学习者,他们参阅自己学科领域——生物化学的语料库,亲自动手的检索活动适合这类学生。与此同时,Bloch 为配合水平低一点的在校本科生采用多种方法,控制学术英语写作的原始数据语料库,如:限制索引输出至 20 条,最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修辞功能进行检索,这为学生们提供检索关键词是非常有用的。有些反对水平较低的学生使用语料库的研究者认为这类学生往往不知道要搜索哪些关键词,因此,控制此类教

学的条件,有效克服了这个障碍。

另一位与 Eriksson 相似的语料库研究者是 Charles(2007,2011),他关注的目标是自己开展语料活动的博士生。与 Bloch 和 Eriksson 一致的是,在搜集了有 50 万字的论文语料的条件下,Charles 的活动也是基于她的语料分析,从而强调语料库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Charles(2007:296)设计给出亲自动手的任务以让学生们熟练维护自己文章被批判的基本功能。首先,学生用上下文术语 appear */seem * may 来搜索位于句首的 while,在同一句子中,这个术语的单词跨度为八个单词。这项搜索表明,位于句首的 while 用来构建一个让步命题,它默认命题的重要性等级,强调作者的辩护。这两步模式,即臆想批判→辩护,通过显性让步、对比和论证来实现,如表 2 所示。

Charles 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她首先通过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接近这两部分功能(Durrant, Matthews-Aydinli, 2011),他们辩护用“功能为先”的方法分析惯用的语言(即措辞学)。给学生们一套笔纸的工作活动,以让他们感知这两个部分功能的扩展性话语。接着,她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补充这些活动,让学生们搜索语料库来识别典型词汇—语法型式实现这些功能。其他的语料库语言学家往往以词汇项目为出发点,审视语篇中整体语步结构模式的功能(详解见引言部分),这将是下一节谈论的重点。

表 2 臆想批判与作者辩护(Charles, 2007:294)

臆想批判	作者辩护
While I acknowledge that in some c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may seem rather arbitrary. 某些情况下关于机构与团体间的差异存在相当垄断性。	Such political actor subjects are not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is thesis. 此类政治性主题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6. 从功能到语步结构

针对语步结构型式的研究与教学应用大多以论文和法律文本为研究对象,如正式论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能够显现相对典型的语步结构模式,正如 CARS 模式(见第一章节)。其次,文本的可及性(Flowerdew, 2004)。例如,编译一个研究论文语料库比编译一个博士论文语料库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有一定的版权限制,是属于“半封闭”体裁(Swales, 2004)。J. Flowerdew & Forest(2009)研究了博士生的论文,他们将 Swales(1990:141)的 CARS(create - a - research - space)模式开始运用到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博士论文的引言部分,之后运用到文献综述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以 research 为关键词,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然后探究 research 的不同用法所对应的某一语步结构。例如,在“表明研究空白”这一语步模式时, research 有两种常见的

语法型式: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called for。

Kanoksilapathan(2005,2007)调查研究了 60 篇生物化学研究论文语料库中语步对应的词汇语法特征。Kanoksilapathan 首先区分了研究论文重要部分的主要语步。例如,以下是关于 results 在结论部分运用的四种主要语步类型:

语步 8:再次陈述研究方法问题

语步 9:论证研究方法问题

语步 10:呈现研究结果

语步 11:评论研究结果

因为语步又可分为步骤,所以“评论研究结果”语步就可分为以下 5 个步骤:

语步 11:评论研究结果

步骤 1:解释结果

步骤 2:概括结果

步骤 3:评估结果

步骤 4:陈述研究缺陷

步骤 5:总结

(Kanoksilapathan,2007:76-81)

然而,Kanoksilapathan 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显然不同于 J. Flowerdew 和 Forest,她采用多种方法,将语步结构与 Biber(1988)的多维度分析相结合,识别语篇的功能维度。例如 Kanoksilapathan 的“评估立场”对应于 Biber 的维度 4,即“明示表达论点”。Biber 提出的系统是依据语法项来划分维度的,如补语从句中“that”或外位语“it”结构。而 Kanoksilapathan 在即时文本语境中审视这些词汇特征,从而揭示了作者通过词汇表达评价或态度,如“*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experiments in this paper were all carried out using assays for genetic interference in ...*”。总之,Kanoksilapathan 的研究采用从自上而下再到自下而上的方法,其中词汇确实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里的词汇更接近于 Halliday 的“词汇”观点,认为词汇是最精细的语法。

关于基于语料库的教学应用,Bianchi 和 Pazzaglia(2007)提出了一套活动帮助学生用英文写心理学研究性论文。首先,要求学生把自己选择的书面文章分成“语步”;然后,用作者设计的功能和元交际编码系统对它们进行注释;最后,检测与研究相关的关键词索引,如 study/studies、experiment/experiments、literature and research/researches。同时,学生们还审查了这些关键字的词汇语法环境,并指出其中的动词及其时态用法,如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se; in this research we analysed* 由此可以看出,该语料库的应用反映了上述 J. Flowerdew 和 Forest 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以关注关键词为出发点。

另一项教学应用研究是由 Chang 和 Kuo(2011)开展的,他们基于 60 篇计算机科

学研究论文的语料库,专门设计 EAP 课程,帮助研究生撰写研究论文。事实上,如 Bloch 在上节所述,他们提出的课程依赖于一个专门构建的网站,使用 Moodle,在网上呈现教学材料。在线 EAP 平台围绕研究文章的主要部分(即引言、语料和方法,研究发现和讨论、结论和摘要)来组织,这个平台由信息结构单元和语言使用单元组成。该网站的信息结构单元基于作者之前的体裁分析,呈现了修辞语步与常用语步模式。而该网站的语言使用单元支持像字典等在线写作工具,同时提供词语搭配工具与检索工具的链接。

上述 Bianchi & Pazzaglia(2007)、Chang & Kuo(2011)的教学应用都采用了研究论文语料库帮助研究生写研究性论文,此类语料库也被用来帮助博士生写论文(Thompson & Tribble, 2001; Charles, 2011)。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两类相关论文的修辞结构存在一些差异。正确地使用研究论文对论文写作教学也是有用的。关于论文讨论部分的写作,笔者采用了可免费获取的香港理工大学语料库(CRA)(Lin & Evans,2012),该语料库涵盖 39 个学科,收录了约 500 万字。值得注意的是,CRA 使用了会考虑位置和选区变化的搜索引擎 ConcGram。

表 3 法律案例中动词所表达的语步类型(Bhatia et al., 2004:214)

语步类型	词语及其频率			
	submit 递交	dismiss 撤消	reject 驳回	grant 授予/同意
案史	75	47	12	82
辩护	263	6	9	51
判决理由	5	16	44	80
宣读判决书	3	42	9	16
总计	346	111	74	229

举一个例子,笔者设计了以下验证假设的任务,以让学生们熟悉词汇短语的评价结果。从词条“surprising”开始,笔者要求学生写出包含此单词的句子,下面就是学生所写的一个例句:“It is surprising (to find)that...”然而,语料库数据显示,这个单词的首选模式带有负极性,如:This phenomenon is not surprising as such、as they also appear in polymer solution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as the CANE model...,从而呼应了 Halliday(1991)对不同动词极性分布不均语料的论证,尽管本例所涉及的是形容词。另外,“surprising”索引行揭示了此词条的表达式“given that”的共现索引。这些实证数据表明,语言有一定的短语组块倾向,它取决于所研究的文本体裁。

同时,如表 3 所示,Bhatia、Langton & Lung(2004)研究表明,在具有高度规约性的法律案件文本中,在语步结构的层面上,动词的选择是如何实现的。可以看到,看似同义动词如 dismiss 和 reject 对不同的语步结构有着明显的偏好,如 Bhatia et al.

(2004)所言,向法律专家们咨询这类动词的语用差异是必要的,而语料库(通常)无法提供此类信息。

法学院的 Problem – Question 写作体裁与法律案件高度相关,它是法律专业学生适应专业实践的一种方式。Problem – Question 写作体裁中,法律专业的学生需查明一系列问题及相关法律,建立并展开论证,就可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证明演绎推理,而分析法律案件也需要这些技能。正如 Bhatia et al. (2004)所指,演绎推理在这类体裁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掌握各种避险技巧,这对事实应用部分尤为重要。为让法律专业的学生认识到这点,Bhatia et al. 建议让他们依据语步结构使用基于法律案例索引产生的工作表,通过功能、形式与语法来辨别并区分选词。

received Brian's letter	assuming	The offer does remain open, Brian's Thursda
proceeding on the latter	assumption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law related to
to discuss, I now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B's message, left on the answerphone
third party. Bata V. Bata	considering	First the story about the BCDs, can the ba
with	Regard to	contracts ex facie illegal it is necessary to
second part of the story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claim of Evangeline, it is submit
consented to it. The key	Issue	here is what caused the injury; was it Geoffrey's
at	Issue	here is whether Neil will have a cause of action

表4 开场语步中充当标记词(Weber, 2001: 17)

正式论文是另一种常见的合格体裁(Weber, 2001),如前面所述,最初采用 Charles, Bianchi & Pazzaglia 的修辞活动,首先引导 Weber 的学生们全文阅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考试本族语学生所写论文,并区分出一些典型的修辞特征,如:区分或界定参与此案的法律原则。接着,要求这些学生识别出所有与这些特征相关联的词汇表达,之后学生们再参照法律论文语料库来验证他们之前所标注的型式。换言之,就是验证他们的假设,并找出词汇语法表达的规律。研究发现,各种结构中的词项诸如 assume、consider、regard 和 issue 在开场的语步中充当标记词,用于引入当前案件,之后再界定,如表4所示。

以上所有研究通过将语料库分析与文体语步结构分析相结合,表明语料库不再只是句子层面的词汇语法模式所参照使用(Flowerdew, 2005),而且能够充分被用来研究语篇(Handford, 2010; Flowerdew, 2012b)。

7. 结语

本篇论文综述了当前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写作研究,包括词汇、词组、修辞功能和 Swales 的语步结构体裁分析,并讨论了这些研究是如何影响教学。研究发现,语

料库研究与教学之间有紧密联系,两者相互作用,如在文章开篇时,笔者就强调词汇在语料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词汇常作为语料库研究的切入点,但这也并非总是如此。同时,笔者也讨论了很多研究都会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方法相结合来对语料进行分析。尽管本篇论文概述的大多数关于 EAP 的语料库研究都是小型研究项目,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目前涵盖不同体裁、学科以及不同水平学生写作的项目已经完成。我们可以看到 MICUSP(密歇根高年级学生论文语料库)(Römer & Brook O'Donnell,2011)以及 BAWE(英国学术英语书面语语料库)(Nesi 2011, Nesi & Gardner,2012)。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大型项目则是 Cotos 等(2012)收录了 900 篇研究论文的语料库,它涵盖了 30 个学科,主要研究跨学科问题。毫无疑问,这些语料库的研究发现将为 EAP 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提供深刻见解,并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 ① Flowerdew, L. Corpus-Based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EAP: From Lexis to Genre[J]. *Language Teaching*, 2015,48(1):99 - 166.

参考文献:

- [1] Anthony, L. *Antconc* 3.2.1W[EB/OL]. WWW. Antlab. Sci. Waseda. Ac. Jp/Software. Html, 2010.
- [2] Bhatia, V. K., N. Langton & J. Lung. Legal Discours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for Corpus Linguistics [C]// Connor, U. & T. Upton. *Discourse in the Professions: Perspectives From Corpus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203 - 231.
- [3] Bianchi, F. & R. Pazzaglia. *Student Writing of Research Articles in A Foreign Language: Metacognition and Corpora*[M]. Amsterdam: Rodopi, 2007: 259 - 287.
- [4] Biber, D.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 Biber, D. *University Language: A Corpus - Based Study of Spoken and Written Register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 [6] Biber, D., S. Conrad & V. Cortes. *If You Look At...: Lexical Bundle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Textbooks*[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4,25(3): 371 - 405.
- [7]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S. Conrad & E. Finegan. *The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99.
- [8] Bloch, J. *Technologi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omposition Class*[M].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8.
- [9] Bloch, J. The Design of An Online Concordancing Program for Teaching About Reporting Verbs[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009,13(1): 59 - 78.
- [10] Bloch, J. A Concordance - Based Study of the Use of Reporting Verbs As Rhetorical Devices in Academic Papers[J].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2010,2(2): 219 - 244.
- [11] Byrd, P. Collocations and Recurrent Phrases in the Academic Word List[R]. Paper Presented At 41st Annual TESOL Convention, Seattle, Washington, 2007.
- [12] Byrd, P. & A. Coxhead. 'On the Other Hand': Lexical Bundles in Academic Writing and in the Teaching of EAP[R]. University of Sydney Papers in TESOL, 2010(5): 31 - 64.
- [13] Chang, C. - F. & C. - H. Kuo. A Corpus - Based Approach to Online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1(30): 222 - 234.
- [14] Charles, M. Reconciling Top - Down and Bottom - Up Approaches to Graduate Writing: Using A Corpus to Teach Rhetorical Functions[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6(4):

- 289 - 302.
- [15] Charles, M., A. Frankenberg, Garcia, L. Flowerdew & G. Aston. Using Hands – On Concordancing to Teach Rhetorical Functions; Evalu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EAP Writing Classes [C]// Frankenberg – Garcia, A., L. Flowerdew & G. Aston. *New Trends in Corpora and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Continuum, 2011; 26 – 43.
- [16] Chen, Q. & C. Ge. A Corpus – Based Lexical Study On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Coxhead’s AWL Word Families in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7, 26(4): 502 – 514.
- [17] Cheng, W., C. Greaves & M. Warren. From N – Gram to Skipgram to Concgr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6,11(4):411 – 433.
- [18] Connor, U. & T. Upton. *Discourse in the Professions; Perspectives From Corpus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 [19] 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4(23):397 – 423.
- [20] Cortes, V. Teaching Lexical Bundles in the Disciplines: An Example From A Writing Intensive History Class[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006(17): 391 – 406.
- [21] Cotos, E., S. Huffman, S. Link, T. Paben & A. Saricaoglu. *Cross-Disciplinary Move Schema for Research Article Methods Sections*[R]. Paper Presented At AAAL Conference, Boston, MA, 2012.
- [22] Coxhead, A. A New Academic Wordlist[J]. *TESOL Quarterly*, 2000,34(2):213 – 238.
- [23] Coxhead, A. Phraseology and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C]// F. Meunier& S. Granger. *Phrase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149 – 161.
- [24] Coxhead, A. The Academic Word List 10 Years 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mplications[J]. *TESOL Quarterly*, 2011,45(2):355 – 362.
- [25] Coxhead, A. & P. Nation. The Specialised Vocabulary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C]//J. Flowerdew & M. Peacock.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252 – 267.
- [26] Durrant, P. & J. Matthews – Aydinli. A Function – First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Formulaic Language in Academic Writing[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1,30(1)58 – 72.
- [27] Ellis, N., R. Simpson – Vlach & C. Maynard. Formulaic Language in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Psycho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ESOL[J]. *TESOL Quarterly*, 2008, 42(3): 375 – 396.
- [28] Eriksson, A.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On Bundles; Teaching Bundles to Doctoral Students of Biochemistry[C]// J. Flowerdew & M. Peacock. *Input, Proces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s in 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 Brno, Czech Rep. Masaryk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5 – 211.
- [29] Flowerdew, J. Corpora in Language Teaching [C]// M. Long & C. Doughty.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Wiley – Blackwell, 2009;327 – 350.
- [30] Flowerdew, J. & R. Forest. Schematic Structure and Lexico – Grammatical Realization in Corpusbase Genre Analysis[C]// M. Charles, D. Pecorari & S. Hunston. *Academic Writ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orpus and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 2009;15 – 36.
- [31] Flowerdew, L. The Argument for Using Specialised Corpora to Understan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anguage [C].// U. Connor & T. Upton. *Discourse in the Professions; Perspectives From Corpus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11 – 33.
- [32] Flowerdew, L. An Integration of Corpus – Based and Genre – Based Approaches to Text Analysis in EAP/ESP; Countering Criticisms Against Corpus – Based Methodologi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5(24):321 – 332.
- [33] Flowerdew, L. Using Corpora for Writing Instruction [C]. // A. O’ Keeffe & M. McCarth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0;444 – 457.

- [34] Flowerdew, L. *Corpora and Language Educatio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a// Flowerdew, L. Corpus – 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2012b// J. P. Gee & M. Handfor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2;174 – 187.
- [35] Flowerdew, L.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C]// C. Chapelle.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UK: Wiley – Blackwell, 2012c.
- [36] Frankenberg – Garcia, A., L. Flowerdew & G. Aston. *New Trends in Corpora and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Continuum, 2011.
- [37] Granger, S. From Phraseology to Pedagog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C]//T. Herbst, S. Faulhaber & P. Uhrig. *The Phrase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A Tribute to John Sinclair*.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1: 123 – 146.
- [38] Greaves, C. Conegram 1.0: A Phraseological Search Engin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 [39] Halliday, M. A. K. Corpus Studies and Probabilistic Grammars[C]// K. Aijmer & B. Altenberg. *Advances in Corpus Linguistics*. Amsterdam: Rodopi, 1991; 30 – 43.
- [40] Halliday, M. A. K. The Spoken Language Corpus: A Foundation for Grammatical Theory[C]//K. Aijmer & B. Altenberg. *Advances in Corpus Linguistics*. Amsterdam: Rodopi, 2004; 11 – 38.
- [41] Handford, M. What Can A Corpus Tell Us About Specialist Genres? [C]//A. O’ Keeffe & M. McCarth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0; 255 – 269.
- [42] Hunston, S. & G. Francis. *Pattern Gramma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8, 27(1): 4 – 21.
- [43] Hyland, K. & P. Tse. Is There An ‘Academic Vocabulary’? [J]. *TESOL Quarterly*, 2007(41): 235 – 253.
- [44] Jones, M. & S. Haywood. Facilitating the Acquisition of Formulaic Sequenc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An EAP Context[C]// N. Schmitt. *Formulaic Sequenc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269 – 292.
- [45] Jones, M. & N. Schmitt.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Discipline – Specific Vocabulary and Phrases in Academic Seminars [C]// N. Harwoo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5 – 250.
- [46] Kanoksilapathan, B.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Biochemistry Research Articl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5,24(3):269 – 292.
- [47] Kanoksilapathan, B. Rhetorical Moves in Biochemistry Research Articles [C]// D. Biber, U. Connor & T. Upton. *Discourse On the Mo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73 – 119.
- [48] Lee, D. & J. Swales. A Corpus – Based EAP Course for NNS Doctoral Students; Moving From Available Specialised Corpora to Self – Compiled Corpora[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6 (25): 56 – 75.
- [49] Lin, L. & S. Evans (2012). Structural Patterns in Empirical Research Articles[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2(31): 150 – 160.
- [50] Martinez, R. & N. Schmitt. A Phrasal Expression List[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2, 33(3): 299 – 320.
- [51] Meunier, F., S. De Cock, G. Gilquin & M. Paquot. *A Taste for Corpora*[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52] Meunier, F. & S. Granger. *Phrase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 [53] Mudraya, O. Engineering English: A Lexical Frequency Instructional Model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6, 25(2): 235 – 256.
- [54] Nation, I. S. P.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5] Nesi, H., A. Frankenberg – Garcia, L. Flowerdew & G. Aston. *BAWE: An Introduction to A New Resour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3 – 228.

- [56] Nesi, H. & S. Gardner. *Genr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Student Wri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7] Oakey, D. Academic Vocabulary in Academic Discourse; The Phraseological Behaviour of EVALUATION in Economics Research Articles [C]//E. Tognini Bonelli & G. Del Lungo Camiciotti. *Strategies in Academic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169 - 183.
- [58] Paquot, M. *Academic Vocabulary in Learner Writing* [M]. London: Continuum, 2010.
- [59] Römer, U. & M. Brook O' Donnell. From Student Hard Drive to Web Corpus (Part 1): The Design, Compilation and Genr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chigan Corpus of Upper Student Papers (MICUSP) [J]. *Corpora*, 2011, 6(2): 159 - 177.
- [60] Simpson - Vlach, R. & N. Ellis. An Academic Formulas List; New Methods in Phraseological Research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 31(4): 487 - 512.
- [61] Sinclair, J. Mch. & A. Renouf. A Lexical Syllabus for Language Learning [C]// R. Carter & M. McCarthy.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1988; 140 - 160.
- [62] Sinclair, J. Mch.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3] Sinclair, J. Mch. New Evidence, New Priorities, New Attitudes [C]// J. Sinclair. *How to Use Corpora in Language Teac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271 - 299.
- [64] Sinclair, J. Mch. The Lexical Item [C]// E. Weigand. *Contrastive Lexical Seman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1 - 24.
- [65] Sinclair, J. Mch. Corpus and Text: Basic Principles [C]// M. Wynne. *Developing Linguistic Corpora: A Guide to Good Practice*. Oxford Text Archive. Http://Ahds. Ac. Uk/Linguistic - Corpora/, 2005; 1 - 21.
- [66] Stubbs, M. Language Corpora [C]// A. Davies & C. Elder. *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106 - 132.
- [67] Swales, J. *Genre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8] Swales, J. *Research Genr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9] Thompson, P. & C. Tribble. Looking At Citations; Using Corpora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001, 5(3): 91 - 105.
- [70] Thurstun, J. & C. Candlin. Concordancing and the Teaching of Vocabulary of Academic English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8b, 17(3): 267 - 280.
- [71] Thurstun, J. & C. Candlin. *Exploring Academic English* [M]. Macquarie University; NCELTR, 1998a.
- [72] Ward, J. A Basic Engineering Word List for Less Proficient Foundation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9(28): 170 - 182.
- [73] Weber, J. - J. A Concordance - and Genre-Informed Approach to ESP Essay Writing [J]. *ELT Journal*, 2001, 55(1): 14 - 20.
- [74] Wible, D., N. L. Tsao,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Corpus-Derived Lexical Resourc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C].//F. Meunier Et Al. *Phrase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237 - 255.
- [75] Widdowson, H. G. *Defining Issu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76] Widdowson, H. G. The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of Language [C]. // J. E. Alatis.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edagogy: The State of the Ar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 24.
- [77] Willis, D. *Rules, Patterns and Words: Grammar and Lexi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责任编辑:朱晓云

美国高校英语写作课堂教学观察与启示

——以美国波士顿大学为例

高 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培养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成为高校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高校英语写作教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笔者对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写作系列课程为期一年的课堂教学观摩和教师教学研讨,介绍该校英语写作教学的指导原则、教学内容、课堂模式和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并总结出一些启示,希望对国内高校英语写作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英语写作;读写结合;合作写作;过程教学;电子档案袋;学术规范

Observation of English Writing Clas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llege ESL Writing in China: Taking Bosto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GAO Jun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ing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skill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goal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in China. Based on the English writing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faculty seminar at Boston University in the U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teaching focus, classroom format and evaluation of its writing courses and explores how they help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skill. It may hopefully be of some reference value to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English writing;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ollaborative writing; process-based teaching; e-portfolio; academic norms

1. 引言

写作在美国高校的教学评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多数课程的评估都

作者简介:高 军,女,上海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汉对比与翻译、英语教学研究。

采用了撰写学期论文和报告的形式,因而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面向本科生和国际学生的英语写作课程,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也十分成熟。

反观国内高校英语写作教学,“写作的重要性是最被低估了的,写作课是效果最不理想的课程,‘写’是学生英语技能中最薄弱的环节。”(黄源深,2006)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其莘教授在2012年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英语演讲与写作教学研讨会”也指出:“虽然我国高校在英语写作教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不乏众多成功的例子,但是通过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评估发现,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中,写作能力是最欠缺的。”张绍杰教授(2012:1)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今以互联网作为重要媒介的信息时代,新生代的英语学习者普遍发生了读写危机。”可见,提高高校英语写作教学水平和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已迫在眉睫。

笔者利用2013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的机会,通过与该校写作项目中心主任和授课教师的交流研讨以及对大学一、二年级英语写作系列课程一个学年的课堂教学观摩,对美国高校的英语写作教学有了直观的了解和思考。本文将对该校的英语写作教学,尤其是针对国际学生的ESL英语写作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包括指导原则、目标定位、教学内容、课堂模式和评价标准等进行重点介绍和分析,希望对国内高校的英语写作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 波士顿大学英语写作课程介绍

波士顿大学非常重视英语写作教学,2001年专门成立了写作项目中心。中心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各一名,共有专兼职教师130多位,负责每学期3000名左右学生的英语写作系列课程教学任务。学校规定,每位一年级新生都要修读英语写作系列课程。写作系列课程分为四个级别,按照课程编号从低到高依次是:WR097、WR098、WR100和WR150(WR代表writing),每门课程四个学分,四门共计16个学分。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以下简称ESL学生)入学时需参加由写作项目中心统一组织的英语写作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被编入到不同级别的英语写作课程班级学习,每个班级学生不超过15名。ESL学生因为英语是非母语的原因,一般只能考入WR097或WR098的班级。学校规定每位学生都必须由分级考试后被编入的写作课程班级的基础上依次修读高一级别的写作课程,直至在二年级结束前修读完WR150。

WR097和WR098的授课对象是ESL学生,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ESL写作课程;WR100和WR150以研讨形式授课,称为写作研讨课程。我们将依次介绍ESL写作课程和写作研讨课程的指导原则、教学要求和知识要点等;然后,从教学重点、教学方式、教学评估、学术诚信教育等几方面总结带给我们的启示。波士顿大学的ESL写作课程和国内高校的英语写作课程的授课对象都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大学生,写作研讨课程又是以讨论式教学和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为导向,因此对我国高校的英语写作教学和学术英语写作教学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2.1 ESL写作课程

ESL写作课程,即WR097和WR098,旨在帮助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际学生达

到和本族语学生水平相当的批判性阅读复杂文本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参加讨论和互动、使用正确的语法表达观点、完成与专业相关的学术写作任务;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修辞意识,指导学生使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进行课堂互动。为实现上述目标并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则,WR097 和 WR098 的课程要求和核心技能及知识点各有侧重。

WR097 定位为初级写作课程,教师在授课中着重指导学生使用正确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进行学术写作,以指定的阅读资料为学术范本,帮助学生了解学术论文的写作流程和结构,主要技能和知识点包括:

- a. 运用有效的阅读策略阅读大学水平的文本,掌握学术论文方面的新词汇;
- b. 学会在简短的作文中建立逻辑分析式推理;
- c. 识别并实践各种写作风格和格式;
- d. 能够流利地进行课堂交流;
- e. 使用一定的句式结构表达自己的观点;
- f. 了解美国学术课堂的文化;
- g. 获得基本语法和元语言的知识;
- h. 学会运用元认知思维模式并对论文进行自我修改。

WR098 以阅读为基础,教师的授课重点是批评性文本分析、说明文和议论文的逻辑性、受众和语气;语言的准确性和文章结构。主要技能和知识点包括:

- a. 阅读不同主题的学术文章,正确理解文本涵义,培养文本识别能力;
- b. 掌握说明文和议论文的写作规范;
- c. 发现并阐释问题,结合背景知识做出书面和口头的回答;
- d. 学会评论学术文章,识别和评论文章的主题和修辞结构;
- e. 使用恰当的词汇,写出语法正确的文章;
- f. 撰写结构合理的论文,注意文章的主题和论据;
- g. 使用准确、流利、适合大学语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 h. 使用恰当的结构、清晰、连贯和特定文体特征的书面英语计划、写作和修改学术文章;
- i. 了解美国学术写作惯例;
- j. 学会使用有效的方法发现并修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由此可以看出:ESL 写作课程教学重点围绕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的流利性和准确性,以指定阅读资料为学术范本帮助学生了解学术论文的写作流程和结构,学习如何在学术写作中运用正确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为后续的写作研讨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奠定语言基础。

2.2 写作研讨课程

写作研讨课程,即 WR100 和 WR150,旨在为学生大学阶段的学术阅读和写作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授课教师以主题研讨形式组织教学,主题涉及文学、历史、文化、科学等,包括大波士顿地区的环境污染等热点话题以及东方英雄文化(武侠)等有趣话题。学生可在课堂上讨论发表观点,并通过系列写作任务发展下述各方面能力:

- a. 进行充分、有力、合理的学术争论;
- b. 写出清楚、正确而连贯的文章;
- c. 充分理解阅读材料并积极思考;
- d. 有效率并有效力地计划、拟稿和修改;
- e. 评估并提高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方法;
- f. 对他人的作品提出建设性意见;
- g. 口头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与他人进行交谈。

WR 150 在继续帮助学生提高上述能力的同时还指导学生研究文章风格,学习如何进行大学水平的研究。

由此可见,写作研讨课程重点提高学生的学术文献阅读、写作和交流能力。教学要求也相对较高,每门课程学生需完成至少三篇论文。此外,WR100 要求学生提交一篇 15-20 页的论文终稿,WR150 要求提交一篇 20-25 页的论文终稿。

3. 观察与启示

3.1 强调读写结合,培养合作写作能力

优秀的写作建立在良好的阅读之上。我国知名的英语教育家黄源深教授一直告诫学生要多读,多写:“我认为要真正学好外语,就要大量地读,大量地写,大量地听,大量地讲。而前两者尤为重要。”(黄源深,2002)董亚芬也强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读写对于外语学习者的重要性,教学中应以‘读写为本’。”(董亚芬,2005:29)波士顿大学的写作系列课程也是优秀的阅读课程,尤其强调读写结合。教师一开始就提醒学生,撰写优秀的大学水平论文,就须首先理解并总结所阅读的材料,学会用自己有理有据的观点对阅读中碰到的观点做出回应。理解促进思考,思考以理解为基础。

写作系列课程教学过程中所有的写作练习和写作作业都基于要求学生阅读指定教材和期刊的基础上,或总结阅读材料的主旨并做出释义性的评论,或围绕所读文章的某一论点撰写论文;或比较分析两个作品;或分析一系列作品中的某一个主题等等。与国内通常情况下的一门课一本教材不同,写作系列课程基本上都是一本以上的教材。例如,两门 ESL 写作课程各有四本指定教材,其中一本写作规范手册贯穿两门 ESL 写作课程使用。WR097 的教材是语法、小说、写作短文集各一本;WR098 的教材是小说、学术写作和以写作修辞为导向的阅读教材各一本。不仅如此,学生每周都需阅读指定的期刊文章并归纳总结文章内容,课上就文章内容回答问题。

两门写作研讨课程虽然只有一本指定的大学论文写作指导教材,因为是主题式研讨,学生必须就某一主题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才能积极参与小组和班级课堂讨论并合作完成相关写作任务。近年来,合作写作(collaborative writing tasks),即学习者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整个写作过程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合作写作教学活动,可以促使学生反思自己的语言使用情况,同时合作解决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有助于提高语言水平。(Swain,2001)以作者观摩的 WR100 主题研讨为例,其中一个主题覆盖五次课 10 个学时,要求学生围绕波士顿大学投入使用的“国家新兴传染病研究实验室”的安全性及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完成相关写作任务(注:2013 年该实验室的获准建立引起了美国社会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家卫生院和联邦法院为此进行了鉴定和裁决。)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专门对实验室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参观,然后,学生以 3-4 人一个小组为单位在课后搜集阅读相关资料,包括但不局限于学术论文、政府报告、新闻报道、网上资源,还需要检索观看相关视频资料、进行现场采访等。小组成员经过热烈讨论后还需在课上展示本组的观点,通过师生互动互评进一步修改完善。最后每组学生还要在学校的校园网上自建一个该主题的博客,包括前言、课题背景、观点、论据、结论、思考和引用文献等栏目,不但用文字表述,还配以图片、采访录音、录像视频等多媒体辅助说明。最后,教师和学生课上进行交流点评,并就各小组的博客内容互评打分。学生如果不进行广泛深入的阅读思考根本无法完成信息量如此丰富的博客。

通过教学观摩我们发现:写作教师从要求学生阅读原始文献和二手文献着手,提高学生阅读长篇议论性文章的能力;通过主题式研讨和写作,帮助学生学会总结他人的论点,分析他人的长处和独到的见解,并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锻炼了学术论证和学术写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学术界知识交流的基础。

3.2 鼓励课堂讨论 锻炼公共演讲能力

互动交流中聆听他人的观点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样重要。写作系列课堂上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参与课堂讨论和演示自己的项目,教师也鼓励学生随时提出疑问和发表见解,同时教授学生演示和演讲的重要技能。

我们注意到:部分 ESL 学生由于受课堂文化、语言能力和心理状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 WR097 课堂初期倾向于被动听课,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高,展示和演讲的能力也较弱。然而,随着教师的不断鼓励和指导以及课堂上的反复操练,学生的进步非常快,逐步适应了美国的课堂文化。大部分 ESL 学生经过两门 ESL 写作课的学习,在写作研讨课上能够积极地互动交流和自如地发表课堂演讲。

以 WR097 的一次课堂口语报告为例:两名学生以课前指定的阅读材料为主,根据老师下发的讲义模板设计课堂讲义,进行口头报告,包括词汇、句法特点、修辞技巧和论点等内容,引导整个课堂对文章主题进行分析讨论。随后,老师给出反馈,也和全班同学一起对两名同学演讲中存在的问题和优点进行点评。教师偶尔会在学生口头演讲后布置课堂写作练习,要求学生就课堂讨论的某一主题撰写一篇小作文。

通过经常性的课堂口头演讲练习,学生不仅学会了在演讲的过程中关注听众的

反馈,注意自己的报告目的和传递信息的方式,运用正确的语言结构和标准的语言习惯,而且还提高了口语的流利度和自信心,熟悉了口语陈述的流程并将此项技能运用到学术英语交流中。

3.3 运用过程教学,侧重形成性评估

学生的每一次小论文和大论文写作都是基于教师指定的主题或阅读材料,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讨论、初稿、互评、修改、二稿和终稿等几个阶段。以 WR098 的一次大论文为例:教师要求学生从指定的阅读教材中选择两篇文章,从中找出共同的主题,然后进行分析论述,写成一篇 4-5 页的论文(页面格式、字体大小、段落间距等都有统一的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安排小组讨论,小组成员互评讨论各自的主题,教师也会参与到各小组的讨论,适时给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其中一位学生决定撰写的主题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几个角度、用哪些材料进行佐证比较合理。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师点评后,该同学的思路就清晰了。课后每位学生根据教师和同伴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并完成初稿带到下一次课堂供同伴互评。第二次修改和二稿步骤与前面类似,最后完成终稿。之后学生把此次大论文的电子档案袋上传到课程主页,包括此次大论文的要求介绍、初稿、一稿、二稿、终稿、同伴反馈、修改计划、反思性回顾等具体内容,教师以此为依据对大论文进行评价。

就学期成绩测评而言,写作系列课程无一例外地重视形成性评估,没有期末考试。以 WR098 为例,学生的总评成绩由以下几个部分和比例构成:第一篇论文(含同伴反馈、初稿、终稿)10%、第二篇论文(含同伴反馈、初稿、终稿)15%、第三篇论文(修改工作坊、初稿、终稿)15%、电子档案袋 10%、三次课堂小测验 15%、作业和课堂写作 15%、口头报告 10% 和课堂表现 10%。写作研讨课 WR100 则重点考察评价学生在各个主题项目研讨中的表现和写作情况,其中课堂练习 5%、档案袋 10%、项目一(论文)15%、项目二(PPT 演示)30% 和项目三(博客)40%。

形成性评估要求学生自始至终都要要积极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每一次口头报告和每一次论文写作,从而避免学生期末临时突击抱佛脚。

3.4 课内外互动 助教提供一对一辅导

每一门写作系列课程都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两次一对一的师生讨论会,一次在开学初,交流讨论学生开学初的测试情况,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规划,给出具体建议;另一次在学期中间,讨论大论文的主要结构。此外,教师每周都有两次固定的办公室答疑时间,学生可以在答疑时间段内请老师答疑解惑,也可以和老师另外预约答疑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写作项目中心还有 30 多位经过专门系统培训的 ESL 助教(包括中心专任教师、ESL 专家或学校在读研究生)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更多的支架式教学指导。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直接预约或任课教师推荐的方式获得每周至多一次的助教一对一指导。助教将帮助学生完善论文的整体框架,针对学生较容易出错的部分进行指导或者根据任课教师的需求提供相应帮助,但是不会直接修改学生的论文。

此外,写作项目中心每年定期出版写作电子杂志和举办写作大赛。杂志编委由项目中心教师担任,学生可以把写作系列课程中完成的自认为比较不错的论文投稿

给电子杂志,经编委评审后择优录用。写作大赛评委从投稿的论文中评选出4篇获奖论文,每年7月颁奖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3.5 重视学术规范,培养学术诚信意识

“相比较美国而言,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还未引起我国高校的足够重视。”(李文凯,2003)我们发现: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波士顿大学的整个写作系列课程。学生在第一堂课就被告知学术行为准则和学校对抄袭等违反学术诚信行为的处理措施及相关网址。这些具体要求在发给学生的课程大纲里也有明确的表述。

此外,写作规范手册是两门ESL写作课程的指定教材之一。教师课堂上结合指定阅读材料中的具体例子说明何为释义、抄袭、引用并讲解APA格式、引文规范等内容。例如一位教师从指定阅读材料中抽取10句话,每句话下面给出4-5句句子,打印好发给学生。教师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分析判断这4-5句句子是否是释义,抄袭或者引用。也有教师上课过程中从教材中随机抽取一个段落,要求同学们对这个段落进行引用或者释义;同时也请同学们说出一段自认为是抄袭该段落的话,帮助学生判断抄袭和引用的区别,教师不断地向学生提供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的指导。

4. 结论

总体而言,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英语写作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安排等比较合理完善,学生的期中 and 期末教学反馈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过两年的写作系列课程学习,学生的写作水平进步显著,尤其是学术思辨和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学生电子档案袋的前后对比,以及写作电子杂志登载的论文就是很好的证明。如何结合我国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国内高校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值得广大英语写作教师的深入探讨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Swain, M. & Lapkin, S. Focus on Form Through Collaborative Dialogue: Exploring Task Effects [M]// M. Bygate, P. Skehan & M. Swain. *Researching Pedagogic Task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New York: Longman, 2001.
- [2] 董亚芬. 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 [M]// 束定芳. 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3] 黄源深. 好的作文是“写”出来的——英语教学谈之二 [J]. 外语界, 2006(5): 13-16.
- [4] 黄源深. 多读多写——英语学习谈 [J]. 外国语, 2002(6): 13-17.
- [5] 李文凯. 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 [N]. 中国教育报, 2003-12-20.
- [6] 张绍杰. 读写危机: 当今英语专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2): 1-5.

责任编辑: 赵小刚

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文化认同实证研究^①

刘全花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英语系,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本研究基于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英语教育专业专科生在一年级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过程文化认同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认同变化入学初具有一定的存在,其中生产性变化排在首位,然后是附加性和削减性变化。

关键词:英语教育专业;英语学习;文化认同

An Empirical Study on Cultural Identities of English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LIU Quanhu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Chines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change associated with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college life. The participants are 58 English education majors in a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analysis of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already sensed such cultural identity change to some degree. "Productive change" is found followed by "additive changes" and "subtractive changes".

Key words: English education majors; English learning; cultural identity

1. 研究背景

外语学习中“文化认同”是学习者对“我是谁”、“我归属哪个群体”的理解和认识。外语学习者语言技能得到发展变化,作为“整体人”外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也在发生变化,语言学习者的认识、交际方式和价值观念均有可能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Lambert(1974)指出,二语学习将引起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两种转变的双语

作者简介:刘全花,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师发展研究。

现象即“附加性双语现象”(additive bilingualism)和“削减性双语现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前者是指学习者在获得目的语及目的语文化认同,同时还保存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后者指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被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所取代。“附加性双语现象”被多数人认为是理想的双语现象。1985年 Gardner 指出,认同变化属于“非语言学习结果”。之后,有许多学者尝试发展 Gardner 的经典教育模式,有从社会心理范式基于学习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扩展(Dlmyei,2005),也有基于社会文化范式发展变化的、动态的视角研究认同(Norton,2013)。国内学者高一虹(2001)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Erich Fromm 的“生产性取向”概念,在最佳外语学习者的访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生产性双语文化认同现象”(productive bilingualism),发展了 Lambert 的认同理论。生产性文化认同指母语与目的语水平以及对两种文化理解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比 Lambert 更进了一步。外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有三种:“削减性文化认同($1-1=1$)”、“附加性文化认同($1+1=1$ 或 $1+1=1/2+1/2$)”、“生产性文化认同 $1+1>2$ ”。每一文化认同不一定是单独存在,有可能几种同时存在,以某一种为突出。生产性文化认同是理想的认同方式,有益于学习者身心健康和“整体人”的发展。大学生文化认同变化是自我认同变化的主线(高一虹,2014:78)。英语学习者文化认同的研究在国内已逐年增多(高一虹,2014;陈新仁,2008;任育新,2008;李战子,2005)。研究发现,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附加性、生产性变化高于削减性、分裂性变化(高一虹,2014:111,171;2008),英语专业学生更认同于目的语文化(陈新仁,2008:61;高一虹,2003a,2008),高年级削减性变化高于低年级学生(陈新仁,2008:50),这说明英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同时,伴随内心挣扎与纠结产生不同的文化认同变化的体验,有的变化是积极的,如生产性变化;有的变化是消极的,如削减性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结果及整体人的综合素养。因此,担忧外语文化的输入并不是杞人忧天(陈新仁,2008:37)。加大母语文化教育,增强生产性双语人格显得十分必要,英语学习与文化认同研究已不再是不相干的话题(高一虹,2008;2011,2014:14;陈新仁,2008),增强英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关键”(李建华,2011)。研究中发现,英语学习者批判性思考反思文化认同的出现(高一虹,2009,2011,2014)有助于学习者朝着和谐理想的双语文化认同方向发展。

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国外主要相关研究中提出的双语文化现象(Lambert 1974)以及“文化投资”和“想象认同”(Norton,2005)为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了理论思考和实践借鉴。国内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高一虹,2001)使文化理论得以发展。国内相关实证研究(高一虹,2014;薛芬,2012;任小华,2011;边永卫,2009;陈新仁,2008;马春雨,2004)不断丰富着英语学习者文化认同研究成果。但是以上研究存在两点不足:(1)多以英语专业或非英语专业为研究对象,以英语教育专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缺乏。(2)多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缺少专科生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英语教育专业多数会走向英语教师队伍,他们的文化认同变化和发展将对未来基础英语教育甚至对

大学英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因此本研究针对某师范院校的英语教育专业专科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进行跟踪调查,本研究是跟踪研究的基础阶段的研究。相关研究问题:(1)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文化认同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是,那么(2)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中文化认同发生怎样的变化?哪种变化比较明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师范院校的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多数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生前已经考取教师资格证。师范院校的英语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多数回到各地县市任英语老师,目前农村小学英语专职教师还有很大缺口。本文选择某师范院校2013级三年制英语教育专业一年级全体学生。这个时间段是英语学习者进入大学学习的起始阶段,是学习成长的关键期,也是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敏感期。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不仅拥有学生身份,同时增加了准英语教师的身份。本研究为跟踪三年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中文化认同的变化和发展研究的前期探索性研究,为后面的跟踪研究奠定基础,并为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以及中小学英语教师的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2.2 测量工具的编制与测量

调查问卷借鉴高一虹等(2004)的问卷设计,根据本研究目的做了适当修改。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从“很不同意”(1)到“很同意”(5)的形式编制。问卷主体包括两大类:动机类型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因素包括五类,即附加性变化、削减性变化、生产性变化、分裂性变化和零变化。根据研究目的赋予文化认同变量一定的意义(见表1)。

表1 问卷变量及意义

文化认同	变量意义
分裂性变化	母语与目标语两种文化相互干扰,相互冲突
附加性变化	并用英汉两种语言,行为模式及观念
零变化	未发生与英语学习相关的文化认同变化
削减性变化	母语及其文化观念被目标语及文化观念所取代
生产性变化	母语及目标语水平及两者文化的理解相互促进

参与问卷调查者为某师范院校英语教育专业2013级新生共63人,实际调查进行了三次,首次预调查15人,第二次调查55人,正式问卷调查即第三次为58人(当

天有五人请假)。调查在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后发放问卷 58 份,收回问卷 58 份,问卷回收率 100%。受试者个人背景信息分布情况见表 2、表 3。

表 2 受试者年龄与性别

	年龄			性别	
	18 岁以下	18 - 21	21 岁以上	男	女
人数	2	55	1	2	56
百分比	3.4%	94.8%	1.7%	3.4%	96.6%

表 3 受试者家庭背景、英语起始年龄及英语水平

	家庭背景			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				目前英语水平			
	农村	中小城市	大城市	6 岁以前	7 - 12 岁	13 - 15	16 岁以上	四级以下	四级	六级	其他
人数	43	12	3	1	26	24	7	56	0	0	2
百分比	74.1	20.7	5.2	1.7	44.8	41.4	12.1	94.8	0	0	5.1

2.3 调查实施及数据收集

调查分为两个部分:问卷及访谈。问卷为匿名调查,每次问卷调查时间为 15 分钟。为补充问卷的局限性,我们针对研究问题访谈了四位研究对象,访谈对象在使用中均为化名,经受访者同意,访谈均有录音。问卷调查共 40 个题项(包括动机类型),整体问卷信度超过 0.80,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文化认同部分,动机类型将另文探讨。

访谈员由所任班级的语文教师和高年级英语专业的一名学生担任,对访谈对象每人进行了一次 40 分钟左右的访谈,对其中两人进行小组访谈一次。访谈方式为半结构化访谈。对 58 位研究对象均进行了书面访谈(用 S1 代表三年制英语教育专业学生 1,以此类推)。

3. 结果与讨论

文化认同各变量均值结果显示:生产性变化均值最高(表 4),分裂性变化最低。除去“零变化”参照项,生产性变化($M = 14.17$)与附加性($M = 11.98$)变化高于削减性($M = 10.76$)与分裂性变化($M = 10.02$)。大学生的削减性变化高于分裂性变化有别于分裂性变化($M = 9.67$)高于削减性变化($M = 9.09$)(高一虹、程英,2003)的研究结论。这说明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文化认同变化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和态度体验。

表 4 文化认同类型的均值与标准差

认同类型	削减性变化	附加性变化	分裂性变化	零变化	生产性变化
均值	10.76	11.98	10.02	12.60	14.17
标准差	2.69	3.13	3.04	2.41	2.37

文化认同中生产性变化排在第一,超过了临界值,这与高一虹等(2002,2003a,2003b,2011)对大学本科生,李淑静等(2003)对硕、博研究生,汤小叶(2007)对高职

高专学习者的研究相近。变化位居第二的是附加性文化认同,印证了高一虹(2003a, 2003b)、李淑静(2003)、汤小叶(2007)、李宗强(2010)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中附加性变化居生产性变化之后,没有超过临界值,这和汤小叶(2007)基于高职高专研究结果一致,而与其他研究显示附加性变化超过临界值的结果(高一虹,2003a,2003b;李淑静,2003;李宗强,2010)不一致。不过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的附加性变化虽出现但还不凸显,这也许是处于大学初级阶段,接触英语专业的信息有限。接下来的是削减性变化,最后是分裂性变化。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分裂性变化排在最后有别于其他研究中削减性变化排在最后(高一虹,2003a,2003b;李淑静,2003;汤小叶,2007;李宗强,2010;),这也是本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发现。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生产性变化处于更高的地位,而分裂性变化处于更低的地位。从质的材料看,他们的削减性很有限,也许是他们接触西方文化的深度有限,生产性变化有可能跟学习者的想象认同(Norton, 2013:8)及理想文化认同有关。在想象中将自己认同于未来的语言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

3.1 生产性、附加性变化

对英语教育专业学生来说,“想象认同”中的社会责任感已经在文化认同中有明显体现。生产性变化逐渐突显(表5)。学习英语后可以感受到通过语言“对本国文化更多地认同和自豪”(S29)。“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S47)。“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多不同,我们可以吸取其精华,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使我们逐渐与国际接轨,中西方文化也逐渐融合,互相取长补短”(S51),投射出英语教育专业学生未来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习英语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感到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和统一性,让我更喜欢研究文化的差异”(S4)。“学习英语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外国人交谈,能够交更多的朋友,更能丰富自身的生活如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同时更能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发展中国文化”(S25)。“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互相促进,相互发展”(S27)。“接受访谈后,我知道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促进文化融合”(S42)。量化研究也提供了生产性变化的支持结果。

英语教育专业学生母语及目标语水平及英汉两种文化的理解相互促进。基于“我学习英语后,我逐渐开始关注汉语和中国文化”,67.2%明确表示同意或很同意。43.1%表明同意或很同意“我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我的汉语能力也在长进”。51%表示同意或很同意“我学习英语之后,我变得更加善于与人沟通”。基于“我学习英语后,我对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形式产生了兴趣”,有70.6%表示同意或很同意。

这些研究结果和上文中的质性材料相一致,共同解释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在英语学习后文化认同方面的积极变化,即“1+1>2”的变化,反映出其良好的学习特质,并使英语学习者在多方面不断收获,诸如语言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文化认同、创造能力、个人成长(高一虹,2001:146-148)。

3.2 削减性变化的出现

访谈员在访谈书面概要中说道：“学生回答概括：国内外见面问好时，国外说你好，国内说吃饭了没。同时，国外对工资和体重是避讳去问别人的，而中国很多时候会相互问。还有对上帝的看法，上帝在欧美是很神圣的，与他们交流时不能对此进行质疑。”“就是不能问别人的年龄问题嘛，因为问年龄问题就感觉不礼貌，然而在咱中国就是年龄很随意的问嘛。”（黎悦），“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学完英语之后，之前我量体重的时候会很有（听不清），你多少斤？但现在我就不好意思问了”（夏静）。削减性文化体验预示着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更倾向于目标语文化。量化材料也提供了佐证，有45.5%表示同意或很同意“我学习英语后，我见到中国人也不主动问年龄、工资”，有近30%表示不清楚；近20%表示同意或者很同意“我学习英语后，和中国文化相比，更加喜欢英美文化”，超过20%选择“不清楚”；针对“我学英语后，我发现自己的行为、举止变得比较西方化”的调查结果，20.7%的研究对象表示同意或者很同意，27.6%的认为不清楚，两组数据合并接近50%。

母语及其文化观念被目标语及其文化观念所取代是研究对象更倾向于目标语文化。质的研究材料和量化结果相吻合。“我觉得英语教育比语文教育有趣，可以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在做事上有新的方式”（S3）。“文化上我们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S17）。“外国人的奔放、自由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咱们”（S18）。学习英语影响着“让我们更加倾向西方文化，忽略中国文化”（S19）。“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和价值观”（S57）。“学英语，使我变得更西化，对西方有一种崇敬之感，渴望去西方游历一番”（S55）。“学英语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感觉自己能够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S49）。“学习英语让我更加西化，生活也开始向西化方向发展”（S39）。“那你们学习英语之后有没有新的发现呢，黎悦同学？”黎悦回应：“嗯，现在发现一些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之处……”“学习英语对我们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影响？”“会有一点。最开始起步学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的礼仪方面，而咱们国家礼仪方面好多地方都是不同的……但是因为是现代社会嘛，咱们国家一些保守的东西肯定会被他们那种先进的东西取代。”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削减性变化体现的是“1-1=1”的变化，是“英语学习者学习发展中的不成熟性的体验”（高一虹，2001：145）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倾向于受到目的语文化的影响。

3.3 分裂性变化出现但还不明显

在遇到英汉礼仪文化有冲突时，黎悦不知所措：“他们有的地方就是吃饱了的话要……即使你吃饱了你也不能剩饭，这种有的时候可尴尬”（黎悦）。分裂性变化低于变化或者未变化的分界值。在访谈资料中看不到大量的分裂性认同信息。不过量化材料表明，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体验着语言、行为、观念之间的冲突或挣扎。63.8%的同意或很同意“当我往返于英、汉行为方式之间时，我好像被撕裂成了两半”。60.7%表示很同意或同意“我和朋友用餐时，我会为一个人买单还是各付各账

感到困惑”。67.2%对“我学习英语后,我常常挣扎于矛盾的价值观之间”持很同意或同意看法。

参考量化信息和质性材料,分裂性变化已经产生。分裂性体验也许是向生产性变化的必由之路。分裂性变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分裂性变化的学习可能会向附加性、生产性发展”(高一虹,2003b)。如果过渡不良,也有可能产生负向的结果。

4. 结论

本研究试图考察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中文化认同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如下:①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在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发生了变化。②“生产性”双语现象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中明显存在,但不够深入。生产性双语现象将促进英语教育专业学生朝着健康的人格发展,并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自我实现”。研究还发现,几种文化认同变化同时存在于一个个体;几种变化不是均衡发展的,也不是相等关系,而是不平衡、动态的、流动的;在某一变化突显出较为稳定的文化认同特征时,经过碰撞、协商不断趋于深入或产生新的变化,生产性变化为理想的文化认同变化。附加性和生产性变化为主要趋向,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积极互动,相得益彰。在英语教育教学中促进学习者生产性变化值得鼓励。

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具有复杂性。本研究旨在探索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中文化认同现象,没有探讨英语学习起始年龄不同的文化认同变化情况,没有探讨不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合适、更深入解释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有待进一步讨论。本研究为三年跟踪研究的前期探索性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研究依据。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本文的部分内容为2014年4月在江苏镇江“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发言内容。

参考文献:

- [1] DËrnyei, Z.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 [2]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3] Gao, Yiho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1 + 1 > 2"*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 Lambert, W. E.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M] // F. E. Aboud & R. D. Meade. *Cultural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Bellingham, Washington: Fifth Western Washington Symposium on Learning, 1974.
- [5] Norton, B.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M]. Bristol.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 [6] 边永卫. 涉外文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自我认同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3): 51 - 56.

- [7]陈新仁.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8]高一虹.生产性双语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59-64.
- [9]高一虹,周燕,战凤梅.英语学习与学习者的认同发展——五所高校高年级阶段跟踪研究[J].外语研究,2011(1):56-62.
- [10]高一虹,刘璐,修立梅,丁林棚.大学生基础阶段英语学习与认同变化跟踪——综合大学英语专业样本报告[J].中国外语教育,2009(2):3-10.
- [11]高一虹,程英,赵媛,周燕.英语学习与自我认同变化——对大学本科生的定量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a(2):132-139.
- [12]高一虹,周燕.英语学习与学习者的认同发展——五所高校基础阶段跟踪研究[J].外语教学,2008(6):51-55.
- [13]高一虹.学习外语与认同研究在我国情景中的必要性:回应曲卫国教授[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8(2):72-77.
- [14]李建华,钟玲,叶湘.从语言环境和语言意向看我国的汉、英语关系[J].中国外语,2011(2):17-22.
- [15]李战子.身份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2005(1):234-241.
- [16]马春雨,曹廷军.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中自我认同变化探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3):51-55.
- [17]薛芬,韩百敬.英语学习者双语文化认同发展实证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2012(3):88-90.
- [18]任小华.英语学习与文化认同——基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调查研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2):129-133.
- [19]任育新.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的调查与分析[J].外国语言文学,2008(1):46-52.

责任编辑:冯革

“双语教育研究”主持人语

多语现象全球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多语教育在中国受到宪法保障,并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世界各地的教育实践证明,多语教育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各个族群人口素质,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本栏目欢迎各类学者关于双语、三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实证性研究。《“桥头堡”战略视野下的云南多语教育研究评述》一文通过介绍云南的多语现象,对云南的多语、多(跨)文化现象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云南的多语、多(跨)文化研究正面临着繁荣发展的历史契机,如果能有效利用云南现有的学术资源,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王 革

“桥头堡”战略视野下的云南 多语教育研究评述

王 革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云南是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云南以其异常丰富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多语现象和多语教育最佳“田野”之一。云南的多语、多(跨)文化研究正面临着繁荣发展历史契机,如果能有效利用云南现有的学术资源,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多语现象; 学术研究; 桥头堡

A Review of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Studies in Yunnan Under the Gateway Strategy

WANG Ge

Abstract: Yunnan is a province with the richest language and culture diversity. She is also a gateway in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fo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Thanks to her language and culture diversity, Yunna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esirable "field" for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study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Drawing on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ourc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hall be carried out and the findings will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作者简介:王 革,男,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多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和教育人类学研究。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unnan.

Key words: multilingualism; academic study; bridgehead

1. 引言

云南是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我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进行“桥头堡”建设的门户。中国境内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都分布在云南,其中 22 个少数民族使用 28 种语言(Tsang,2005)。15 个民族为云南独有,16 个民族跨境而居。尽管中国的少数民族仅占全国人口的 8.41% (1 亿 4 千万),但民族自治区域覆盖了 64% 的疆土,可见民族地区繁荣和稳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云南目前有 8 个自治州,29 个自治县,覆盖全省 70.2% 的面积,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48.08%。同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相比,由于历史因素和地域偏远,云南一直被标称为“欠发达地区”和“经济上被剥夺地区”(Feng & Cheung,2010)。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10 年,云南农村居民收入为 3,952 元,城镇居民收入为 16,065 元。而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为 5,919 元,城镇居民 19,109 元。云南的城镇居民收入为东南沿海地区的 77%:农村居民收入仅为东南沿海的 44%。社会经济差距导致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偏低。长期以来汉族一直被当作“先进的老大哥”而少数民族被贴上“落后、孩子气和原始的母性特质”的标签(McCarthy,2009)。2000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国人的平均教育年限为 7.27 年,而云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5.96 年,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 29。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省水平又低 2% - 3%,有研究表明(徐杰舜、吴政富,2007),拉祜、瓦、布朗、独龙和怒族的人均受教育时间不到三年,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0.9 年。

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比率高已成为制约云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杨国才(2009)的调查表明,就民族、地域、性别和社会阶层而言,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在 7 个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当中(傣、景颇、基诺、布朗、哈尼、傈僳和拉祜)只有 10‰ 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白族和纳西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已达到 22‰。

上述云南省情虽然看起来比较糟糕,但是由于一些民族聚集地远离现代文明,民族语言尚处于原始状态,也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民族语言文化“桥头堡”提供了机遇。随着云南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依托其区域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云南省政府制定了招商引资和开展国际教育的各项优惠政策。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云南的多语现象和多语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2. 多语的分布和使用情况

由于生活环境、人口规模和社区分布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和复杂的(见表1)。目前云南的语言使用有四种情况。①操单一语言的少数民族,如傈僳、傣、藏、景颇,他们对本民族成员和外族交流时多用母语。②使用双语的民族,如白、纳西、壮族。他们多居住在平坝或与其他民族杂居。③使用三语的民族,如德昂、普米、布朗。他们多与周边民族有密切的交往。④过渡语使用者,如回、满、水等民族。他们已放弃了母语转用新的语言。

表1 云南15个世居少数民族及其语言使用情况(Tsang, 2005)

排序	民族	单一语使用者(母语)	%	双语使用者(母语+汉语)	%	三语使用者(母语+汉语+第三语)	%
1	阿昌	10,060	49.23	7,516	36.78	2,857	13.98
2	白	414,891	36.64	615,333	54.35	102,000	9.01
3	布朗	36,106	61.75	17,215	29.44	5,152	8.81
4	傣	483,168	57.55	316,628	37.72	39,700	4.73
5	德昂	7,132	58.00	4,591	37.33	574	4.67
6	独龙	3,984	85.99	649	14.01	0	0
7	哈尼	649,024	61.29	408,782	38.61	1,000	0.001
8	景颇	60,979	65.59	31,997	34.41	0	0
9	基诺	5,836	48.79	6,126	51.21	0	0
10	拉祜	202,277	66.48	89,981	29.57	11,998	3.94
11	傈僳	384,058	79.70	96,826	20.09	1,000	0.21
12	纳西	110,465	43.91	131,127	52.12	10,000	3.07
13	努	6,971	30.45	4,525	19.76	11,400	49.79
14	普米	6,749	27.85	10,289	42.45	7,200	29.70
15	瓦	198,466	66.46	83,489	27.96	16,656	5.58

在云南,不仅不同的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数(大约250万人)不能用普通话交流。2006年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表明,云南只有37.84%的人口能用普通话交流,而全国的比例为53.06%。在少数民族当中只有12%能真正用普通话交流。因为不通晓普通话,某些少数民族在寻找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通过学校课程实施双语教育“有助于促进彼此的理解、尊重,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平等”(Teng & Wen, 2005)。

3. 多语教育研究的法理依据

多语现象指某个个体或族群通晓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多语现象在世界上是

普遍存在的,中国因为其独特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多语现象也很突出。建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多语教育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使少数民族的多语学习法律化、制度化。如2004年颁布的对1982年的宪法修订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基于宪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分别出台了《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扫盲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重申了各民族教育平等的权利和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强调大力推广普通话。如2011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支持民族教育”等。建国以来,中文一直是各级各类学校的主干科目和教学语言。自2001年起,英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小学课程。

由此可见,多语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教育行动和政策,旨在发展各民族的多语能力,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遍文化水平,通过公办学校的课程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共同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语教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国家意志和利益所在。(王革,2011)这些方针和政策不但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相关国际公约^①的精神。

4. 云南多语、多(跨)文化现象研究评述

云南因其多语、多文化的特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学者靠着在云南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并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知名学者,比如丹麦学者 Hansen 通过在丽江和西双版纳的调研完成了专著《做中国人的启示》,该书后来成为教育人类学的经典读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 Sydney White (白西林)曾于1989年至1990年前往丽江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美国学者赵省华(Emily Chao)1990年就读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时,曾前往丽江进行过为期一年半的实地调查。她的兴趣是纳西族的性别研究。2012年她同 Stevan Harrel 合作撰写了《丽江故事:改革时代的出租车司机和逃婚新郎》。施传刚先生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1987-1989年间,为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他曾对位于中国滇川交界处的摩梭人进行过长期实地考察,并于2008年出版《永宁摩梭》。留法博士蔡华对永宁泸沽湖畔的摩梭村寨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一个既无丈夫亦无

父亲的社会》。美国芝加哥大学 Mckhann 通过在丽江的调研于 1992 年完成其博士论文《骨与肉:纳西宗教中的亲属关系和宇宙论》。法国木尔多赫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Christine Mathieu 通过在丽江的长期实地调查,完成博士论文《失去的王国和被遗忘的部落:中国西南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神话、宗教仪式及母权制》。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者 Mary Jo Lee 在 90 年代末多次来云南师大调研,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将其改编为专著《民族、教育和动力——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学生是如何构建他们的身份》。

2000 年以后,国内也有很多留学海外的学者靠在云南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如香港大学博士余海波 2009 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了其专著《身份认同和纳西族的学校教育》、云南大学白志红教授根据她在澳洲国立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在国内出版了英文专著《从“他称”到“自称”:大理白族认同的建构》、云南师大的原一川教授和胡德映教授根据他们留澳的博士论文分别出版了他们的专著《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动机实证研究》和《云南少数民族三语教育》、云南大学王革教授和云南民族大学杨红艳副教授通过对纳西和哈尼族学生和成功人士的研究分别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高校少数民族多语学习者:中国云南一个人种志研究》和《纳西话、中文和英文:丽江的多语现象》。

如表 2 所示,据统计,2008-2013 年外语界学者共承担涉及多语、多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的国际课题一项,国家级课题二项和省部级课题 43 项。出版专著 27 部,发表论文 49 篇。其中国际论文九篇,被 SSCI 检索的论文二篇,国内论文 40 篇;会议论文 19 篇。

表 2 云南外语界学者近 5 年来多语、多(跨)文化研究成果(不完全统计)

研究方向	论文	专著	会议论文	课题
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研究	18	7	2	13
云南双语/三语教育	9	7	4	7
民族地区英语教师发展	1	0	1	2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	11	6	1	5
民语和英语词汇、修辞、语用对比研究	4	0	0	2
美国学和加拿大研究	2	1	2	1
云南濒危语言和未识别语言	1	2	2	2
三语背景下少数民族学生身份认同	1	0	5	4
东南亚国家语言文化研究	2	4	0	9
东盟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发展规划	0	0	0	1

近五年来,依托云南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省内外语界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色:①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习得方式和特点成为省内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自 2007 年起,原一川、李强、杨红艳等学者分别就少数民族的英语学习策略、学习动机、习得情况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18 篇并出版了专著七部,承担了国家社科

和教育部课题共四项。②李强等学者针对民语(民族语)和英语在词汇、修辞和语用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四篇。③针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双语/三语教育情况,原一川、胡德映、王革等学者对傣族、艾尼族的双语教育情况做了实证研究,发表论文九篇(其中两篇文章被SSCI检索),出版专著七部,参加了关于中国三语教育的国际、国内项目七个。④民族地区英语教师的发展问题也成为省内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李少伶和周真教授是最早研究民族地区英语教学改革的学者,其后以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教育发展中心的团队通过“国培”和“省培”项目对民族地区的师资培训进行了理论到实践的研究。⑤多语背景下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关注的问题。云南学者王革、杨红艳通过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对纳西族和哈尼族的学生和成功人士进行了身份认同研究,分别在香港大学和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完成了相关的博士论文。⑥跨文化交际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云南学者的视野,已成为省内多所院校英语专业选修课,目前云南学者主要关注民族地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人际谈判和沟通,商务英语、旅游英语中的跨文化问题。周真、王革、刘汉玉、黄瑛、孙静等学者先后承担了四项省级课题,发表相关论文11篇(其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五篇),出版专著四部。⑦美国学和加拿大研究也是云南学者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周宝娣、刘晓红、王庆奖等多名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宣读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三篇,出版了专著两部。⑧云南濒危语言和未识别语言也是云南外语界学者关注的问题,以玉溪师院白碧波、许鲜明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近年来积极承担相关的国际项目,组织了相关的国际会议,发表了论文并出版了两部专著。⑨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化也是目前云南学者关注的重点。以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为基地,杨光远教授率领他的团队承担了国家社科、国家民委和教育部的九项课题,出版专著11部。⑩东盟国家的语言政策也是云南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目前云南大学王晋军教授已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综上所述,近年来云南外语界的学者凭借其学科优势和专业背景,立足云南对云南的多语、多(跨)文化现象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非常令人自豪和鼓舞的。但另一方面,和省外和国外的同类研究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各院校的研究多属于各自为政或单打独斗的局面,不利于信息和资源共享。研究团队成员背景相对单一,缺乏跨学科的有力支撑。申报项目时明显感到团队整体实力不足。

(2)大多数省内外语学科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奖惩不分明,使大多数教师丧失研究的兴趣和动力。

(3)省内很多教师有留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背景,但对相关的国别研究不足。希望相关高校关注并建设好现有的美国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东盟国家研究,让他们成为相关国别研究的基地。

(4)缺乏跨校的学术交流平台 and 机制,从研究内容上看,利用区域优势、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的课题不多。

为此,笔者建议利用云南外语教育协会这个平台,成立若干兴趣小组(SIG),定期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工作坊等,经常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并强强联合申报课题或撰写文章。有条件的外语院校应给予相对的人力和财政支持,以承办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的形式提升云南外语界的知名度和研究水平。当各校邀请专家来校讲学时,要互通消息,增加交流互动的机会。建议省教委扶植有条件的高校,利用云南的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借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模式,建设西南语言文化研究服务中心,或者成立西南语言文化科研基地,一方面利用国际研究基金为国际学者到云南(西南)进行实地调查服务;另一方面也使云南(西南)的语言文化研究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研究中国西部多语、多(跨)文化现象的桥头堡。在未来的研究中,我建议在加深、加强现有研究的同时,结合云南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探索以下尚未或很少涉及的研究领域:

- 语言接触下少数民族的语言变迁
- 少数民族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复兴
- 语言迁徙(民语、汉语、英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影响
- 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文学、医学、宗教)
- 跨境学童/跨国难民子女、农民工子弟的语言学习问题
- 研究少数民族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 民族地区外语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意识和态度、职业倦怠感
- 语言接触和文化融合带来的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
- 非盈利或公益组织和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
- 外语教师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模式和效果的评估
- 外语教师的公益服务研究
- 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办学培养多语人才的可能性和模式研究
- 汉语和中国文化对东盟国家的影响

5. 结语

目前,云南的多语、多(跨)文化研究正面临着繁荣发展的历史契机。国家的多语教育政策、西部大开发和云南的桥头堡建设的宏伟蓝图都为云南学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目前,外语学界需要做的就是整合各校的学术资源,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强大的研究团队。本着“立足云南、放眼世界、服务家乡、奉献社会”的理念,研究本土和邻国的语言文化,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将云南打造成为西南地区多语言、多(跨)文化研究的桥

头堡。

注释:

- ①联合国很多公约和文件如《人权联合声明》(1948),《消除各种歧视的联合国公约》(1979),《发展权利宣言》(1986),《教育为了全人类—世界宣言》(1990),《民族、宗教、语言少数民族裔权利宣言》(1992),《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1994),都对维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提出要相应的要求并给予了法律保障。
- ②本文为作者在2013年云南省外语教育学会年会上的主旨发言。

参考文献:

- [1]Feng, Y. Y. & Cheung, M. Public policies affecting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J].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0(3): 248 - 265.
- [2]McCarthy, S. *Communist Multiculturalism: Ethnic Revival in Southwest China* [M].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 [3]Teng, X. & Wen, Y. H.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M]// N. Ken Shimahara, I. Z. Holowinsky & S. Tomlinson-Clarke.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Educ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 [4]Tsang M. C. et al. *Minorities' Education in Yunnan: Developments,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R]. http://www.tc.edu/centers/coce/pdf_files/a11.pdf, 2010.
- [5]Wang, G. Bilingual education in Yunnan; a Dehong cas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and Bilingualism*, 2011(5): 571 - 587.
- [6]Wang, G. Understanding Ethnic Multilingual Learners at Tertiary Level: An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in Yunnan, China [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 [7]甘雪春. 西方学者与纳西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J]. *思想战线*, 2001(3): 82 - 87.
- [8]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 2011.
-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订版)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9/16/content_1990063_2.htm.
- [1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163510.html>.
- [11]徐杰舜, 吴政富. 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考察报告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增刊1)*, 2007: 12 - 16.
- [12]杨国才.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中的差距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6): 134 - 138.
- [13]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年) [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责任编辑:陈 宁

《斯坦纳、普鲁斯特、伍尔芙及福克纳的叙事形式与混沌理论》述评

洪溪珧

(广东金融学院 外语系, 广东 广州 510521)

摘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混沌理论的影响日益加大,西方文学批评界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将混沌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多,因此本文拟将国外文学批评界这方面的最新专著之一——《斯坦纳、普鲁斯特、伍尔芙及福克纳的叙事形式与混沌理论》(*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2007) 进行介绍,并简要评论之,以引起国内文学批评界对此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混沌理论;文学批评;《斯坦纳、普鲁斯特、伍尔芙及福克纳的叙事形式与混沌理论》;述评

A Review of *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HONG Xiyao

Abstract: Since 1980s, with the influence of chaos theory from natural science, attempts by Western literary critics have been made to apply chaos theory into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has crystallized into some fruits.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in literary criticism have seldom paid attention to this field. Hence, the present paper purports to introduce the main contents of one of the newest books in this regard, *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2007), and make a brief comment on it, so as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and deeper thinking from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on these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Key words: chaos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作者简介:洪溪珧,女,江西赣州人,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研究。

and Faulkner; review

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混沌理论的影响日益加大,国外文学批评界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将混沌理论^①(*Chaos Theory*,或称当代动力系统理论(Jo Alyson Parker 2007: xii; 以下只标注页码的均出自此书,笔者注)引入文学批评之中。到目前为止,国外已经出版了约 10 部这方面的跨学科专著。本文拟介绍的《斯坦纳、普鲁斯特、伍尔芙及福克纳的叙事形式与混沌理论》(*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2007)也是这样的一部专著,该书由知名文学批评家 Jo Alyson Parker 教授撰写,于 2007 年由 Palgrave Macmillan 公司首次出版,是运用混沌理论进行文学研究的一部最新力作。本书通过运用混沌理论中的奇异吸引子、分形、迭代等概念,对《绅士特里斯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以下简称《项狄传》)等四部文学名著的叙事形式进行分析,论证了混沌理论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意义的生成过程、理解形式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发现文本的“混沌之美”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叙事力学”(Dynamics of Narrative)的观点。全书共有五章,以下拟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并简要评论之。

2. 内容概述

2.1 第一章 混沌理论与叙事力学

本章为全书的理论铺垫,共有 4 小节内容:

第一小节“古典物理学的有序宇宙”,主要对由牛顿力学体系开创的古典物理学的根本观点进行了概述。作者认为,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晚期,“牛顿—拉普拉斯式时钟宇宙观”(Newtonian - Laplacian clockwork view of universe, p. 3)在科学乃至人文领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古典物理学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就像时钟那样,其运动是线性的、因果性/决定性的、可预测的、有序的——斯蒂芬·凯勒(Stephen Keller)将此称为“时钟霸权”(the clockwork hegemony, p. 3)。而对于那些非线性的、无法准确预测的系统(如天气等)古典物理学们则视而不见。直到 20 世纪后期混沌理论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关注这些非线性系统,并逐步打破了决定论牛顿宇宙观下的“拉普拉斯妖”^②(*Démon de Laplace*, p. 4)“一统天下”的格局。

第二小节“挑战‘时钟霸权’(the clockwork hegemony)”。作者首先申明:尽管混沌理论削弱了我们对宇宙之有序本质的认识,但它并非要以一个相反的观念取而代之。实际上,它只是突出了物质世界中的一些悖论式现象,如“决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 p. 7)、“混沌出秩序”(order out of chaos, p. 7)等——具有这些特

征的系统便是决定性混沌系统(简称混沌系统),它们是混沌理论研究的对象。与古典物理学研究的物质系统不同的是,混沌系统的行为具有非线性、非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它们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系统微观层面的变化将被无限放大并最终影响系统的宏观结果,即著名的“蝴蝶效应”,p. 9),因而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的演化情况,无法准确判断系统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无法用在一条对称线上运作的牛顿的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 p. 10)观念来解释混沌系统的时间特征。因此,混沌理论使我们重新思考时间,用新的时间观念挑战牛顿范式下的“时钟霸权”。

第三小节“奇异吸引子和分形”。本节主要介绍混沌理论中的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或称混沌吸引子)和分形(fractal)等概念。奇异吸引子和分形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前者是混沌系统的行为,后者则是该系统行为的几何特征。典型的线性系统运动有两种“吸引子”:固定点吸引子(fixed-point attractor,如一般情况下钟摆的运动,p. 12)或周期性运转(如无摩擦状态下钟摆的运动,p. 12)下的“吸引子”。混沌动力系统的运动与典型的线性系统运动的区别是:前者的运动呈现奇异吸引子的几何特征。常见的吸引子有罗斯勒(Rossler,或“漏斗”)奇异吸引子和洛伦兹(Lorenz,或“蝴蝶”)吸引子(pp. 15-16)等。分形有两种:“自然分形”(如自然界中树或海岸线的形状)和用数学方法造出来的“数学分形”。二者的共同点是:跨越尺度的相似性(similarity across scale, p. 17)。奇异吸引子较好地描述了混沌系统在有限范围内的随机性特征(bounded randomness, p. 17),而分形则较好地描述了混沌系统在不同层级上的(自)相似性,这两种方法都为叙事研究提供了新鲜视角(p. 17)。

第四小节“叙事力学探究”。本节首先简要回顾了混沌理论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领域中引起的研究兴趣及成果(pp. 17-19),接着论述了叙事也是一个“力学”系统的观点,以及文学文本与力学系统之间的共同点:二者都面对意义生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涉及系统、模型及制模者之间的复杂互动(p. 22)。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二者具有这一本质共同点,因此来自力学的奇异吸引子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那些混沌叙事(chaotic narratives, p. 25)的结构化^③(structuration, p. 22)。用混沌理论研究叙事可以使我们超越经常发生的一些非此即彼的争论(如空间模式 vs. 时间模式、文本中的 vs. 读者带入的、固定意义 vs. 不确定意义、形式 vs. 内容等, p. 26),理解读者参与意义生成的过程(p. 27),帮助我们更好地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建立一种关联(p. 28)。通过这样一种“叙事力学”,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文本的“混沌之美”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2.2 第二章 挑战时钟霸权的叙事:《项狄传》与时间性的游戏

本章主要讨论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项狄传》)在时间性等方面的叙事特征。

第一小节“死亡之奇异吸引子”。作者认为小说中的“死亡”与“性”两大主题,就像蝴蝶吸引子上的两大吸引点那样,使小说的叙事轨迹从吸引子的一“翼”跳到另一

“翼”，如此往复不断，从而使叙事似乎永不停歇。我们知道，18、19 世纪的小说常常有种“线性偏好”（linear prejudice, p. 34）——小说总体上沿一条时间线展开，事件之间往往具有因果关联。可以说，传统的小说叙事就像一个经典决定性系统的运动（如钟摆的运动）那样，其情节的发展高度可预测，叙事最终以主人公的婚姻或（象征性/事实上的）“死亡”而告终——叙事轨迹终止在某一固定点吸引子（fixed-point attractor, p. 36）上。围绕“死亡”与“性”两个吸引子，《项狄传》对叙事的传统线性偏好提出了挑战。在文中，我们一方面无法确切知道项狄的人生之始（项狄父母被打断的性交使我们怀疑那时可能并非项狄被怀上的时刻——也即是说，项狄可能是个私生子。而小说作者斯特恩有意对此未加澄清，因而避免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p. 36），另一方面也无法预知小说叙事的未来走向（项狄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了寻根问底的追溯，但这过程枝节蔓生、充满各种离题和插叙，这使小说的叙事高度不可预测）。更重要的是，小说在时间上的无序避免了它自己的“死亡”/终结。我们甚至可以说，斯特恩在现实中的死亡正好使文本避免了自己的“死亡”（p. 41）；文中随处可见的离题，如叙述者项狄本人所宣称的那样，是“阅读的生命和灵魂”，因为它们使……文本永不“死亡”（p. 41）……

第二小节“时间性的复杂化”。斯特恩在《项狄传》中“不仅玩着时序，也玩着时距的游戏”（p. 46）。传统上对《项狄传》中的时间性的批评往往只关注到钟表时间与项狄的意识时间之间的二元对立。然而，通过混沌理论视角，我们对《项狄传》中的时间性可以有新的认识。具体而言，斯特恩对时间性的处理形成了三对时间杂糅复杂化（complexification of time, p. 48）：第一对是事件被叙述的时间与事件的实际发生（或可能需要的）时间，第二对是作品中提到的该书的写作及出版时间与其对应的现实时间，第三对是故事事件的时距与我们的阅读时间。这样，文本虚构世界中的三个时间，与它们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三个时间一起构成了文本在叙事时距上的六个时间层次，它们相互纠缠、互为变换，从而消弭了现实时间与经验时间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对立，使外在世界与内在意识的时间融为一体。通过混沌理论视角，我们认为斯特恩的这种时间性游戏表现了一种混沌时间（chaotic time, p. 57）概念。与牛顿科学假定下的线性的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 p. 56）概念不同的是，混沌时间可在不同叙事层面上以不同的速度同时进行，因此它更好地表现了经验时间的复杂性。总之，斯特恩在文本的有限状态空间（state space, p. 58）中进行了叙事时间性的复杂游戏，使文本在“死亡”与“性”两个不稳定吸引点（unstable attracting points, p. 58）上跳跃变幻，从而使叙事轨迹处于无限演化之中。

2.3 第三章 叙述记忆的机制：《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迭代与吸引

本章主要讨论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以下简称《追》）在叙事上的迭代性等特征。

第一小节“普鲁斯特、庞加莱（Poincaré）及‘不可预测的微扰’（unforeseen

perturbation)”。本节主要讨论了普鲁斯特这位首位文学现代主义者与法国数学家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这位现代科学的开拓者在认识上的一些共性。作者认为,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普鲁斯特在构思该作品时是否有意识地吸收了庞加莱的理论,但他的作品通篇都表现了决定性混沌系统的某些特征。如:当叙述者讲到一件小事如何改变了两条命运时,叙事表明普鲁斯特明白“系统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性”(p. 66,即微观上的“不可预测的微扰”可能影响宏观结果——蝴蝶效应);当叙述者描述自己与《追》中各种人物的互动时,该描述“让人联想起当奇异吸引子在状态空间中出现时的结构”(p. 67);叙述者对米莉·德·圣一路普(Mlle de Saint-Loup)的记叙则使她仿佛成了一个卓越的吸引子,将文中各个貌似不相干的点吸引在一起,并最终使文本的奇异吸引子得以出现(p. 68)。

第二小节“迭代、迭代性的,以及被迭代的小路”。本节主要讨论普鲁斯特叙事频率上的特征。作者认为,普鲁斯特采用叙事频率的“迭代模式”(iterative mode of frequency, p. 70)以从局部事件出发为过去描绘出一个整体模式的作法,与动力学家通过计算机进行迭代运算以模拟决定性混沌系统的演化过程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在文中,普鲁斯特用他偏爱的未完成时态呈现了一个未定的、甚至尚未结束的过去。这种叙事模式不仅让人知道那段过去的日子常发生什么,还让人感觉会发生什么,而这是那种所谓的单一性频率模式(singulative mode of frequency, p. 71;即一次只记叙一件事情的叙事模式)所无法体现的。小说中最值得关注的迭代有两处:一处是在《斯万家那边》(*Swann's Way*)中叙述者描述他在儿时与父母在贡布雷(Combray)度假时常走过的两条路,另一处在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orrah*)中,叙述者描述在Balbec与La Raspeliere之间的火车站时所用的迭代模式。叙述者对那两条小路所采用的迭代式记叙方法赋予了小路一种与奇异吸引子相似的有限范围内的随机性特征:它们在整体上具决定性,但在局部上却具有随机性(p. 71-72)。而叙述者对从Balbec到La Raspeliere之间的火车旅行的记叙,则总是将当下与过去融合在一起,这样,对旅行的单一性叙事模式便变成了迭代性的叙事模式。对普鲁斯特而言,被迭代的步行或火车旅行显然能更好地抓住逝去的时光,使他能够亲历一个“过去的和可能的”(p. 75,原文着重)过去。

第三小节“梅塞格里斯(Meseglise),盖尔芒特(Guermantes),以及跨越层级的相似性(similarity across scale)”。作者认为,像许多混沌系统那样,《追》在很多方面表现了跨越层级的相似性,其中梅塞格里斯(斯万家)与盖尔芒特家边这两条路便是这样的例子。斯万家代表叙述者的爱欲,盖尔芒特家则代表叙述者的艺术追求。就像叙述者及家人过去虽常常在这两条路上交替走过却永远无法到达其目的地那样,叙述者的人生也在对爱和艺术的不懈却又无果的追求之间交错。因此,《追》的“夙愿难了”的主题在文本的局部和宏观层面上具有类似混沌系统的那种跨越层级的相似性特征。同时,叙述者对爱和艺术追求就像蝴蝶吸引子上的两个吸引点,而其叙事

轨迹则在这两个吸引点之间来回跳跃,沿途收集新鲜信息,不断充盈着(叙事系统的)状态空间(p. 82),这使我们无限地接近系统的真解(true solution, p. 68, p. 70,即了解过去的真相)。

2.4 第四章 叙述无限: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的人生、塞普蒂莫斯(Septimus)的死亡,以及萨莉(Sally)之吻

本章主要讨论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作品《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两条叙事轨迹。

第一小节“在客厅中的……整个人生”。在该小说中,伍尔芙采用了在40多个角色的意识之间不断交换变换焦点的叙事方法,通过这种表面上的不断交换将焦点移离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issa Dalloway)的作法,伍尔芙反而塑造了这一人物的身份——一种流动的、不受限的、非固定不变的身份(p. 93)。本书作者将这种叙事焦点在空间上进行变换的方法称为“聚焦轨迹漫游”(roving trajectory of focalization, p. 91)。伍尔芙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相邻性,或借助某一事物(如飞机、大本钟的钟声)来实现叙事轨迹的转换,这使主人公达洛维夫人的意识与文中其他人物的意识联结在了一起(p. 96)。若将《达洛维夫人》看成一个开放的力学系统,不同人物的意识穿过这一系统,相互交织,最终便形成一个奇异吸引子——达洛维夫人的意识。随着不同人物的出现,达洛维夫人(的意识)这一“涌现性吸引子”(emerging attractor, p. 97)的模式也不断发生演变。其中,通过联通达洛维夫人与塞普蒂莫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一位在现实生活中与达洛维夫人毫无交集、由于一战中得的“炸弹惊吓症”而在派对那天自杀身亡、从而导致其医生参加派对迟到的年轻人)的意识,伍尔芙旨在说明,战场中发生的影响着客厅里发生的、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划分也不过是批评家们似是而非的一个发明(p. 97-98)。简言之,该小说通过叙事在空间上的聚焦轨迹漫游,试图在一个刚被战争分裂的世界中建立与女性王国“联结”(connectedness, pp. 99-100)的女性主义价值观。

第二小节“愿此刻就死去……”。本节主要讨论《达洛维夫人》在叙事时间轨迹上的特征——时间交错(scrambling of chronology, p. 100)。该小说一方面强化了钟表时间的线性推进(小说所述当天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中的17小时之内),另一方面又抵抗着它。对伍尔芙而言,线性钟表时间代表男性主义价值体系以及父权制下对权力的欲望等(pp. 100-101),而对线性钟表时间的抵抗(文本中不断穿插的回忆所体现的非线性叙事时间轨迹)则代表伍尔芙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实际上,通过让思绪不断朝后甚至朝前的跳跃变换,小说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因果关联。这种非线性结构化(nonlinear structuration, p. 103)使伍尔芙既可对故事中体现的社会对性别角色期待的压抑性一面(如对同性恋的不包容、对男性或女性角色的期待)提出批评,同时也使她避免作出任何确定性结论。通过文本中的一个个闪回(flashbacks, p. 103),我们了解了人物背后许多过往的故事。例如,我们看到在克拉丽莎青春年少时同性女

友萨利的亲吻及她们的同性恋给克拉丽莎带来的快乐,几乎使她“愿此刻就死去”(p. 107)。然而,她们最终都选择了结婚生子,这主要是屈服于社会对得体女性的角色期待,就像塞普蒂莫斯选择自杀是因为他无法屈服于社会对得体男性的角色期待那样。但伍尔芙并未在过去之事与当下状况之间作任何明示性的因果关联,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文本动力系统的涌现模式,并填充那些她故意留下的空白(p. 103)。通过追溯人物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叙事的时间轨迹从不同视角重温了时间网格中的某些区域,使过去事件的不同版本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种时间轨迹的混沌性演化(chaotic evolution, p. 108)所形成的叙事奇异吸引子模式,与清晰的因果链模式、(事件的)权威版本模式皆不相同——它使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切“懂得”克拉丽莎·达洛维,因为关于她的各种变量既不确定又不可知。我们只有将各种变量“聚合”(assemble)起来,才能发现一个意义的涌现模式(p. 109)。总之,伍尔芙采用奇异吸引子模式的叙事方式,巧妙地碰触了一下同性恋及性别角色这两个敏感话题,表达了她的事物之间具无界性和联结性(boundlessness and connectedness, p. 110)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达洛维夫人》。

2.5 第五章 叙述不确定:《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施里夫·麦坎农

本章主要讨论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在叙事上的混沌吸引子结构等。

第一小节“萨德本(Thomas Sutpen)与经典决定论”。本节主要讨论了萨德本的经典决定论思维及其后果。牛顿决定论(Newtonian deterministic thinking, pp. 114)及其逻辑延伸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 p. 114, 一个可以预见宇宙之所有过去与未来的想象性物体)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人)皆遵循决定论法则,它们的过去与未来都可精确预测。不过混沌理论认为,尽管宇宙中的万物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并非完全可以预测(pp. 114 - 115)。受决定论思维影响的萨德本无法预见随机因素可能带来的蝴蝶效应及灾难性后果,他只是醉心于自己构筑纯白人家族王朝的野心计划。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自己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去稳定性微扰”(destabilizing perturbations, p. 117)——由于第一任妻子尤拉莉亚·邦(Eulalia Bon)的黑人血统而对她的抛弃,对他的有黑人血统的长子查尔斯·邦(Charles Bon)的拒认,对未婚妻罗莎·科德菲尔德(Rosa Coldfield)一时冲动而说出的话,对米莉·琼斯(Milly Jones)的一个随意的否定等,最终都导致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覆没。通过萨德本的故事,福克纳表达了“决定论思维不仅无法正确评价世界,而且还具有道德缺陷”(p. 118)这一思想。此外,小说以其多视角的、非线性的结构(multiperspectival, nonlinear structure, p. 119),鼓励我们在文本的意义区(zone of meaning, p. 119)内对文本进行奇异吸引子式的多义性解读,而非经典决定论式的完全可预测性解读。

第二小节“《押沙龙,押沙龙!》的吸引子结构”。本节作者首先讨论了该小说中的许多不确定“事实”,包括查尔斯·邦的黑人血统(p. 120)及其最初状况(p. 122),

以及萨德本本人的最初情况(p. 121)等。作者认为,这些不确定的“事实”使小说形成一种奇异吸引子结构,各种叙事解释(narrative explanations, p. 122)围着这些缺场的信息缠绕,但这些事实本身却永远不可确定(不可企及)。在文中,萨德本的故事主要由四位内部叙述者——罗莎·康普生(Compson)先生、昆丁(Quentin Compson)和施里夫(Shreve McCannon)的多视角叙述组成。但我们看到,内部叙述者的叙述之间,以及外部叙述与内部叙述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我们常常不能断定“一个声音在哪儿结束,另一声音又从哪儿开始”(p. 123)。这些从不同初始条件集合((different)sets of initial conditions, p. 124)出发而形成的不同叙事声音,穿越文本的状态空间,成为一个吸引子结构下的不同叙事轨迹,使萨德本的故事围绕该吸引子不断被复述/迭代((re)iterated, p. 124)。如果将对查尔斯·邦的黑人血统的揭示作为一个不稳定吸引点的话,那么昆丁(Quentin)和施里夫(Shreve)的联合叙述轨迹(joint narrative trajectory, p. 125)似乎最接近这一吸引点,因为他们的叙述最准确地解释了“萨德本的百(英)亩庄园”(Sutpen's Hundred, p. 125)里发生的故事。但正如文本提醒我们的那样:他们的叙述也是对他人之重构的重构(a reconstruction of other reconstructions, p. 125),并不比其他人的叙述更有根据,尽管“很可能是真的”(p. 126)。于是,我们看到,就像混沌力学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轨迹那样,不同叙述者围绕某一吸引点的叙述轨迹有时重合,有时背离;有时接近吸引点,有时又远离吸引点。最终,读者对萨德本的解读也总是大概的(p. 127),是从组成该小说的所有叙事迭代(narrative iterations, p. 127)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看法,它们只是对该故事进行解读的“不断演化的整体(轨迹)中的一个片段”(p. 130)。

3. 简评

本书在混沌理论视角下,将叙事结构与叙事内容联系起来,将传统叙事学的形式主义与读者对叙事意义的生成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混沌理论视角下的“叙事力学”。通过这种叙事力学,我们可将某一叙事作品看成一个力学系统,并协调其既作为一个空间产品又作为一个时间过程的两种属性。同时,叙事力学使我们能够对文学作品中具有混沌性的叙事结构作出新的认识,发现它们的“无序之序”(disorderly order, p. 2),并使我们理解为何这些叙事结构的形式及其意义、它们与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读者互动,形成一个反馈环(feedback loop, p. 132)从而使意义的生成具有动态性等。简言之,本书在混沌理论视角下构建的叙事力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具有混沌特征的文本,欣赏它们的“混沌”之美。

在论述上,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理论铺垫与第二部分(第二至五章)的文本分析也像一个反馈环那样彼此互动:混沌理论使我们对文本的叙事更加明了,而文本分析又使抽象的理论变得更为具体。总之,该书是继 N. Katherine Hayles 的开山之作——*Chaos Bound* (1990),以及 Gordon E. Slethaug 的

Beautiful Chaos (2000) 等之后将混沌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又一部富有说服力的跨学科专著,它在力学系统与叙事系统之间所作的类比研究,为我们将“来自其它学科的理论、体系、发现、原则等运用于文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榜样”(Sells, 2009: 215)。

注释:

- ①在人文学科领域,人们倾向于使用“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而非比较专业的“当代动力系统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dynamical systems)这一术语,因为他们认为前者在人文学科中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因而更契合对人文领域中的各种“混沌”现象的研究。
- ②拉普拉斯妖(*Démon de Laplace*),指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于1814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假设。此“妖魔”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过去以及未来。
- ③本书作者派克(Jo Alyson Parker)教授认为,传统叙事学下的结构(structure)是静态的,而混沌理论视角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因此,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一词能更恰当地表达叙事力学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参考文献:

- [1] Hayles, N. Katherine.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 [2] Parker, Jo Alyson. *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M]. 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3] Sells, Erin D. Narrative Form and Chaos Theory in Sterne, Proust, Woolf, and Faulkner (Book Review) [J]. *Woolf Studies Annual*, 2009, vol(15): 213-215.
- [4] Slethaug, Gordon E. *Beautiful Chaos: Chaos Theory and Metachaotics in Recent American Fiction*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

责任编辑:赵小刚

投稿须知

《英语研究》是国内唯一以英语为专门研究对象、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连续出版物,创刊十四年来已经在学术界有了较大影响,受到广泛好评。本书的主要栏目有:“语言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教学研究”、“学术访谈”、“叙事学研究”、“海外译稿”、“教材研究”、“语料库研究”、“习得研究”、“双语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书评”等。

一、来稿要求

1. 《英语研究》面向外语界、人文社科学者,强调论文的学术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正文 8000 字左右,书评为 5000 字以内。稿件的电子版发至邮箱:yyjy2013@163.com,打印稿寄至:400031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研究》编辑部。

2. 稿件构成:中英文标题、中英文摘要(200 字以内)、中英文关键词 3-5 个均用分号隔开、正文、参考文献、基金项目具体名称及编号、附页(附上作者姓名、一级单位和二级单位、职称、单位、学历、学位、研究方向、通讯地址及邮编、手机号码和电子信箱)。

二、注引格式

1. 正文格式

小标题单独占一行,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表示为:1.1、1.2、……2.1、2.2、……

2. 文内引用文献和文末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1) 文内夹注

对论文和述评中的引文所依据的文献,以夹注的形式随文在括号内注明作者姓名、出版年和引文页码,例如:(王佐良,1982:36)。如引用多项,则按照出版年顺序排列。同一作者的参引文献之间用逗号分开。文献作者如果是两个人,参引时引两个人的名字。中文的格式如“刘润清、吴一安(2000)”。英文格式在两个作者之间加“&”号。

2) 文后参考文献格式

中外文参考文献格式: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别排列,外文在前,中文在后。参考文献类型以字母标识,格式如下:

(1)期刊类:[序号] 作者名.(姓前名后,列前2名,后加等). 文献名[J]. 刊名,出版年,卷(期)。

(2)普通图书类:[序号]作者名. 书名[M]. 版本(第一版不写).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

(3)会议论文集:[序号] 引文作者名. 引文题目. 论文集编者名. 论文集名[C]. 出版地(会址);出版者,出版年份.

(4)学位论文类:[序号] 作者名. 题目[D]. 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6)电子文献类:[序号] 作者名. 电子文献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7)引用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时,顺序为:[序号]作者名(姓氏在前,名在后)、作品名、编者名、电子版权信息(日期、版权人或组织)、引用日期及网址.

(8)所列文献必须与正文中的夹注一致。如果正文中没有夹注,参考文献中不得列出。

三、稿件处理

本书审稿周期为三个月,三个月内未收到答复,作者可自行处理,请勿一稿多投。不拟采用的稿件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本书所发表的文章版权归我编辑部所有。

《英语研究》编辑部